

樊仲雲編

今日之日本

程潛題

樊仲雲編

今日之日本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 實 價 四 角 —

編 者

樊 仲 雲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上海辣斐德路五百號
文化建設月刊社
電話八五三七二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坊

編者序言

今日之日本是所謂「躍進的日本」，「膨脹的日本」。

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唾手而取得東三省，繼而進據熱河。一舉手間，攘奪我一百三十餘萬方秆的土地，較之其原有的領土，竟擴大了二倍。（日本面積合朝鮮台灣共計，爲六七五、三四四方秆，而我東四省之面積則爲一、三〇三、一四三方秆。）然而日本的野心，猶是不足，佔我察北，窺我綏東，既成立偽組織於冀東，復欲使冀察亦脫離我隸屬，且進而謀以華北五省爲特殊地域。日本貪得無厭的野心，竟是無所底止。但是臺灣島國的日本，能夠這樣順利地躍進復躍進嗎？能夠這樣毫無阻礙地繼續膨脹開去嗎？

一九三六年的危機是過去了。從今年起，太平洋要開始無條約的海軍自由競爭時代，而今年底，則爲蘇聯第二次五年計畫告成之時，蘇聯在東方的國防也漸建設完成了。

英美與蘇聯這海陸兩方面的壓力，一天天的增加，爲打開這壓力，日本要擴張陸軍，也要增建海軍，同時，今日的世界是空軍制勝的時代，日本又要發展空軍。日本的國力能夠在海陸空三方面與各國相競爭嗎？

據一般觀察者的意見，(註)第一，日本缺乏煤鐵等資源，而煤油則簡直無有；第二，日本的重工業既未有充分發展，而普通工業則全賴對外貿易以維持；第三，國內糧食亦病不足；第四，日本的經濟能力，國民所得，又甚貧弱。最近爲了建立準戰時體制，已因膨脹通貨、增加賦稅，致物價高騰，匯兌發生動搖了。日本以後將怎樣呢？

又在中國，自去年來，日本虛聲恫嚇的要求已無所用之，利用偽匪漢奸的進攻，又鮮能成功，而西安事變以後，中國的統一反愈見穩固。對於這樣的中國，日本以後又怎樣呢？

一九三六年，真是一個重要的關頭，無論從國際或國內言，日本都到了山窮水盡，非轉變不可的地步。爲了打開國際的孤立，既不惜與德國訂立協定；而爲了挽救中日外交的僵局，則竟主張對華之新認識。至在國內，二二六事變的結果，有肅軍論的抬頭，廣田內

關的運命，實在統制派的掌握。但寺內陸相爲了維繫其軍中的人心，依然不能不主張廣義的國防。甚至宇垣繼起相，寺內亦必須爲了少壯軍人的關係，堅決地加以反對。於是大命降於『越境將軍』林銑十郎。林原來也是個統制派的人物，由十河信二之辭去書記官長，海陸兩相之改末次板垣而爲米內與中村，可見政權是仍在比較緩進的軍部。

因此之故，日本的政策，似尚在轉變的中途。所以一面雖與德同盟，而另一面則仍欲改善對蘇對英的關係，藉以緩和國際的孤立。其對中國也如這樣：一面派遣調查團來華，高唱中日經濟提攜，而另一面則依舊進行其對華北的侵略，不敢稍拂少壯軍人的意見。至於國內，如由廣義國防之轉而着重於狹義國防，如起用三井財閥首領池田成彬爲日銀總裁，並以被人譏爲『浦島外交』（言其新歸自歐洲，不悉日本國內情形）的佐藤尚武作霞關主人，都表示對於財閥的妥協。但是魚與熊掌，二者固不可得而兼，侵略不能與親善並行，擴充國防亦不能與國民生活的安定同時不相妨礙。那末日本到底又怎樣呢？

在九一八以前，日本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候：因為經濟恐慌的打擊，國內的危機頗為急迫。結果以東省的取得，轉移了全國的視聽。於是軍部成了內閣的支配者，財閥銷聲於無言，外交退作軍人的侍臣。以後，對華侵略，日有展開，軍人之氣餒愈張，即財閥政黨的勢力日削。但是軍部的軍備計畫到底不能脫離財閥金錢的勢力，這便是二二六政變，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故即在廣田內閣時代，如廣義國防、改革議會制度及行政機構等，亦俱無法實現。而以此故，乃給與財閥以捲土重來的機會。我們從林內閣成立以來的施政，看得了這樣的消息。但是日本的少壯軍人能坐視林內閣之日傾於緩進，而追隨財閥政策之後嗎？爲了挽救他們的頹勢，以關東軍爲其主力的少壯軍人，難道不打算在華北再來一次九一八嗎？又本來擬任用十河板垣等急進分子的林越境將軍，待其根基稍固，能不轉而排除政黨勢力，以實現法西斯的統治嗎？

今日的日本是到了一個重大關頭：繼續躍進呢？還是從此轉而緩進呢？由軍部勢力與財閥的對立，我們覺得除非軍部的對外侵略受到挫折，就不會轉到緩進，採取國際協

調主義。日本正如其西方的兄弟德國一樣，德國一方面雖對英法表示願意和平，但在他方面却欲進攻蘇聯；日本則一方面對英美表示和平，而他方面却依舊不肯放棄其大陸政策對於這樣的形勢，我們中國能不小心警戒嗎？能不努力準備嗎？

『狸狽卑身而伏，以候赦者，』這正如今日之日本，他是在等待再躍進的機會。

(註)關於日本的真相，可參見下列各書：

1. Tainin and Yohan: "When Japan Goes to War?" The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1936.
2. Freda Utley: "Japan's Feet of Clay," Faber & Faber, London, 1936.
3. Gunther Stein: "Far East in Ferment," Methuen & Co., London, 1936.
4. Victor A. Yakhanoff: "Eyes on Japan," Coward-McCann, New York, 1936.
5. Captain Kennedy: "The Problem of Japan," Nisbet & Co., London, 1935.

今日之日本目錄

編者序言

上 今日之日本

- ✓ 一 日本海陸軍人的目標……………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二)
- ✓ 二 日本大陸政策的基調……………今中次麿(一九)
- ✓ 三 日本之南進論與北進論……………堀真琴(三)
- 四 日本之南進政策與海南島……………石丸藤太(四)

中 日本的國際關係

- 五 日本經濟漸入難境 Prof. Paul Keller (委)
 - 六 日本國內的危機 Gunther Stein (充)
 - 一 論英美俄與日本的對立關係 大山卯次郎(八〇)
 - 二 英日對華政策的衝突 尾崎秀實(八七)
 - 三 論日俄關係與中國目前的危機 樊仲雲(101)
 - 四 最近一年的中日關係 家 禾(118)
- 下 日本外交批判
- 一 日本外交的反省 中野正剛(126)
 - 二 當前重要外交批判 本多熊太郎(129)
 - 三 危機在歐洲抑遠東乎 蘆田均(134)

上
今日之日本

一 日本海陸軍人的目標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日本的軍部在其政府內是另一組織。無論對內或對外的政策，他們都有特殊目標，非內閣所能任意干涉。他們的地位，以過去的傳統、憲法的特權，與現今政治權力的平衡，得到三重的保障。

日本的軍官都是往昔武士的後裔，爲一般人所敬重。海陸軍參謀本部的長官，可以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據軍部的理論家言，這是所以保持海陸軍的自由行動，俾不致受制於議會制度。因此，凡海陸軍大臣必須是現役的大將，致任何內閣都不得受軍部強烈的影響。而因軍部的團體精神，非常強烈，所以任何高級軍官都須顧及內閣的人選及

其政策之與海陸軍的目標相背與否，而決定其加入組閣，或者表示拒絕。且自東省事變以來，尤其是二二六事變以後，所有一切行動，其目的都在增強海陸軍的支配的地位，如二月事變那樣，則明白表示爲日本常有的急進與緩進兩派的鬥爭。

在一方面是軍人，如陸軍，尤其是中下級的士官，受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及社會急進主義的影響甚深；海軍雖於社會問題的注意，比較稍減，但如對於產業政策主張應具有軍事的意義，不受私人的自由支配，且要求擴大經費，則與陸軍同一戰線。除軍人外，還有那些小的活動團體，主張種種極端的國家主義。又海陸軍人，尤其是陸軍，對於全國的在鄉軍人及青年團體，也有很大的勢力。

以上是就急進派言。至於緩進派，則有如日本有勢力的元老重臣，西園寺公及二二六事變的被難者牧野伯、齋藤子、高橋藏相等。日本的老政治家，其政治色彩大抵都對着自由主義與溫和派的氣分，這好像可奇，其實是也在意中。因爲這些年老的領袖，當與避歷歐美的時候，正當壯年，那時，政治經濟上自由主義的思想並不如今日樣爲人所醜視。

所以對於他們的影響是很深的。除元老重臣外，則如大企業家，金融資本家，文官的大部及議會中的多數舊式政治家，亦都爲外交政策上的緩進派，主張維持經濟的現狀。

海陸軍人與大企業家，這便是日本今日最強的力量。此外，雖有個人的自由主義者，但却無自由主義的政黨。有一個極溫和的社會黨，名叫社會大眾黨，曾在二二六事變發生前的議會選舉中，頗得了一些票子，但其政治勢力却有限得很。至於共產黨，在日本是被禁止的。共產黨之在日本，除了常有警察加以注意，如屢次的把青年，尤其是學生，當作『危險思想』的分子加以搜捕外，實在不能表示什麼大的存在。並且，有些在數年前很爲活動的共產黨及左翼分子，現在竟成爲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了。

在一方是軍部，在他方是企業家與官僚，二者之間，有幾個爭論着的問題。第一是日趨嚴重的軍費問題。海陸軍人的計算自然比企業家金融資本家爲大。第二，對於產業政策，軍部主張應以軍事爲重，而經濟上的理由次之。

海軍之主張確保煤油供給，就是這種重軍事而輕經濟的意見之一。蓋由國家自給

的立場言，近十年來，日本的煤油，實大趨減少。如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四年間，煤油的消耗增加了四倍以上，而國內的產量則並未增加。於是結果，國內煤油產量與其消費的百分比，從三四·二%減至八·四%。雖然戰爭發生，日本可以用和平或其他手段，取得北庫頁島的煤油，蘇聯固無如之何，但是即其如此，由今日那樣的產量，也不過把煤油的供給，增加到二〇%，況且戰爭發生，煤油的需要必須大增。

因為煤油的缺乏，所以現在有許多計畫。如外國與日本本國的煤油公司，都必須常有六個月的貯積。對於這條例的實施，英美二國的煤油公司，曾反對了頗久，因為以額外的貯積，將增加其無理的費用。後來算得到妥協，公司答應這個條例，由三井洋行擔任貯積的利便。除此計畫外，海軍更強硬主張混合汽油與酒精的實驗，探查國內煤油產地，甚至那很少希望的地方，並且要求國庫設廠以從煤中提取煤油。現在，已有三個油廠建立起來了，二個在滿洲的撫順與四平街，一個在海軍要塞的德山地方。海軍這種確保煤油供給的要求，並為其南進政策的有力動因。因為荷領東印度是東亞最富的煤油產地，

而荷蘭則爲遠處歐洲的小國。日本海軍的南進計畫，便是要想在戰時能夠獲得這個最重要的煤油產地。

許多海陸軍官，尤其是那少壯的，自以爲是那些負債貧困的農民反對都市產業與金融的榨取的先驅。因爲他們覺得在農民中有最適於軍役的人才，並且又足以代表日本的舊道德，未嘗爲都市的頹風惡習所毀壞。因此之故，不管都市納稅人與受有抵押者的負擔，海陸軍人都竭力主張救濟農村。

對於增強國防，救濟農村及經濟政策須應軍事的需要等，企業家與政治家們雖不表示直接的反對，但對於擴大軍備的計畫，他們却採用了一種消極的抵制方法，在財政上加以妨害，使之不克實現。

二

這種急進與緩進兩派的鬥爭，便是日本政治生活除了議會黨派間的衝突以外的

中心。有時這種鬥爭是在幕後，不可得而見，有時則採取武力的形式，如一九三二年之五一五暴行與更爲嚴重的一九三六年二二六的軍人暴動是。但是，這樣的鬥爭卒無結果，因爲無論軍部或財閥，他們的衝突怎樣劇烈，他們的意見如何不同，到底不能有彼而無此。所以在西方人看來，危機雖然嚴重，必須有一最後的解決，而在日本却常能得到妥協，成立新的平衡。

蓋在今日日本最有力的兩大勢力間，彼此雖互相衝突，亦相依爲用。有些產業，尤其如軍械、機器、造船等以履行海陸軍的協定而得到巨大利益。而私人的商號，因在滿洲的發展也獲利不貲，雖然日本經濟的全體，未必如此。總之，日本的企業家，像其他國家的一樣，雖有時與海陸軍間有齟齬處，却不願降低其價值，認之爲保護貿易，促進商業的力量。同時，海陸軍的上級軍官，則以爲資本家雖是可厭，却屬必需。他們明白日本貿易、金融、生產的機構，若突然受到打擊，那末國家的軍力也將受到不良的影響。

二大勢力間的自然妥協，我們可由二二六事變以後的情形，看得明明白白。陸軍

方面的領袖以陸相寺內大將爲代表，答應肅正那些少壯士官中的急進分子，而以內閣政策容納陸軍的意見爲條件。故如二六事變參加者十七名之處死刑，可見陸軍領袖不惜以嚴峻手段維持紀律的決心，實與以前之含糊將事者不同。至此次事變，海軍是默從者。由此情勢，我們可知海陸軍的目標是比以前更爲重大值得注意了。

在日本的政策上，海陸軍具有不可忽視的指導力，而近年以來爲尤甚。許多年來，日本的對華政策是令人驚奇的兩重外交。外交家的溫和的姿勢，往往要受那些海陸軍人們橫暴恣肆的行動之反對。

此次新內閣成立，曾有數次受陸軍意旨的抑制。如廣田原定的大臣，其中數人即以陸軍的堅決反對而取消。內閣甚至不得不承認陸軍所提出的四點，作爲合作的先決條件。這四點便是國防之強化，國體之明徵，積極而獨立的外交政策，及國民生活的安定。

最後三點，實可說把從極微細的社會改革計劃到國家統制產業與經濟生活，都包括在內。『積極而獨立的外交』這也是很富伸縮性的語句。而『國體之明徵』則被視

爲壓制自由主義的憲法論者，像美濃部達吉博士那樣主張『天皇機關說』的婉轉說法。此外，如學校及大學教育的改革，必須依照更傾於國家主義或正統的辦法，也包含在內。

在四點中，其最具體而不許變動的，是海陸軍費的增加。日本的財源本已感到枯竭，一九三二年的預算分配，陸軍是二二七、四八〇、〇〇〇圓，海軍二二七、一二〇、〇〇〇圓。其後年有增加，至一九三六——三七財政年度，遂多至陸軍五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圓，海軍五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圓。差不多四七%的稅收是用於海陸軍費中了。

但是這樣的比例，還視爲不夠。高橋老藏相因爲反對軍部增加軍費的要求，致犧牲其生命。現在，想了許多方法以籌措增加的款項。由減低利息以還國債，固可稍節國庫，但爲了那所需要的巨額附加稅，馬場新藏相似不得不採取兩種冒着經濟危險的方法，即提高稅率與增發赤字公債。稅率提高自然要引起生活費的增漲。同時，更使工資與物價亦趨上騰，擾亂國內經濟的平衡。而這平衡則爲日本國外貿易所以有利的主要因素。至

於增發公債，則由許多財政家之所見，高橋之所發，雖沒有超過安全的限度，可是去早已到達了。

但是軍部的主張非常堅決。由各種情況，他們是可以達到目的的。陸軍所特別注重的是航空與機械部隊的增強，常把蘇聯之集中軍力於遠東，作為增兵滿洲的理由。由其要求，大概增加四師團。這便是當二十年代，日本表示和平姿態時所裁減了的。至於海軍，則以未來太平洋的無條約狀態為藉口，正如陸軍藉口蘇俄的威脅而要求增軍一樣。

在增加軍費，壓迫自由主義者，統制資本案，並謂國民經濟生活應以國防之緊急為主，這一切主張上，海陸軍人可說是完全在同一戰線，不過陸軍的少壯士官更比海軍中人橫暴不受節制而懷抱社會的急進主義。此外，對於外交政策，海陸軍人都是主張強硬的。

但是對於當前應取的目標，則海陸軍人之間却有明顯的不同。即陸軍主張西進，而海軍則主張南進，以事發展。

日本的陸軍是滿洲偽國的創造者。當東京舉行滿洲建國紀念時，我曾見到許多有名的日本將軍參加其間。以後，我旅行滿洲，感覺到在那裏決定行政及經濟政策的似亦爲日本的陸軍。雖在那裏，像日本國內一樣，也有軍部與財閥的鬥爭。如日本的商人以牟利爲主，而日本的專家顧問則旨在增進此新國家的利益。同時，與滿洲偽國密切關聯者，有華北問題、內蒙問題。在這裏，陸軍又是主要的角色。如那些往來飛行於長春、北平、瀋陽之間，操縱着內蒙及撤兵區域的傀儡的，都是陸軍的軍官，而不是海軍。

日本因了要想在華北扮演主要角色的決心，最近乃增兵於平津附近的地帶，多至一萬。這是陸軍西向謀大陸發展的重要行動。其意義表示日本的兵數從此將超過辛丑條約所規定的各國，日本的面貌要比前高傲起來了。蓋在東方，常只須把力量顯示一下，便已足夠，不必實地施用，這種情形是比他處爲甚。

正如因了地理的並職業的原因，使陸軍企圖西向發展一樣，在海軍是主張南進。陸軍的目標在滿洲的木材、大豆、煤、金，察哈爾的鐵，山西的煤及河北的棉花。海軍的發言人會一再提及南太平洋熱帶的糧食與原料，如煤、油、棉花、鐵、錫、大麻、椰子等，以促其企業家的注意。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高橋三吉大將，最近曾於大阪工業家的集會中演說云：『日本的經濟發展必須南向，以台灣及南洋委任統治地為根據，因此，日本海軍的巡歷範圍，必須擴展至新幾內亞、婆羅洲及西里伯島一帶。』

高橋大將於日本退出倫敦海會以後，曾告東京讀賣新聞訪員云：日本海軍的力量，可以擊敗英美的聯軍。對於這種南向以求經濟的發展的主張，石原廣一郎頗表擁護之意。石原氏は航業界的巨頭，並為一個比較溫和的國家主義團體明倫會的總裁。（這個團體的會員，大部分是退職的海陸軍官。）原來石原氏的航運及貿易都在南太平洋方面，最近他在名叫 Diamond 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日本應與德國及蘇聯聯合，『使歐洲各國無暇顧及東方。』他把阻止日人移居澳洲及南洋的政策叫作『不合

自然，『這些國家之禁止日貨進口，乃是採的自殺政策，由他之意，以爲『日本之南進政策可以解決這些國家當面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從經濟上言，日本的運命是在南方，實有其理由。因爲日本在南洋各地（如英領印度、荷領東印度、澳洲、新西蘭、菲律賓、馬來半島及暹羅）的國外貿易，曾從一九二九年之一八·七%，至一九三四年增爲二八·四%。除澳洲及新西蘭外，所有各地的居民，都購買力甚低，歡迎廉價的日本紡織物、腳踏車、橡皮貨品及其他雜貨。還有由過去的經驗言，日本移民也喜歡溫暖之地，而不喜比其本國諸島更爲寒冷的氣候。日本農民之移居滿洲者直到今日，其結果實微不足道。現在移居於北滿者，雖已有數千人，但是他們不得不與當地許多的義勇軍，往來作戰，生活實甚不安。反之，近數年來，日本在其委任統治的南洋諸島，雖地方有限，却已有三四萬的移民了，由現今的人口增加率，實不難於短時期內，即超過原有土人之數。如在菲律賓之大華屋（Davao）地方，日本移民對於生活的適應，頗爲良好，他們已在製麻一業占有支配的勢力，致成爲菲島政府之國內及國際問題。

但從政治方面言則以向大陸發展危險較少滿洲的建國已成爲既成的事實初不以各國外交上的不承認主義而有什麼影響。並且日本之更進而擴張其勢力於華北與內蒙，無論中國或列強，似亦不至有什麼劇烈的反對。在日本沒有越過黃河的時候，南京恐不會武力抗日，作孤注之一擲。至於西方列強，則據一個會於最近到過遠東的英國專家之所言，他們爲的保護其在華的利益，是在作後衛戰。至於南太平洋方面，日本雖可有巨大商業機會，但若一旦採取政治的發展，怕就要引起戰爭。在東方的熱帶與半熱帶地方，富饒的荷蘭殖民地也許是勢力最弱的一環。但是大家都知道，對於婆羅洲或爪哇的攻擊，是等於攻擊英帝國。

四

日本軍部這種並立的向外發展的勢力，一主向西，一主向南，實爲日本外交對於遠東利益互相衝突的列強，不能有敏捷而變化的運用之主要原因。在遠東利害關係最深

的，不消說是英美及蘇聯三國。據一般推測，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隔離蘇聯與英美的結合。這政策可以由下之二方法達到。

其一便是日蘇二國訂立不侵略協定，並於二國在東亞之勢力範圍間確立明白的境界線，這樣，由對蘇的諒解，使日本得以自由向南發展。其二便是以更為協調的態度，日本對於海軍問題，滿洲煤油專賣問題等表示和協，那末以與英美的對立關係的緩和，可以增強日本對抗蘇聯的力量。

但是，對於這二個方法，日本却都不採用。日本之於蘇聯，以邊境哨兵之時有衝突，其境界的關係是非常緊張；可是同時，對於英美，日本却並沒有和協的姿態表示。這種外交的失策，有幾個原因。其中如日本之欲在中國確立絕對的支配地位，誠是最關重要，但是海陸軍人職業的對立，以及彼此相制，不願對方占有優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說來，難道日本的海陸軍人是願意戰爭的嗎？問題倘是這樣的露骨而直率，那末回答是否定的。因為現代的戰爭，不止在參加戰爭的個人是極大的危險，即就交戰國

的整個政治與社會秩序言，也是如此。日本的海陸軍人當然不是盲目的，會不知道戰爭失敗或停頓時，由國內的不安，將引起巨大的危險。

姑不論日本進步活躍的工業，在經濟上，金融上，其力不足以當長久的大規模的作戰，並且國內的現金準備，不過值五億餘未貶值時之日圓（等於美金二億五千萬圓）。此外，日本在外國的存款及債券是十五億圓，而所欠的外債則有七億至七億五千萬圓之數。且其中只有一部分的外國證券是易於兌換的。凡此都表示在顯然缺乏主要的軍事原料品如煤油、橡皮、棉花等的國家，其軍事資金是甚為不足。一個同情日本軍事地位的學者，名叫肯待上尉（Captain M. G. Kennedy）的，在他的近著日本問題（The Problem of Japan p. 235）中說：『若戰爭發生，那末日本勝利的機會將在她的能否迅速作戰，並給與敵人以巨大打擊，因為如此，乃可使戰爭於短時期內終結，並使敵人遠離其足以轟擊日本的海岸。』就現在的情形言，足使日本牽連在內的，殊惟有對蘇俄英國及美國的戰爭。於是在這裏，問題便是：究竟這些假想的敵國，除了意外的原因，如國內

的紛亂或他處非常重要的急務以外，會不會如肯待上尉的所言，有迅速擊破的可能，給與日本以成功的機會呢？

先就俄國言。假定日本一切的軍事估計都能順利進行，蘇俄的空军並不能使日本易於燃燒的城市受到損害，而日本的軍事，則其成功有如前次日俄戰爭一樣。但是，蘇俄在遠東縱是接連失敗，其工業與人口的主要中心，固毫未受到打擊。倘若蘇俄內部沒有發生劇烈的大動亂，（這種突發事件的可能，現在是已比一九二二或二三年時更少可能了。）歐洲方面也沒有什麼干涉，那末蘇俄儘能在貝加爾湖附近成立新陣地，並以時間、氣候及西伯利亞的遊擊戰，作為其戰爭的助力。

至於與英國、美國或者二國聯軍發生海上戰爭，則在第一期，日本可以有顯著的成績。日本的艦隊與遠征軍，以其迅速的連續的突擊，也許可在英美援軍尚未到達以前，即取得香港、婆羅洲、及菲律賓。但此等成功，對於英美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影響，實微不足道。結果，日本之所得，由戰爭的延長，是戰費的增加。這是一種經濟上的持久戰，以日本之力

實不足與英美敵。

要之，日本海陸軍人的目標，我們可以總括之如下：最爲重要的，與其他各國的海陸軍人一樣，便是要求有更強大優良的軍備。據說已決定以一個退職的海軍大將任其在熱帶的海島台灣的總督了。（譯者按即小林躰造大將）這意義實值得注意，尤其是限制太平洋設防的條約將要失効的時候。在國內政策方面，軍部主張社會與經濟的組織，應更軍事化、團體化、一致化。他們要求國防與農村的救濟應超於利益與耗費的打算。他們主張應該在所有的教育制度上，確立日本舊日的信仰與觀念，嚴厲取締一切搖亂人心的西洋的主義。最後，陸軍以爲其特別任務在擔任對黑龍江的警備，而海軍則以保障日本在南太平洋之商業及其他利益爲其使命。

本篇作者張白倫氏爲美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之東京通信員，以前，居莫斯科者達十年，故其著作多述蘇俄，最著者有“Soviet Russia,” “The Soviet Planned Economic Order,” “Russia's Iron Ag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等。本篇載美國 Foreign Affairs 季刊十月號。譯文間有刪節，然爲數不多，且無關重要。——文夫附註。

二 日本大陸政策的基調

今中次磨

曾經讀過非希德的封鎖商業國家論，最近，又正執筆寫日本的政治史，由這二件事，使我對於日本的大陸政策，把握了一個方向。非希德在其所著書中，說到怎樣去消除資本主義國家的弊害，這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現代，實最富於暗示。反之，由日本政治史的研究，使我得到了亞洲大陸諸國，何以直到今日尚不能如日本一樣完成民族統一的理想之根本理由，並且明白此等封建國家，要完成民族的統一，應該採取怎樣的方策。

關於中國的問題，與日本不同，中國現在正當設法以完成近代社會的階段。因為中國直到今日還是封建社會，這可由以下諸事來說明：

一、中國在事實上，訓政時期實未成熟，而爲軍政時期。目前南京的任務，是在竭力打破分散各地的武力，而完成武力的統一。這武力的分散，便是封建的特徵之一。

二、是貨幣的商業的勢力之分散，如商業公會勢力的存在是。在中國，各地方的財閥，都與政治相關。但這所謂財閥，與日本現代者不同，而是與日本封建時代商業的貨幣的勢力同其性質。在封建時代，武力常與商業的貨幣的勢力有甚深的關係。

中國貨幣的無統制，就是這種時代情狀的反映。

三、在人民的社會生活中，也可看到許多的封建性。例如貧富的懸殊，且其間缺乏中間層；上層分子是不事勞動而以地租或利息爲生活的人；還有如家庭的形式與社交上的形式主義等，也可例舉在此內。

爲日本大陸政策的對象的鄰國，這樣是並沒有脫離封建社會的情形。反之，日本不僅已成爲近代社會，且其民族主義的時期亦告終結而進於帝國主義時期。日本的民族主義始於德川時代，由明治維新的完成，乃成爲民族統一國家；迨明治以後則入於產業

革命時期，至明治二十年代之頃，已告終了，洎至中日戰後，則已走到民族主義成熟期的民族膨脹時代了。因之，互明治之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日本是已由產業資本的勃興期而進於金融資本的發展期，向着國外，迅速的作民族的膨脹。在這時代，所有的一切部門，都表現發展的傾向，其國家社會的前途，毫無陰影。而日本資本主義當歐洲大戰時的顯著發展，則使日本社會從民族主義進於帝國主義。自此以後，各部門間乃發生相互的矛盾。例如人口之自然的增加，在以前可以向國外去謀發展，但是現在漸趨閉塞，增加起來的國內人口，固定於內部，不能向國外流動了。這意思表示日本殖民地的變質。日本的殖民地已不是容納過剩人口的地方，而為投放過剩資本的地域了。此種現象，自大正七八年以來，日益加甚，直至昭和六七年之大失業時代，乃達於深刻的發展。這是我們由統計可以明白知道的。

爲了解決國內所發生的人口過剩問題，政府雖竭力獎勵殖民，但如北海道、樺太、滿洲等地，殖民之數反以減少，原來時代已非民族主義，其間包含有帝國主義的矛盾了。因

此事實，於是對於軍備戰爭等等，發生了新的輿論，大衆對於戰爭與軍備的態度的冷淡，已在大正四年日德戰事及大正七年的出兵西伯利亞，表示出來了。

所謂軍人爲戰爭而貢獻其生命者，這一句話，倘若沒有忠君愛國之念，到底是不能的。軍人之主張絕對尊皇，誠屬當然，因爲若不如此，就不願去犧牲其生命了。例如在從事戰爭的軍人頭腦中，若一旦發生何爲而戰的疑念，那末他們將不願於戰爭。故在這裏，倘若他們的從事戰爭，不是爲的忠君愛國，不是爲的日本人民大衆，而只是爲的財閥與特權階級的利益，他們是決不肯真正作戰的。這就是今日軍部當面的問題，所謂廣義國防的根據之所在。

在民族主義時代，社會之階級的分裂不甚顯明，因爲所有部門都能有並行的發展，故此一問題，可說並不存在。反之，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因爲各部門利害關係的矛盾，已甚顯明，於是任何戰爭，任何政策，必不是都與全體同樣有利，結果發生了在這一方面，有不當的利益，而在另一方面，則須受不當的損害的現象。這是現代戰爭的複雜性，我們即在

言政策時，也應該仔細加以考慮的。

由上所述，所以若於日本現今所立的階段與對手國現今所立的階段，二者間之不同，沒有正確認識，並以此為根據，那末日本正當的大陸政策就無由確立起來。

二

中國今日是封建社會，正在謀統一國家的完成。因之，對於中國，當以參考封建時代的諸政策為是，若以日本現代政治經濟行政上的頭腦，來作觀察，到底未免錯誤。

在中國社會，軍閥之專制的剝削所以這樣橫行，就是因為係封建社會。這與德川氏以前的日本，正屬相同。今日的南京恰等於德川家康的政權，現在漸臻統一。自東北政權與西南派沒落以來，這個希望在一一般人的頭腦中，是更加濃厚了。誠然，中國今日的武力統一，是尚在進行中，但是當封建社會階段的國家，武力統一原有其必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一般人所忽略的，是民族的統一，決非單由武力所能完成。

我們試觀日本鎌倉、足利、安土、桃山、德川諸封建政權的興亡過程，在這其間，可以看出商業資本對於農業勢力的密接交涉。商人對於農民的經濟勢力的變動，常使封建政權趨於崩壞，度之，若對此二勢力能有良好的統制，那末便可獲得政權。

北平有一友人曾致書相問，他說在中國，武力統一往往到了完成的瞬間，可是卒因維持的困難，趨於失敗，袁世凱等就是如此。我的答語說：這是以爲單是武力便可統一，而忘記了對其他方面樹立統制之故。

在日本，就可明白的認知這種事實，而我們所必須列舉的，在一方面便是貨幣勢力對於武力的壓迫，他方面是立脚土地所有勢力上面的封建武力，因爲對於土地不能統制恰當，於是卒難以維持其勢力。鎌倉北條氏以後商業座的發達，本來由於政府之商業統制，可是到了這種政策的性質一旦喪失，而代之爲純然公會的自治組織的時代，武士們因座所受的治上的壓迫，實甚巨大。如天保十二年的政革，乃是爲了打破商業座所有經濟勢力的重壓，這是座制破壞運動。對於明治政府之統制全國經濟勢力，頗有相當

幫助，倘若彼時，各地的座的勢力竟是非常強大，那末明治政府怕也不免相當困難的。

故如北平及各地所通行的許多貨幣，實爲嚴重的事實。我嘗與冀察政府有關的某要人相見，即說到這是武力以外可以注意的要素。

此外，農業的勢力，在封建社會也是重要的問題。在農業國家並立脚於大土地所有制基礎的封建政權，土地政策也是最重要的。如在日本，對於土地的移轉及如移轉樣的土地的抵押，曾加取締。日本於明治五年解除土地永代賣買的禁令，自此始確立了土地所有權的近代性。在此以前，土地是受統制的。但是今則於武家政權之外，發生了大土地所有者，這意義實等於武家政權自身的破滅。故在封建時代，農民雖已爲自由農民而非農奴，但是農業可並不自由，而爲受有制限的不自由的農業。關於土地所有及移轉的統制，所以在封建政權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社會的特徵，是所謂土豪劣紳的存在。即商業的貨幣勢力與由大土地所有而造成的地方勢力的存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在北平時，曾以某之嚮導浴於西山的温

泉。在那裏，就中國的農村言，實是非常清潔整齊，據說是依照理想的村落而計畫起來的。但這可不是公所或政府的力量，只是由一個私人以其地方大地主的理想而建造起來。地主，小一點就是村長，大一點則等於諸侯。可是這種農業地主的勢力，若仍散布於各地，那末民族統一是不辦不到的。

在德川時代，有浪人的勢力，在足利時代，有土民一揆，當北條氏的末期，地方的地頭，成爲割據分立的狀態。此種情勢，正是封建的暴動之基礎，爲農民運動之所由生。此種勢力，其性質本不足以發展爲革命的勢力，只是治安的障礙，爲阻止民族統一之一種勢力。以上那種分散的勢力，倘不能加以統一，那末民族統一就無成功之望。

還有更重要的問題是對外關係。日本民族統一之所以能夠成功，即因對於外來勢力的侵入能善加防止。如長崎之大村純忠問題等，即明白表示其意義，在日本，爲了排斥外來勢力所欲扶植的勢力，切支丹禁制與鎖國政策，實大有作用。由鎖國政策，不僅防止了外來勢力的侵入，此外還有二種效果，其一使貴金屬之流出國外，得以相當阻止，其二

使中央權力不致以地方政權與外來勢力的結托而衰弱。這都是德川氏鎖國政策的效果。中國直到今日，民族統一所以不克成功，即因不能鎖國閉關。德川末期的有識之士，他們所最懼的是外國勢力，這由目前中國的事實來看是可以明白知道的。

所謂外來勢力的侵入者，因為這使地方政權強化，使民族統一所必要的經濟資源枯竭，且使其政權陷於腐敗，對於民族統一實為最大的障害。所以在早已為外來勢力所蹂躪的中國，倘若不能脫離這種外來勢力的支配，不能助長民族經濟力的發展，那末要想統一地方政權而完成中央集權，實甚為困難。因此之故，雖然困難，也必須勵行鎖國政策，把一切業已扶植起來的外國政治經濟勢力，驅諸國外，以養成本國經濟力的基礎。

近代人對於鎖國政策，實太不理解了。故雖然有如非希德那樣論鎖國政策的必要，且有如近來蘇俄那樣付諸實行者，一般人仍期期以為不可。惟筆者之意，以為中國今日所必要的便是鎖國政策，除此以外，就無完成民族國家的方法。且中國建國之成功與否，怕就要以能否實行鎖國政策而定呢。

三

中國是主權的獨立國家。然則中國與日本二者的立場，究竟須以何種方法始能成立真的提攜呢？則我以為只有下之一法。這方法便是：中國承認日本的生命線，並其與大陸的重大關係，而加以尊重。同時，日本則承認由中國民族統一的完成，乃始能在中國確保所謂日本的生命線這一事實。

何以中國民族統一的完成，有利於日本生命線的保持呢？因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日本生存上的脅威，並不是大中國的存在，反之，甯是由於歐美列強侵入瀕於崩壞的中國而造成之勢力與利權的存在。日本幾次流血於滿洲，就是為的此故。

在日本看來，現今最為必要的，是排除歐美的勢力於中國，使之不得在此樹立歐美帝國主義支配的根據地。這一件事，不僅是日本的利益，且更為中國自身所必要。只有關於這點，兩國始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原來肇中國分割之端者，是英國，是歐洲列強；日本不能與中國，共加排斥，而在過去反自己也循此政策以行，這實是最為拙劣。且爲了遠東孟羅主義而不惜日俄戰爭的日本，更在遠東承認列強之機會均等，則尤爲愚妄。由此可知日本最有利的大陸政策，決不是中國的分割與其權力的分散，而爲排除外來勢力的支配，加以保全。日本現在正當這樣的時機與必要，依據正確的新方向，而轉換其大陸政策。

因此，日本似不當共着歐美列強在中國造成分散的勢力，反之，應該謀中國之保全，而爲之驅逐現有的外來勢力，使中國得以完成民族的統一，實最爲上策。日本倘能確定這樣的態度，那末中國也必樂於贊同，這是中日提攜最好的方法。

現在中國上下對於南京正致其期望，漸視爲一中心，日本爲實行此對華政策，就不可不認定這個自清室傾覆以來，久已喪失的目標。日本向來對華政策的動搖，大都是由於求中心點的錯誤，因爲中心沒有確立，於是對華政策感到艱難。

不過現在的中國人，因爲受東省事變及其後日本大陸政策的反映，影響過深，致對

於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脅威，沒有認識的餘裕。但是他們若能冷靜的加以考慮，是必會感到歐美列強帝國主義脅威的深刻的。惟因日本對華政策之太不賢明，致與他們以不當的威脅，他們是也知道的。要之，因為日本對華政策之不統一與動搖，亦使中國要人對於日本大減其信賴之心。

目前的華北，因為日本用意的不鮮明，致暗淡而不明朗。而由於這不鮮明，受損的反是日本。結果，在華北政治工作遲遲不進，反以後退，只餘着經濟的工作，日本勢必至亦同樣走歐美帝國主義的路。

固然，要想明白把握，有所不能，但是日本之對華政策，倘能合理的加以改正，那末由滿洲的建國而給與中國的傷痕，必是可以漸趨平復的。現在，日本的對華政策，或者是過傾於與歐美的協調主義，或則為缺乏實行的空彈，這樣，兩國關係必將益陷於不可挽救的泥沼。現狀如此，宜前途之未見有何等光明了。

三 日本之北進論與南進論

堀真琴

日本之轉變爲資本主義，在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前後，始急速完成。蓋在當時，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已入帝國主義階段，其殖民政策正集中於東洋，尤其是中國、朝鮮、日本。因此種國際情勢的壓迫，故勢乃不得不然。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三月二十四日東京橫濱每日新聞之社論，實最明白的指出當時的國際情勢：

「蓋亞洲之版圖雖大，然北方全部已爲俄有，若就南亞諸國，如以列舉，則其數雖多，却未有一個能具獨立之主權者。如緬甸、安南、暹羅，爲英、法二國或一國之主權所左右，如印度則爲英國所侵蝕，又如波斯，近亦爲英、俄二國所注目，恐將不久即喪其今日之地位。其僅保獨立的位置，足以與歐洲列強之力相抗者，惟中國、日本、朝鮮而已。然朝鮮版圖狹小，國勢不振，俄者一旦起南侵之心，則朝鮮之獨立，殊不難於一朝之間，趨於覆亡。故東方諸國，除中國與日本外，實無可稱爲獨立國者。歐洲強國之所以能橫行於東方海上，非偶然也。」

日本爲了對抗此種國際的壓迫，於是有急速資本主義化的必要。自明治初年至中日戰爭約二十年間，便是日本發展資本主義的狂飈時代。各種產業，以纖維工業爲中心，都向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進行。而此過程，則以戰爭爲其指標，尤有飛躍的展開。如在二十年代已趨資本主義化的纖維工業，至中日戰後，乃更發達，其製品由粗工的、加工的原料品階段進而爲粗工的製品階段，其他工業也同樣開始這種傾向。日俄戰爭以後，此種傾向更進。於是同時，如合併組織與其他產業高度化的傾向，亦甚興盛，有大規模工業之出現。另一方面，因了關稅自主權的恢復，保護關稅政策的採用，亦促進新的機械工業與化學工業之發達。如製鐵業之走上發展之路，亦在日俄戰爭以後。自經歐洲大戰，日本資本主義此種發展的傾向，乃完全入於獨占的階段。纖維工業已自粗工的製品達到精工的製品階段，其他各種工業，也都確立其技術的與財政的基礎，進向粗工的階段。且由電力的普及，使原動機電力化之傾向，亦趨於一般化，使生產之集積、資本之集中，更趨高度化。

惟日本資本主義此種發展，其基礎在低工資與強化勞動，受制於農村半封建的經濟構造，即必須犧牲農村始有可能，尤其是為日本資本主義中心而發展最早的纖維工業，此種現象，最為顯著。因之日本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之初就感到國內市場之狹隘。但是其後，纖維工業依然在工業生產中占最大部分（其在全工業生產額中所占之比率，大正八年為四九·四%，昭和八年為三四·三%），加以重要原料資源之貧弱，因國際的壓迫而常帶軍事的性格，遂致結果，日本資本主義不得不以開拓外國市場為其積極的對外政策。首相山縣有朋在第一議會中就有如下之演說：

『國家獨立自衛之道，一在保守主權線，二在防衛利益線。何謂主權線？國界是也。何謂利益線？即與我主權線之安全有密切關係之地。凡國家而不能保守其主權線，則其利益線亦必不能為所保有。今處列國之間，如欲維持國家之獨立，則單是主權線之防守，決不足夠，必須對於利益線，亦能加以保有。惟欲完全保其國家之獨立，此固非一朝之空言所能成，必須在其國實力所可能之限度內，日積月累，以達到能有成績之境地。』

昭和六年以來，日本資本主義進於所謂軍需與輸出膨脹時代，軍需工業生產與輸

出貿易之增大，實以急速的步調而發展。但此膨脹景氣却完全不能消除日本資本主義機構之弱點。軍需工業之生產雖然增大，而由各工業部門間發達之不平衡所造成的跛行性，却日趨濃化，加以必要的重要原料之貧弱，遂使日本資本主義的缺點，更爲增大。又如輸出膨脹，這完全由於低工資與低匯兌，但在國際貿易戰爭日趨激化的今日，就不得不受關稅障壁、輸入制限等手段的阻害。且以財政膨脹與增稅之脅威，使大資本將工資之一部轉嫁於中間層，於是低工資乃趨更低，國內市場之狹隘化更以加甚。因此，日本資本主義之有賴於外國市場，乃更爲必要，遂使其對外國策，不能以向來的手段爲已足，而必然的帶有積極性。

於是採取北進國策以確保滿洲與華北，或採取南進國策而向華南及南洋一帶謀發展，遂不止是今日對外國策之中心題目，且爲日本資本主義欲解決其機構上的弱點之根本問題。

北進論與南進論之作爲對外國策而加以討論，雖在中日戰爭前後，但若欲更往上

溯則可說是在征韓論時代。惟以現實的意義而加討論，則畢竟自中日戰爭前後始。當時歐洲列強，爲打開其經濟恐慌，補償其利潤之減低，求取廣大的商品市場與低廉的原料市場，都集中其侵略政策於中國及朝鮮。而朝鮮則尤爲帝國主義向遠東以事發展的根據。於是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有英人之佔據巨文島，俄國爲了遠東政策的必要，乃要求英國撤兵，謂若不然，俄國將占領朝鮮的另一部分。由此一事，可見當時歐洲列強向朝鮮以謀發展的情形。此時，中國自身本已爲歐洲列強侵略的對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爲了要避免國際的重壓，乃進而謀使朝鮮隸屬化。而日本這個時代，也正以國外市場的開拓爲其對外政策。因此，日本的登台不免時嫌過遲。故日本爲實行其對外政策，遂不得不先從驅逐中國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勢力入手。中日戰爭便是這樣爲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勢不能避免之事。

但因日本對中國的勝利，接着使日本於朝鮮與歐洲列強，尤其是俄國立於對峙地位。俄國頗不喜日本的侵入朝鮮。在中日戰爭時，俄國即因其對朝鮮政策，深爲注意，竭力謀

己國利益之擴張。這是後來三國干涉那樣直接行動發生的由來。因了三國干涉，於是在日本國內，發生抗俄親英派與親俄抗英派的對立。後者以俄國之東方計畫，為百年的趨勢，若與之為敵而欲加以驅逐，那到底非日本之力所可能，故主張與之妥協，而擁護朝鮮的獨立。前者不然，以為俄國之懷抱併吞滿洲、朝鮮的野心，是顯然的事實，此時若與俄國妥協，不過苟安一時，故還是與英國提攜以抵抗俄國遠東之侵略為利。親俄派的代表有伊藤博文、井上馨等；親英派的代表有山縣有朋、桂太郎等。真的，如他們所共同認識，俄之侵略政策，自三國干涉以後，進展尤速，如與中國訂立密約，設立華俄道勝銀行，建築東清鐵路，經營旅順、大連，且以庚子事件為樞機，實行滿洲之軍事占領，這樣，其威力所至，自然要直到朝鮮。而朝鮮地方，則由山縣所言，是日本主權線與利益線的結合點。因此之故，遂與俄國勢不能不發生衝突。但是當時日本的軍事準備，尚不足以單獨抗俄。因之，或主與俄國妥協，使在朝鮮承認日本之優越權，或則不然，主與英提攜以共同抗俄，在此二者之間，實不能不有所抉擇。

日英同盟與日俄協約的論戰，這樣展開於桂與伊藤之間，結果在數次電報往返之後，桂之日英同盟論得到勝利。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二月，第一次日英同盟條約的締結，實爲外交史上有名的事件。但在此時，雖如山縣與桂，推其用心，對於俄國之重壓，是頗想於和平之中，力求避免。故自二十九年二月山縣與羅巴夫協定之後，同年五月有小村與威巴協定，三十一年四月有西與羅純協定，至三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乃成立滿韓交換提議。即（一）於朝鮮國境兩邊，各設立五十杆之中立地帶，彼此允不派兵；（二）日本承認滿洲在其利益範圍之外，俄國則承認朝鮮爲非其利益範圍。這樣，共十一條，日本表示對俄的讓步。

惟伊藤之親俄論，亦非無理由，其意以爲朝鮮問題的解決，平空加入與朝鮮利害無關的英國，徒使之得有發言機會，實無利於日本，故他雖給人斥爲畏俄派，却主與俄直接交涉以解決朝鮮問題，認最低限度之讓步爲不得已之事。但是後來，日俄協定的進展，並不如他之所期待，反日趨惡化，因此，妥協論的伊藤，最後遂漸成爲抗俄論者，三十七年二

月四日最後之御前會議，伊藤態度最爲強硬，認斷絕國交爲不得已，給與廟議以確定一致之力。於是乃有宣戰詔勅的發布在這種情勢下，便發生日俄戰爭。結果因了日本之大勝，於是不僅朝鮮完全爲日所有，在滿洲也認日本享有優越權。日本所多年期望的國外市場，遂在大陸上得到確實的把握。這是以北進論爲其對外政策的由來。

隨着日本資本主義在滿洲市場的優越性，乃向中國市場作積極的侵入，於是代着俄國，而與英美形成新的對立關係。英國保險公司獲得法庫門鐵路，事在四十年（一九〇七）至四十二年十月，中國與保險公司及美國銀團間，更成立錦愛鐵路借款。同年十一月，更提出有名的諾克斯滿洲鐵路中立計畫。英美日三國這樣在滿洲與中國的對立，日趨惡化，而日美關係則以三十九年之排日學童問題爲契機，尤爲嚴重，當四十二年頃，曾一時形成日美開戰之論。因了此種對立關係，遂使日本企圖與昨日之敵俄國相接近。由日本與美國之交惡，及日本與俄國之接近，日英同盟之使命，本來已半告終結，但是因爲歐洲方面，英德帝國主義的對立，卒使英國在四十四年有繼續同盟的必要，不過盟約之

中，現在除去了英國於日美戰時須援助日本的規定。

日本之參加歐洲大戰使之對於中國及南洋有積極發展的好機會。這便是使日本於占領膠州灣後，得以拒絕交還膠州灣的保證，而在將來交還之時，確保其優越的發言地位，又在占領南洋諸島以後，得到將來議和之際，保證其有代價的領有權，這些事情，以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一月之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爲其序幕。日本思欲由此要求，而積極的侵入中國。但此要求，不僅中國視爲國恥，表示反對，即在英美也反對甚烈。如美國務卿白賴揚的抗議中云：『凡妨害美國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及中國之獨立，及領土完整，並門戶開放主義者，俱不能加以承認。』於是日本爲使未來和會中將要討論的山東問題，獲得列強的諒解，乃於大正四年加入倫敦宣言，六年，重訂日俄秘密協定，並成立日美共同宣言（石井藍字協定）。但是，就在同年十一月，因俄國革命，秘密協定爲所破壞，更因美之參加中國問題，反使美在中國有積極發言機會，日本陷於國際的孤立中。

日本在和會及華府會議中，其對華計劃之退却，就是因爲這種國際的重壓。但是日

本的大陸政策，不論產業的或軍事的，都非加以實行不可。大正七年至十年的出兵西伯利亞，雖是由於美國的提議，目的在援救捷克軍，但在日本，也是實行大陸政策之所必要。不過結果，却如加藤高明在貴族院的演說：「外招列國的不信，受俄國的怨恨，內使陛下之干城，長曝於異域，消費莫大的國帑，而於國家無些微的利益，誠外交上稀見之失政史也。」

在英美日三國帝國主義的對立，日趨激化之中，中國之民族革命日有進展，而成立南京政府。於是多年欲向中國發展的美國，率先援助南京，既不認滿洲及華北一帶為日本特殊權益之範圍，且反對英國之二重政策，唆使反英運動，以謀驅逐英國的勢力於華南。英國由其豐富的經營殖民地的經驗，繼續其極富彈性之妥協與奸詐的對華政策。因大戰中棉布市場為日本所奪，乃以精工業市場為代，由其特權一部之拋棄，使反英運動巧妙的轉化為排日運動。而為牽制南京與美國之結合，則一方面與西南勢力接近，以鞏固其經濟的基礎，他方面對日本的滿洲政策與以相當的默認。因之，日本在中國看來，始

終是革命的死對頭，排日運動致展開爲全中國國民的口號。在這種情勢之下，滿洲事變的勃發，實爲勢所必然。

但是滿洲事變後，日本之大陸政策，事實上一方面造成了與蘇俄相對立的新局面，他方面則使全中國的抗日形勢，更以激化。蘇俄因其五年計劃的成功，在日本已爲最大的脅威，因此，日本會屢次提議設立非武裝地帶，藉謀日蘇的妥協。但蘇俄以爲非武裝地帶之設定尚有不足，應該還有不侵略條約的訂立。由這立場的不同，於是或認對方有攻取遠東之意，或認對方欲確保其大陸的侵略。最近北守南進論之抬頭，即以此故。由此主張，以爲日蘇的對立及華北的停頓，勞多效少，徒耗國力，應把國策的進路轉至南方海洋方面。況在那裏，資源之富，並不亞於大陸。例如荷屬印度之煤油，馬來半島、澳大利亞、新西蘭之鐵礦、澳大利亞、新幾尼亞之羊毛，天產之富，實使日本垂涎不止。且就地理的位置言，日本比之歐美列強，亦處於極有利的地位。

但此等地方，我們須知已爲英、美、荷之金城湯池，不許他人介入其間，這是由上海事

變中之發動斯汀主義，便可明瞭的。且在實際上，日本在此等地方的勢力，實為不及，我們由下列的數字便可明白。

列強在南洋之投資額（據一九三四年南洋協會調查）（單位千圓）

	英國		荷蘭		美國		日本		總計
	投資額	總計	投資額	總計	投資額	總計	投資額	總計	
煤油	2,880.0	—	1,840.0	—	20,000.0	—	—	—	24,720.0
錫	—	—	3,150.0	—	—	—	—	—	3,150.0
鐵	1,830.0	—	3,600.0	—	—	—	—	—	5,430.0
金銀	800.0	—	1,830.0	—	—	—	—	—	2,630.0
其他	600.0	—	1,290.0	—	—	—	—	—	1,890.0
礦業 共計	5,080.0	—	9,760.0	—	—	—	—	—	14,840.0
農業 橡皮	1,600.0	—	8,000.0	—	100,000.0	—	20,000.0	—	119,600.0
農業 其他	5,000.0	—	1,000.0	—	—	—	30,000.0	—	6,000.0
農業 共計	6,600.0	—	9,000.0	—	100,000.0	—	50,000.0	—	125,600.0
總計	11,680.0	—	18,760.0	—	100,000.0	—	74,700.0	—	215,140.0

由此種積極的發展，故在今日，國際的對立，實非常激烈。於是南進論者中，乃有主張充實海軍以謀南進者。但充實海軍，要想足以與英美相對抗，今日之日本，到底勢不可能。且要使英美兩國的海軍加以分離，在今日處於國際孤立的日本，也全不可能。故決定國策的進路，而欲與此不能分離的二大勢力為敵，將不過把歷史加以喜劇化而已。

有賴於國外市場之日本資本主義，其對外國策之實行，由上所述，可知是無論南北，都陷於窮途困境。然則日本資本主義果已完全無法足以開拓國外市場嗎？不消說，在今日帝國主義對立非常激烈之中，把業已分割完了的殖民地，加以再分割，勢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日本資本主義之欲以中國為其國外市場，却並不是不可能的事。誠然，今日之日本與中國，是在戰爭的前夜，關係甚為銳化。因之，要想在中國市場有經濟的發展，除非能把國交作根本的調整，否則便不可能。於是我們不可不先確立平和的外交方針，使對方不致有武力侵略的印象，且當因地制宜，與以相當的讓步。又，中國今日正在達到近代的統一之中途，我們殊不應加以壓迫，反之，應該加以輔助，俾得完成為近

代國家。這都是最關重要的事。

總之，在目前，與其高唱北進或南進，還是講求與中國之提攜，或足爲日本資本主義
開拓國外市場之一條路。



日本前首相廣田宏毅



日本現首相林銑十郎

——平子摘譯自中央公論十二月號

四 日本之南進政策與海南島

石丸藤太

日本有三個生命線。第一是大陸正面的生命線，在『滿洲國』。第二與第三是海上正面的生命線，前者指受日本代管的諸島，後者即荷屬東印度、菲律賓賓及英屬北婆羅洲等。

在這三者中，第一與第二生命線已為日本所取得，惟第三生命線尚未入手。但是日本為欲在太平洋上，政治的並經濟的占有鞏固的地位，那就無論如何非保有第三生命線不可。以此，日本向南洋的和平發展並占得一席之地，乃是非常的急務。這是我的信念，我的主張，已不止一次的提出過了。

近來這個主張已漸爲世人所認識，那所稱爲南進論者，其意義即不外是確保此第一生命線。最近朝野上下對於此南進論，頗有風靡全國之勢，這是我所欣快無已的。

但我尚抱着一個疑問。即此等南進論者，他們對其所主張的南進論，與問題的海南島有何等關係，會是否有所認識呢？每當從東到西的經過中國南海，望着那海南島的最高峯五指山，我就不禁想起此島與我第三生命線的關係，屢次沈於思索之中。

可是畢竟來了使日本人得以認識的機會。這便是最近的北海事件。由這事件，使日本人的眼光，立即集中於該島。於是向爲我們所忘却，所不顧的海南島，遂在日本人的頭腦之中呈現了出來。

海南島不止對華南具有重要關係，對於日本的南進論，也居重要的地位。何以呢？因爲海南島在華南，尤其是廣東廣西方面，是作戰的根據地，具有重要的價值。這次北海事件，日本的南遣枝隊即曾駐此，可知其重要爲如何了。

海南島對於兩廣的位置，若假定兩廣猶如輕氣球的氣囊，那末海南島便是吊籠，中

間的雷州半島是氣球頸部的吊籠網。像氣球是由吊籠以爲操縱一樣，倘以海南島爲根據地，那就可以支配兩廣了。這情形，倘把前次的日俄戰事來加對比，那末更加可以明瞭。前次日俄戰事，俄國的陸軍集中於滿洲方面，其艦隊則分駐於旅順及海參崴，以謀分頭擊破日軍。對於這形勢，日本海軍爲的對旅順及海參崴的俄國艦隊都能應付裕如，乃選定居於中央地位的佐世保軍港，作爲根據地。日軍卽以此爲根據，先事擊破旅順艦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這種作戰上的姿勢，若與兩廣形勢相對比，則廣東猶如俄之沿海省，廣西及欽廉一帶猶如滿洲，雷州半島正如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海南島，則爲日本的九州。北海事件，日本南遣枝隊所以駐軍於海南島，正與日俄戰時，日軍艦隊以佐世保爲根據地一樣。海南島的地位這樣對於兩廣方面，無論是軍隊的登陸以及海上交通貿易等，都有支配全局之勢。換言之，海南島是在足以控制兩廣的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在作戰上，距離原來是個重要的因素。無論怎樣的根據地，倘其到達主要戰場並作

戰目標的距離，過於遼遠，那末常足喪失其價值而成爲無用。但是海南島因其至兩廣的距離都在五百哩以內，較之日俄戰時佐世保至俄沿海省及滿洲海岸是近得多了，故其地位是更有利。

且以廣東爲根據的中國艦隊，是以老朽的輕巡洋艦一隻爲基幹，其勢力實不足齒數。故以海南島爲根據地的艦隊，儘能有自由的行動，如對於沿海都市的砲擊，利用飛機的空中攻擊，或送軍隊於必要地點而上陸，或對兩廣實行封鎖，都可處處裕如。由此可知海南島在華南戰事中，其地位的重要是非常明白的。

二

其次，要說海南島對於太平洋尤其是南洋的爭霸戰，其關係是如何且日本的南進論，其關係又是如何。

在所謂二十世紀爭霸舞台的太平洋，這爭鬥是以中國及南洋爲中心的。中國本早

已是太平洋爭霸的中心，到了最近乃更爲重要；除中國外，爲列強爭霸的中心的，便是南洋。

南洋不止是原料產地，並可資移民的處女地，且是有希望的市場。在英國，南洋各地又是連結本國與太平洋自治領地的鎖鏈，英國若一旦失其南洋的海權，那末由澳洲與新西蘭的孤立，英帝國便將陷於蹒跚不能活動之境。因此，英國竭盡手段以懷柔東印度諸島的所有人荷蘭。至在荷蘭，南洋雖是擁有巨大富源的地方，而自己却沒有加以開發的勇氣，只對可憐的土人肆其榨取，以此謀本國的繁榮。

更轉眼以觀西方，則有法國之印度支那，其地挾南海與英荷之殖民地相對峙，在南洋爭霸戰中也是一個角色。自菲律賓獨立以來，美國在南洋的爭霸舞台，雖告退出，但是卒因南洋地位的重要，現在是把向惟注意於菲島東方東太平洋的注意，從西方着眼於中太平洋一帶了。

在這三角的爭霸戰中，現在更參加了日本。這便是日本的南進論。日本不止要求在

南洋方面的通商貿易有公平的待遇，且根據國家生存權的發動，還需要原料品之公平分配與移民之許可。這種平和的發展，乃是正義的主張，苟有以世界和平爲念者，是應當對日本的主張加以傾聽的。

但是墨守着舊日的思想而擁有巨大富源的，對於『沒有的國家』是不肯有所給與的。這是今日『富有的國家』之惡習。於是結果，勢非至發生衝突不可。

三

上面講的是爲了獲得市場及原料並商業上的機會而從事於貿易道路的擴張之經濟競爭，在這競爭中，又爲了保護其市場，獨占或分得原料產地，並保衛其通商網，使其投資得以安全，於是有獲得政治上的勢力的必要。但是因爲對方的目的也是同樣，故在競爭國間，遂免不了政治上的糾紛與外交上的對立。而爲使此政治經濟的擴張得以成功，乃有軍備的必要，結果，更有在其地設立海軍根據地的必要。

例如英國、美國的傳統政策之一，便是在主要競爭場的附近，取得海軍根據地，俾爲外交後援的優勢的海軍力，具有堅固不拔的基礎。如當全歐的注意集中於西班牙之時，英國占領了直布羅陀。其次，當意大利問題爲全歐利害的中心時，英國取得了馬耳他。更於歐洲的利害問題集中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時，領有塞坡拉斯，這個傳統政策，直至今日，並未稍變。英國知世界大戰後之爭霸舞台將移於太平洋，故早在新加坡着手大海軍根據地的建設了。

新加坡與北方之香港、東方之澳洲海軍相呼應，不僅可以控制南洋，且可接近北方之中國市場而與以保衛。故若在新加坡能駐有優勢的艦隊，那末在南洋的爭霸戰上，無論何國都難以制勝。這是英國的強點。

但是使英國感到懊惱者，即歐洲方面的關係，不能在太平洋方面常駐有優勢的艦隊。說起來這也是英國的弱點。因此，澳洲感到憂懼，擁有南洋寶庫的荷蘭也戰戰兢兢，擔心得很。質言之，英國在南洋的把握，是並不鞏固確實的。

然則法國是如何呢？法國以印度支那之西貢爲根據，有輕巡洋艦一隻潛水艦二隻爲基幹的極劣勢的艦隊。以如此劣勢的艦隊與貧弱的根據地，法國在南洋爭霸戰上的角色，我們自然也可明白了。

惟在這裏，有值得注意者一事，即法屬印度支那與海南島的關係。在印度支那看來，海南島猶如外城，此島無論歸於敵人或友人，對於印度支那都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在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法國會要求中國滿清政府，訂立海南島不得讓與他國的協定。

由此協定，即法國事先訂好海南島之不割讓條約，以爲印度支那之屏蔽。（法國又於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與清政府訂立東京隣接諸省不割讓協定。）這個協定因爲只限於二國間，他國殊無受其拘束的必要。但因有協定在，海南島之割讓或軍事的使用，就難免發生問題了。

同時，海南島地當香港與新加坡的中間，在足以控制香港的位置，故若一旦海南島成爲他國的根據地，香港之軍事的價值，就要大減，而使英國感到非常的困難。所以若有

第三國而欲取得海南島或於其地作軍事的設備，那末一定要受英法兩國的反對，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次之，美國怎樣呢？自菲島獨立以來，美國在該島的海軍根據地，將是如何，頗成疑問。當今年八月初旬，菲島西南部的巴拉望島（Palawan）議會，建議於菲總統奎松氏，謂美國若能將現今的海陸軍根據地從菲島退出，極願以巴島之全部或一部永為美國領土，作美國海陸軍用地。因為美國國內尚無此種空氣，故這樣的決議當不能成立，但此決議必能獲得美政府的贊同，是可以確言的。

因為巴拉望島也在中國南海，遠遠地與西貢新加坡在對峙的地位，在南洋的爭霸戰中，是居着有利的位置。即美國若亦欲參加此爭霸戰，那末在南洋的這戰爭，其意義將更為重要了。

四

但是在這爭霸戰中，日本的角色是怎樣呢？南洋各島都是英、美、法、荷等之殖民地或保護地，日本在那裏，政治上並無什麼特權；同時，爲爭霸戰的後盾的海軍根據地，日本也毫無準備。日本比之其他海軍國，與南洋的爭霸場，誠是相距最近，就這點言，是居着極有利的地位，但是因爲沒有鄰近於爭霸場的根據地，究不免有種種的不便與不利。我們只須假定英國一旦集其巨大艦隊於新加坡，那時，英國以香港爲前進根據地，彼此互爲呼應，形勢實甚有利，足以防止日本勢力之侵入南洋。

又舉一例，日本海外貿易之五大幹線中，其三條都是經由中國南海的。(一)香港、印度支那、暹羅、海峽殖民地與印度方面之交通線，其全輸入額爲一一%，輸出額爲一八·九%。(二)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澳洲及新西蘭方面之交通線，居全輸入額之一三·四%，輸出額之二二·三%。(三)歐洲、非洲方面之交通線，占全輸入額之一七%，輸出額之一七·三%。

即日本海外貿易之半數以上是經由中國南海的，但是足以保障此貿易的安全的。

海軍根據地，在南洋方面，日本却一無所有。結果一旦發生戰爭，此三大幹線自不免大感威脅，日本的海外貿易將以此而大減退。日本之南進論者，果已知此等情況乎？這是我欲提出相問的。

於是在這裏，海南島便值得我們的注意了。現假定此島的榆林港若能成爲一大軍港，使日本得以自由使用，那末結果將是如何呢？因爲在短時期內，即可集中優勢的艦隊於榆林港，日本便可一舉而使香港的軍事價值失其効力，使西貢的法國艦隊潛伏而不敢出，在優勢的美國艦隊未曾到達之前，即已控制中國的南海於手中了。換言之，即南洋的海權將爲我有，日本是南洋的主人了。

——子真譯自世界知識十一月號

五 日本經濟漸入難境

Professor Paul Keller

日本的工業和國外貿易，近來頗有蒸蒸日上之勢，同時日本的農業，却與之相反，一天壞如一天。這二重的發展，正在毀壞日本國民經濟的平衡，正在製造一種經濟危機。此種危機早就清晰地反映到日本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在最近的將來，大概是要成爲日本最重大的問題的。

原來日本的經濟困難，到工業生產和出口貿易的領域內去找是找不着的，如能着眼於日本半數農民之現在的狀況和將來的命運，那一找就着了。日本農民之困苦顛連甚至陷於飢餓的狀況，固已惹起大衆的注意，救濟農村固已被視爲當前的重大問題，國

會所通過的復興農村及救濟被災農民之龐大預算，固已稍稍緩和了本問題的嚴重性，然而日本農民的困苦，却顯然未能根本解除。日本農民的困苦，原因太複雜了，而且受土地制度的影響太深了，所以單是表面而且淺薄的政策，實不足以言澈底的救濟。

日本需要一個廣大的土地改革。日本工業已受最新資本主義的洗禮，而農業則猶保持中古時代的方式，這種矛盾斷不容永遠存在，需要在一定期間內解決。農業制度的必需在一定期間內解決，當然要牽連政治經濟的發展亦在一定期間內走上決定的轉捩點。而因日本是那麼重要的國家，所以日本以外的世界，也不能不受日本國內的農業狀況的影響。

二

日本的土地，幾乎全數操在大地主手中。大地主靠收租過活，自己不種田。種田的是佃農。日本的田畝面積很小，五百五十萬的田畝中，只有二十萬田畝面積在三公頃以上。

佃農便是在這些小塊的土地上從事耕種。全部農民有百分之八十自己沒有田地，田地大部爲封建時代——卽一八六八年以前的時代——的貴族及寺院所繼續擁有，小部爲新興的金融階級所有。佃農必須以收穫的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七十繳納地租，那不到半數的收穫，纔是他一家衣食所賴，並且因爲必須以物品繳租之故，他毫無能力左右農產品的價格，也就毫無機會享受農產品漲價之利益。雖然佃農社會已有種種運動，甚且有過罷耕的舉動，可是他們的生活迄無絲毫改進。

調查農村的結果，表示不論佃農或所謂自耕農——卽租田之外同時還有一點己田之農民——經濟狀況都是入不敷出。佃農的生活自然更苦，田地的收穫不敷養活一家，必俟找到副業如築路、造林、手工業等，始可免於飢餓。

日本農業的不發達，除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及地租的高昂兩者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的土地，只用以培植一種農產。米可說是日本的唯一作物，雖然有許多土地同時還種着養蠶必需的桑樹。所以這樣單調化的原因，一由日本的田畝非常零碎，二由農

民狃於傳統的慣習，不願有所更改。直至最近，多半因為天主教徒的宣傳，北部日本產米區域的農民始知兼種蔬菜。馬鈴薯的栽培，現亦逐漸發達。在開拓最遲的北海道，農民並知象養牲畜。但日本農作的單調化自然不能就此革除了的。

農作單調化的傾向，起因於民食的單調化。日本人的食單上面，幾乎可說只有白飯一項，所以日本的田地，也幾乎完全種稻。這種辦法當然是很危險的，因為農民終歲勞苦的成功或失敗，完全繫於稻作收穫的豐歉，而稻作則照例不能年年豐收，三五年當中，總有一兩年是歉收。以此之故，日本的農民只好常常失敗，常常負債，到後來乃只好出賣他的女兒，以償虧負。據日本自己的統計，北部三大農業區域平均每年有二萬女子被貧苦的爺娘賣入娼門。

因為必須以物品繳租，而且繳得很多，致農產品漲價時也受不到好處，所以日本農民現錢非常缺乏，而現錢一缺，則只好借債購買昂貴的人造肥料，以補天然肥料的不足。此外，日本現下的賦稅制度，也是逼使農民負債的一個重要因素。原來日本政府向土地

課取的賦稅較之向財富的集中處即工商業所課取的賦稅要繁重得多。即在今日，日本國家財政大部分還是像從前樣靠課自農民的賦稅來維持。日本今日的工商業，本來是靠犧牲農民建築起來的。直到現在，農民還是負着支持工商業的任務。

農民所生產的貨品，價格不能不低，因為這樣，直接可使賺低廉工資的都市中工業人口維持其生活，間接就可使日本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中穩操勝算（因工資低廉，則生產成本亦低廉之故）。日本的經濟政策這樣是與別國完全不同：別國雖然重視工商業，但同時也知顧顧農業，日本則一味藉犧牲農業，剝削農民，來促進工業和國外貿易。這種重工輕農的政策，便破壞國民經濟的平衡，造成一種經濟危機。

所以在日本，澈底的農業改革是無可避免的。日本政府必須忍受一時的痛苦，採取若干重要政策，俾農民可以免除債務負擔，而且又有機會用自己的勞力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其實，需要救援的並不限於佃農。近幾年來，因為屢次歉收的結果，有許多小地主也債台高築。此外，資本短淺的農民銀行，爲了債務者無力償還借款，陷於周轉不靈，也必需

救濟。總之日本的經濟組織，業已變成內部已在腐爛的債務組織，非根本改造不可了。

改革日本農業的第一要事，是改革日本現下的土地法，因為，倘能辦到耕者有其田，並且能夠確立人與土地間的新關係，日本農村的種種悲慘情形，定可逐漸減少。至土地的重分配，必須辦到如下的兩點：（一）使農民有足以養活一家的土地，（二）使農民有機會革除單種一種作物的陋習。因了西方風俗的侵入，並且因為人口增加的壓迫，日本的飲食習慣，現已逐漸在改變，以前專吃飯的民族，現已漸知兼吃肉、蛋、牛乳、牛油、馬鈴薯、水菓等物。這種變動，對於日本的農民實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牠替農民開拓新的作物和新的市場。此外還有一件事情必須注意到，就是設立一種良好的農業信用制度，保證土地永遠掌在農民手裏，不會落到別人手裏。

日本國內有幾方面，其實早已明白現下的農業生產關係，決不能繼續維持。可是要求徹底改革土地制度的有力的農民運動，却至今還不曾有過。這大概是因為政府壓迫農民運動，一如其壓迫勞工運動，而上了年紀的農民，又覺得他們的生活係命中註定，非

可以人力強求改良；所以農民運動纔如此岑寂。不過青年人却極不滿於現狀，希望來一個徹底的改革，尤其是因為現今的日本工業，一因工業合理化和機械化的猛晉，二因近數月來國外貿易發展非常緩慢，已不復能像從前那樣大量吸收農村的青年男女，農村剩餘人口尋找出路愈感困難，於是年青人改革農村的希望也愈為熱切。

但事實是：現今的日本農民沒有組織，也沒有能力作政治活動。雖然有幾個農民組織，却都在政府支配之下，或由資本公司設立，並不能代表農民的意思。『危機一九三五』『危機一九三六』那些巧妙的政府宣傳，頗有能力把握日本農民的心靈，遏阻溫和的或猛烈的農民運動的萌芽。在國家遇到危難的時候，愛國的日本農民是誰也不肯起而要求澈底而且艱難的土地改革的。然而可憐的日本農民，却並不缺乏顯赫的朋友，——軍閥。這是因為日本的軍人，與日本的農民係同一族類。不但下級軍官，就是上級軍官，也很多農民出身。農民對於政黨及議會政治，已完全失掉信仰，但對軍閥的言行則頗表同情，因為軍閥是反議會政治的。可異的是：日本現雖受軍閥統治，而農業改革却還是阻力

重重，不易實現。但將來日本如果經過一次戰爭，那情形恐怕要兩樣了，捨身衛國的日本軍人，或將不願繼續維持現下的落伍的農業制度，於是日本的農民，或將如大戰後的東歐農民一樣，完成澈底的土地改革，使自己成爲獨立有產的農民了。

三

記起了奧本海馬在大戰後對我說過的一席話，那個反對德國大地主，同時又反對工資土地勞動者的國家經濟學者，相信易北河以東最苦的波蘭農民的收入，與德國一般勞動者的收入相等。過去十年中的國際經濟的發展，使有許多學者覺得他的對於國內工資水準和國際工資水準二者間的相互關係的意見，實在很有道理。譬如現今的日本，便是可以證明奧本海馬的意見的最好例子：日本的國內工資水準，已對世界經濟發生極大的影響了。

最苦的農民的收入可以決定一切工資，這事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均不若在日本之

甚。日本工業勞動者的工資之所以若是其低廉，你如果用日本缺乏盛大的勞工運動以及日本大工業力能支配政府那些事情去解釋，你的理由就嫌不充分，因為你已經忽略了一個比那些事情重要到萬萬倍的經濟要素。這個經濟要素是什麼呢？便是在人口迅速增加及土地貧瘠兩重夾攻下的農民的與日俱深的痛苦。

因為農民痛苦日深，情願廉價出賣他的勞力，於是日本的工業工資，乃低廉到幾乎使人不能置信。紡織業工人五分之四是女子，她們大都以三角至四角半的工資，作着十小時一天的勞動。其他的工業可以此類推。農村人口絡繹不絕地跑到都市，聽憑工廠主人以偏面的條件雇用。因此，農民的生計困難一層，一切工資勞動者——包括書記職員等——的報酬亦隨之降低一級。也因此，近來日本國外貿易雖然有鉅大進展，生活程度雖然較前為高，但工業工資却并不見增加，反而下降。

歐洲的報紙常常為日本的勞工鳴不平，說日本勞工賺着吃不飽的工資，並且被迫過着非人的生活，但從日本自己的情形——即日本其他階級的生活水準——判斷起

來，日本勞工的生活似乎尚不能算是『非人的』。我們須知日本的工業工資，已使有許多日本人的生活比資本主義未發達前優裕得多。牠雖然不能使日本的工業勞動者有着理想中的生活水準，但到底使他們的生活水準與農民和官吏的生活水準都保持着適當的比例。

他們的工資數目雖小，然其所包含的購買力却很鉅大，足可使他們滿足需要——唯這種需要天然不能與歐美勞動者的需要相提並論——若全個家庭統扯起來，還可以有一點小積蓄。所以，日本人如一竟保持他們的傳統生活方法，以白飯生魚為珍饈，以木頭與紙片造成的房子為安樂窩，以草席為沙發，以廉價的和服為盛裝，以木屐為革履，那麼，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日本的工業政策是包含不公平競爭的『社會傾銷』政策。還有，日本的一般生活狀況與瑞士那樣的國家完全不同，要比較也無從比較起的。

四

日本工業勞動者的低下的生活水準，對於其他工業國的物價和工資，是一種真正的威脅。假如日本勞動者的生活，從他們自己國內的標準說起來是『非人』的生活，那麼旁的國家還有理由希望他們起而要求增加工資，要求不遂，則掀起猛烈的勞工運動，甚或舉行罷工，以為要挾。但是，日本提高物價和工資，或發生猛烈的勞工運動，俾此後國際競爭可趨緩和那種希望，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恐終不免是一種空想。因為在現今的日本，從大學出身的所謂智識領袖及共產黨員，都已身陷繯絏，不然，也已填具悔過書，承認自己的思想是『危險的思想』。日本的工運是銷沉得幾乎沒有了。誠然，有許多工業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實在太苦，不能不予改進，甚至政界中亦有人提出此種要求，然而這只要稍微增加一點工資，便可解決的。加了以後，日本的工資和歐美各國的工資還是相距老遠，日本還是沒有失掉他的獨步世界市場的利器。

現在，日本雇主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在世界上為最低。因此，日本工業品的生產成本，在世界上也要算是最低。這就給與日本的出口貿易以必勝的左券。不管各種工業的股

息若何優厚，——去年日本紡織業股息一分八厘至二分，機器業股息派到三分至三分餘，——日本的出口商人依然抓得住國外的腰包不裕的顧客，尤其是在目前，日圓的價格跌去了三分之二，日貨因是愈有不脛而走之勢。現世界的工業國中，日本是唯一的以土地勞動者的身分作着工業勞動者的事情的國家，全世界的工業國俱不得不與日本這種手段作殊死戰了。

說起來還有可驚的事情在後頭。日本勞動者的工資，還不是世界上最低的工資。據說日本資本家現方在招收朝鮮人做工，因為朝鮮人生活比日本人更加簡單，工資可比日本人更加低廉。這麼一來，日本人便只有一件事情要擔心了，那就是中國的勞工將來也許會給他們以一個不可抵禦的反攻。因此日本人利用中國勞工之心甚為熱切，過去已在中國境內設立工廠，現在又極力表示與中國要好。倘若日本所希望的中日提攜實現，黃色人種的廉值勞工的聯合陣綫亦將隨之成立，白色人種將愈加沒有能力同日本競爭了。

然而，由於某幾種經濟要素的逐漸發生作用，日本的國內情形是未嘗不會起那麼的變化使現下的國際經濟鬥爭，漸漸地緩和下去。第一，日本的工資現在雖然一律低廉，但生產的進展，定將引導工資漸趨於高下不等，將熟練工人的工資，愈抬愈高。第二，農民的貧苦除出供給工業以廉值的勞工外，還有一種影響，即增加國家的負擔。國家債務的增加，最不利於貨幣價值的減低，日本一方面債務猛烈增加，而一方面却極力減低幣值，其經濟實已漸在發生動搖。總之，不管日本人自己若何樂觀，日本工業現今所享受的生產上利益終有一天要完全消滅，至少打一個很大的折扣。但不知歐洲各國，能否支持到那時耳？

六 日本國內的危機

Gunther Stein

日本有強大的軍備，但是在這強大的軍備後面，却隱藏着許多弱點。日本應付別國，口氣總是十分強硬，但是在這強硬的口氣後面，却隱藏着很多的恐懼。你若住在日本，像這一類的矛盾，每天可以看到許多。

日本最近數年來在外交、軍事、工業、技術諸方面，進展之速，誠足驚人，但爲了這種驚人的進展，日本所化費的精力是多少呢？我敢斷言是不可思議的大。日本野心的海陸軍激勵他們的國人愈加昂奮，我們便愈加可以看得明白：日本漫無止境的向外擴張，是怎樣地在消耗她的國內實力，怎樣地在促進她的國內危機。這種國內危機的發展，是和日

本孤立政策的成長，日本理想中最大敵人蘇聯在遠東實力的猛進，以及中國和歐美列強對日抵抗能力的激增，合着節奏的，即這三者進展一步，日本的國內危機也進展一步。日本現在是已經到了竭所有的能力去受嚴酷的試驗的時候了。

此種向外發展所引起的國內衰竭症，已經從日本國民的體力變化上面顯示出來。這是一樁與日本的海陸軍有生死關係的事情。

的確，現在的日本青年，比起三十年前的日本青年一般的說，身長已略有進步，男子長二英寸，女子長約一英寸餘。這誠然是一個非常的現象，是加速率的『種族進化』。日本民族有巨大進化效率的確證。然而不幸，日本青年身長雖然稍有進步，他們的體重可退化了，他們的胸部可縮小了，他們的牙齒，比以前的青年壞，他們的近視，比從前的青年利害，（日本青年近視的利害，爲世界第一。）你若在日本的街上或海邊閒遊，看到日本青年那種衰老的樣子，再想想日本國勢的強盛，定會茫然不解起來。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已較前進步；日本人的死亡率，雖然還不能像西洋之少，但正在

逐漸低落；日本人的生殖率，不管近來嬰兒死亡率年有增加，但還是上升不已。這些固然使日本的人口增加得異乎尋常的快，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實却表示日本人的一般的體力和健康，正日即於衰落。如不適合於軍役的人數的激增，便是日本人體格退化的一個徵象。據說，在過去十年當中，青年在體格檢驗之後被宣布為無服兵役之資格者，自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四十。有幾個大城市和農業區，曾經遭受重大的災荒，那里的青年就有一半人不適合於軍役。而青年母婦的健康，也較前大見遜色。對着這種現象，向來一味樂觀誇大的軍事當局，也不得不表示憂慮和不滿了。

更可憂慮的，是患肺結核症者的激增。據軍役體格檢驗的結果，現在的青年，患肺病者，十倍於本世紀初。因病不適於服軍役的青年，其中幾乎有五分之一是單爲了肺部有病。而入伍以後爲了健康不合格而解除軍役者，也大多數是因爲患肺病。

日本生活水準之較前略高，衛生事業之推廣，體育事業之普及，誠然使日本人的身材高了一些，壽命長了一些，人口的蕃殖率較在封建時代增加了一些。但是日本同時又

嚴厲地要求在政治上工業上均儕於強國之林。此種要求便使質的方面的發展不能與量的方面的發展相適應。生活水準是只能比前略高的。因為國民的收入，什九被國家拿去作對外發展之用了。一般人民的食品，向來以若干小碗的飯為限，如果有一碟鹹菜，一片鮮魚，已視同珍饈，其他如衣如住，亦莫不異常菲薄。這樣的生活水準，即稍稍提高，亦何補於身體？然而國家對人民的要求，無論在體力上或在智力上，都急激增加，又何怪日本人民幾乎個個患消渴症？此外，日本當局對於合理的生育限制的思想，採取絕對排斥的態度，這也是日本人生活改良上的一個死症。

日本國家對人民的非常要求，開始於學校時代，（有許多兒童就業較早，則就業時代亦作學校時代看待。）日本固然可以驕傲地誇耀她是唯一的已經沒有文盲的亞洲國家，但是她的青年的健康，却已經做了這種光榮的犧牲品。原來日本當局對於文字教育，堅守成法，不願改良，而日本文字當中，包括好幾個漢字，這些漢字都非常難學，因此青年的頭腦，遂大受折磨。日本當局不願改良文字，顯欲藉以抵制外國人使其無從明瞭

日本的思想，並且藉以愚弄羣衆，使其無緣深造，因為在舊法的文字教育下，大部分羣衆辦到能讀能寫的地步，已經不易，更無多餘的腦力來想旁的事情了，至於一部分聰明靈秀的人士，因受艱深文字的羈束，也難以與文藝作品及所謂「危險」讀物相接觸，這都是於當局有好處的。因為要省錢，日本的文字係印在一種很簡樸的書本上，當局就強迫學生拚着性命去讀那種書本，一個初小的學生，必須學會二千個複雜的字體，試思這是一樁怎樣艱重的工作！不獨文字教育如此，即其他課目的教育以及軍事教育，也是異常吃緊，因為日本學校中各項課目，都注重死記，軍事訓練則從兒童跨進校門的時候起就開始實行了。

二

建築在長時間工作和低廉工資上的新興工業，把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青年男女吸收了去，這就使青年男女有了更艱重的工作。那些工業，大都保留着非常不合衛生的

工作狀態，牠們不但侵剝都市人口的身體，如日本海陸軍部最近所公佈，並且又侵剝鄉村人口的身體，使鄉村中的無辜農民，爲日本向外發展政策作更進一層的犧牲。工廠吸收鄉間青年男女，叫他們作了幾年苦工，然後將其送回鄉間，另招新工，那些被遣回的，當然不是先前的健康狀態，而是殘廢衰老的人了。這樣，日本的工業，無異在蹂躪日本的農業，牠不但促進農業收入的減少，同時又摧殘農民的健康，因爲農民在田間翻泥塊十年所耗損的體力，還不及在工廠裏管機器一年來得利害啊。

現在，有一個現象較前更爲顯然可觀，就是日本的一般的經濟力量，已經消耗得所餘無幾了。因了軍備的擴張，國家的債台一年年的增高，通貨膨脹的威脅一天天的加重，作爲戰事用之經濟準備，現在已經移用一空。就是出口貿易額的飛躍，所謂日本向外發展的重要徵象者，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也不在表示日本國力的增加，却是在表示日本國力的削減了。

我們倘能先把國外貿易總值的紛亂的數字忘了，然後去研究日本與他國互相交

換的商品，就可以顯明地看出日本國家實在損失之大。和一九三一年相較，日本在一九三五年只多進了百分之十四強的外貨（大部分是日本國所不產的原料品），但是爲了要償付這點多進的外貨，日本竟須較一九三一年多輸出百分之七十五的貨品（大部分是工業品）。

現在再舉幾個更加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種重大的變化。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日本只輸出三百零八碼半棉布，就換進一百公斤（二百二十磅半）棉花。但是一九三六年初期，她竟不得不輸出五百十六碼棉布，以換取與一九三一年同質同量的棉花。同樣，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日本只須輸出一磅又三分之一的人造絲，就換進百公斤做人造絲用的纖維原料。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她竟不用兩磅又百分之八七的人造絲去換取百公斤的纖維原料了。又如，在一九三一年，百公斤的生橡皮只消用七打橡皮鞋去換取，及至一九三六年，七打的數目變成十六打了。總說一句，日本要增加她的國外貿易額，就非咬着牙齒，忍受實在的損失，以價值較大的國產品去換取價值較少的外國貨不

可。這本來是可省的事，但是日本的增加國外貿易額，目的全在擴張軍備和應付非常時，那麼，除出那種行爲，還有什麼路呢？

最近數月來，日本的海陸軍部更加看清楚日本的國內情形和她的國際地位之不能相應，實是日本的一個致命的危機，他們於是喊出了要求改革的呼聲，所謂行政機構的革新問題，一時成爲日本政治的重心。但同時此類改革前途難關之多，却也跟着改革呼聲的響亮而明顯起來。因了預算已達最高限度，不堪再增，於是軍部所要求設立的衛生部，只有在裁減軍費的條件下始有成立可能。且人民的食品苟無實在的改進，則衛生部即使能夠成立，也休望有巨大的成就。至於工廠工作狀況的改良，現在雖由陸軍當局在計劃討論之中，但工廠工作狀況改進之後，日本工業品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豈不是要大大的減退？影響所至，日本豈不是要弄得沒有力量購買與軍事有重大關係的原料？又如農業改革的呼聲，近來也喊得震天價響，尤以軍部中的急進分子主張最力，但是農業改革，談何容易？牠需要巨額的公款，而日本沒有這種公款，牠至少要增加都市工

人的工資，及抬高米價，而都市工人的工資一增加，米價一抬高，就有引起通貨膨脹和損害出口貿易的危險。

總之在現今的日本，一般人都承認大規模的實際改革，已刻不容緩，然而環境却不容許他們作這樣的改革。日本這樣，乃不得不作困獸之鬪。她是已經樣決定着：決定繼續擴張軍備，決定靠這種武力拚命向外發展，企圖從她國境以外，攫得了她理想中的富源，來補救她國內日深一日的消耗。

——譯自 *The Living Age* 十月號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日本壯丁體格檢定表

	人 數	千 分 比
甲 種	一八八、四七〇	二九七
第一乙種	七二、八三三	一一五
第二乙種	一三〇、〇四一	二〇五
丙 種	二〇一、七一六	三一八
丁 種	四〇、一〇八	六三
戊 種	七一八	一

『註』甲種係適於現役者，乙種可充後備兵，丙種以下爲不適於兵役者。據軍部警告，自大正元年以至昭和元年，體格衰弱之丙丁種壯丁，不過千分之二·五，自昭和二年至七年之平均數，增加至千分之三·六，去年十年度，復增至千分之四·〇；而甲種入營之兵士，中途以結核性疾病退伍者，當日俄戰時，不過千分之二，現則一年之中，竟達三千名之多云。

中
日
本
的
國
際
關
係

一 論英美俄與日本的對立關係

大山卯次郎

日本在遠東的國際情勢是極爲險惡，不消說，我們對之應加慎重的注意，但在這裏，我們所最當注意者，是否如有些人的所想像，日本是在英美協調或英美俄妥協的包圍中。

先就英美言：因此兩國，如言語、人種、宗教、傳說等頗多相同，於是或以爲在政治上也容易妥協，但此雖爲感情上使兩國易於接近的有力因素，講到兩國的結合，到底要看自己重大的利害關係，而決非感情問題。英美兩國只在遠東政策上，都以日本爲其障害者，具有同一的利害關係。故在英美的政治家中，頗有主張英美合作的必要者。例如斯末資將軍、羅息安爵士、斯底特氏等，便是其最爲顯著的。但其所言頗爲單純，且不切實際。這裏我們應當仔細加以考較者，英美兩國雙方重要的利害果是一致否乎？且爲了擁護此利

益，果值得與日本訴諸戰爭否乎？而為擁護此利益，竟是除合作與戰爭以外無他道乎？縱假定如此，試問兩方都有負擔此危險的實力乎？否則，就難獲得適當的答案。

就英美日三國在華的利益來加考察，則最重要的是貿易與投資。但在貿易上，美國對日居極安全的地位，反之，日本及美國的對英關係，則甚不安定。即美國的對華輸出，以棉花及煤油為主，其他則有煙葉、汽車、鋼鐵及機器等。英國的輸出以棉紗、棉布為主，此外有鋼鐵、機器等。日本的輸出以棉紗、棉布為主，以外則有食料品雜貨等。美國根本沒有受到日本競爭的危險，惟英美及英日間則有尖銳的對立。最近英日兩國的對立，則由華北走私問題而表現出來。

再就三國對華北的投資言：其大部分都集中於上海，次之是長江流域及天津北平一帶，但言其金額，則英居第一，日本次之，美國約一億三千萬金元，遠在英日之下。最近英美兩國雖俱對華開始積極的活動，但彼此之間，競爭亦甚激烈。舉其顯例，有如最近由幣制改革及白銀國有問題所引起的兩國的鬥爭的活動。

由此情勢，比與日本更彼此立於競爭者地位的英美，對於日本，到底能否彼此合作以事戰爭，實爲一大疑問。誠然，就英國言，日本是一勁敵。英國雖或不致訴諸武力，但在經濟上發動其遍世界的領土，並其勢力範圍內之諸國，採取打倒日本的政策，而暗中與美國相結以制止日本的活躍，這却是可能的事。且由最近裁軍會議中英美兩國一致反對日本海軍力均等的主張來看，英美之間，以遠東問題爲中心，殊有提攜的可能。但是以前歐洲形勢的險惡，英國恐無此餘裕罷。至於說戰爭之事，全部由美國擔任，那是美國決不會答應的。因爲如上所述，美國的在華利益，並不巨大，至少比之英國是小得很。以利益這樣微小的美國，爲了保護英國的巨大的利益，而與日本那樣的強敵，擔任作戰，這不是爲英國作了腳爪而拾粟於火中嗎？因此之故，在美國有識之士，亦覺英美結合，難以成立。至於英國，誠爲世界的大海軍國，若以全力而臨遠東，勢將不可侮，但因歐洲近狀的不安，英國到底沒有這樣的自由，誠然，英國最近除擴大新加坡的防備外，更在東方領地謀軍備的擴充，這是英國謀在東方強化其地位，在日本看來，自是甚大的威脅。

由上所述，可知英國與其敵視日本，甯與日本妥協，以保東方之無事。在輕形式而重實利的英國政治家，這是妥當的辦法。不過日本若威脅到英國的重大利益，作出使之不能默視的暴行，那末英國是也不能干休的。可是日本既不如此，則如今日的英國既自顧不遑，由常識的來看，當不致在東方作賭其運命的大行動的。

然則美國是怎樣呢？美國於海軍力主張對日比率應為五比三，藉以確保其在東方的優越地位。日本對之，表示斷然的反對。於是美國為使其實力達到五比三的比率，現正以文生氏計劃，謀巨大艦隊的建設。這是大家都知的事。

美國這種態度，在日本國防上，當然不能輕易看過，所以日本目前也以國防安全為目標，銳意謀對抗之策。但美國要想對日本獲得武力的優越地位，不僅在論理上斷難承認，即在實際上，要想實現，也不可能。這便是美國主張英美合作的由來。

因為以美國單獨之力，既不能以抗日本，那就惟有與英國提攜的一道了。但是由前所述，英國因為沒有負擔這種義務的實力，所以結果勢非由美國獨力擔承不可。而美國

之力，不僅不夠，即其充分，美國之在遠東，也沒有應訴諸戰爭以謀保護的巨大利益。因此之故，英美合作要想實現是很爲困難的。

要之，英美兩國都不喜日本勢力的膨脹，因此，兩國之間，氣脈相通，對於日本似可一致。但因其間的利害衝突實甚巨大，所以英美兩國能否成立親密的提攜，大是疑問。況在美國，與外國聯合以事戰爭那樣的協約，憲法上非有議會的同意不可，屬於總統權力之外。而議會在原則上，對於這種協約是不能同意的。

又如講到俄國，在遠東方面，大擴軍備，這於日本，自是極大的威脅。因之，給反日派的人視爲儼然的領袖。就美國來說，爲了排除日本的勢力，俄國的存在，實相當重要。所以美國爲了牽制日本，常以爲有維持俄國在遠東的勢力的必要。關於這事，歐仁揚的強大的美國 (Eugene Young: Powerful America) 其第六章中有云：

『對於東部西伯利亞，美國以利害所關，放於世界戰後，不啻是當地俄國利益的準保護者。美國當參加聯軍出兵西伯利亞之時，英法兩國雖顯然一任日本佔領赤塔以東，進兵西伯利亞，而美國則仍留其軍隊於該地，

要求日本的退兵，最後，卒使日本不得不如其所要求。蓋由美國之意，爲維持遠東勢力的均衡，抑制日本勢力的膨脹，實有留置俄國勢力於西伯利亞的必要也。」

由此可知美國的對日政策，俄國的勢力是如何的重要了。但是若說美國在遠東有以俄國代日本之意，那可又不然。美國固不喜日本的膨脹，但是同時，也不喜俄國的膨脹。因此，美國爲了抑制日本的膨脹，覺得俄國的重要，而爲了抑制俄國的膨脹，也一定覺得日本的重要。這是美國外交的彈性所在，若只從排日來說，那是未免太簡便了。這裏我以爲最當注意的是，美俄兩國是否真有戰意，且兩國之間，是否真能彼此信任。第一問題，茲暫不論，至第二問題，則在美國方面，能否信任，似屬疑問。

又如英國，向雖極反對俄國，但在最近，頻對俄示好，曾以物資借款四千萬鎊，充俄國擴張軍備之用。言其主要目的，蓋在牽制德國，與俄之遠東軍備，據說無直接關係。總之，如英如俄，都是外交界的老手，且善於作利害的打算，到底非簡單的批評所能許可。例如英國的不願俄國勢力過強，但如歐洲方面用以牽制德國樣，在遠東方面也希望俄能牽制，

日本又在中國方面俄雖不願中英太過接近，致中國勢力趨於強化，但是以此却可用以牽制日本，俄國至少不是反對的事。反之，英國雖不願中俄兩國的接近，但却與俄國同樣，希望能夠以之牽制日本。不過英俄兩國是否欲在遠東方面彼此攜手，成立相互援助的協定，則大是問題。至於應着時勢的變化，作種種的小刀細工，那是定會有的。不過像足以使俄國代日本在遠東的地位那樣危險的事，英國老練的政治家是決不會有的。

至於日本，對於俄國今日的大事軍備，欲以武力稱雄東亞，當然不能輕易看過。惟就遠東的俄國言，大勢所至，必要求對外發展，於是結果，將轉其銳鋒至抵抗力比較薄弱之處。這是日本的軍部當局與外交當局，都應加以注意的。

二 英日對華政策的衝突

尾崎秀實

世界大戰以前，各國以中國爲中心，很有激烈的競戰，在這角逐舞台上，英、美、日、法、德、俄六個國家爲主要演員，尤其是英國，因爲他有『世界帝國』的優越地位與在華之歷史地盤，所以他又是這六個主要演員中的最主要者。但在歐洲大戰以後，形勢爲之一變，德俄兩國不能不由這政治舞台退却，法國也有失去昔日的氣勢之概，只有日美兩國立於戰禍之外，得到滿意的發展，而將其勢力，加重在中國身上。於是就成了英、美、日三國的鼎立狀態。但是近年來英國漸次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常常落在日美兩國之後，卽就貿易看來，從前久居第一位，其貿易額，幾及各國對華貿易半數以上，故英國在任命海關總稅

務司的時候，主張英國在貿易上佔首位，應以英人充任。恐怕在當時，英國自信她在中國大陸上所佔的優越地位，是會永遠不變的。不料在大戰後，她那優越的地位，被美國奪取了，最近又讓日本追上了。就是她處於獨占地位的航業，最近也受日本大阪商船、日清汽船、大連汽船等活動的影響，漸感不安。在鑛業方面，她那獨占中國市場的煤炭，近亦因日本炭與滿洲炭之進出，漸漸失去了銷路。最近華北的政治情形，對於英國煤業基礎的開灤炭坑的運命，亦發生暗淡的影響，現已常有讓賣的謠傳。在紡織事業方面，唯一英國資本的怡和紡織，現亦實行高度的緊縮政策，暫時苟延殘喘。至於英國在政治上的勢力，戰後曾有一時期，與美國結合，以抑制日本。然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急遽增加的美國勢力的前面，漸受壓迫。及至九一八事變以後，急激增加的日本勢力，能與中國政局以決定的影響，故英國勢力，更不得不後退了。

現在正是英國對華政策作一大轉機的時候，這個問題對於英國，不特僅是關係在華投資二萬萬金鎊的運命，如在華競爭萬一失敗，恐怕將成爲她那『世界帝國』內部

崩潰的原因，亦未可知。現在橫在英國傳統對華政策前面的一個難關，是她這政策對象的中國情形，時時刻刻有極迅速的變動。這種地方，是與英國立在先頭，開放中國門戶，而到最近這幾十年中的事情，完全不同的。

第一是日本急激果敢的大陸政策之遂行，第二是中國本身，在這未曾有的恐慌中，正迅速的走入解體的道路。上述這種形勢是不容許英國安閒的。自然英國的目的，恐怕不僅是想將在華資本另行編製，或由中國市場獲得最有利的代價而退却的那種消極企圖，而是在想轉變方向與重新組織進路。

二

現在因為日本勢力對於中國大陸的壓力增加了，所以各國之對華政策同時即是對日政策，這已成爲儼然的事實。在滿洲事件勃發以前，英國在華的對日政策，第一是在想結合各國，尤其是結合美國以抑制日本。如像以華盛頓會議爲中心而表現之對日牽

制政策，這是最明確而又有效果的例子。又如對華借款團，對華共同作財政上援助，或共同管理中國等提案，雖非純以日本為對象，但其主要目的是在以日本為對象的。第二方法，是在想強化中國政府之政權，或進而與之結合，以牽制日本。迨乎九一八事件以後，英國知道用這兩種手段，都是沒有效果的了。第一種方法之失敗，是因為日本勢力之飛躍的增大及各國協調之困難，尤其是英美間有根本上的對立關係，兩國萬難提攜的，於是在對華政策上，就成了英國孤立政策的形式。而第二種方法之失敗，也是因為日本勢力之急激的增加，對於中國政府壓力的增強，又加以中國政府本身無力。於是乃有第三方法，即直接與日本結合。日英結合，曾經以日英同盟的形式發揮過機能，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一點也因為日本有果敢的大陸政策之遂行，在根本上利害關係相反的兩國中間，頗不容易實現。所以最後的結論，英日兩國的對華政策，在根本上是不能協調的。關於這一點，有再進一步加以檢討的必要。

英美援助強化中國政府，以防止日本勢力侵入大陸的企圖，因為中國政府對其內部之政治的經濟的各種矛盾之綜錯與加重，暴露了沒有解決能力，於是對於這種企圖的效果，就發生了疑問。尤其是在滿洲事變以來，列強對於遂行這種政策，似已斷念了。列國共同對日或共同牽制日本的方法，是滿洲事變以來各國嚴密考慮的事。這有兩種方法，第一是直接以日本為敵，而連絡各國以當之，例如用國聯的名義援助中國。第二是將日本拉入共通利害關係之中，以牽制日本，如將中國作為國際共同管理的方案，即是這種表現。美國傳統對華政策的標語，什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都是表現此種意思的。今年春英國向日、美、法提議共同對華作經濟的援助，也是這種意思。自然這兩種方法，不一定各為表現，在外表上不少同時表現的時候，且各國共同援助的結果，在表面上也可以成爲強化中國政權的。

在上述的各種場合，都是以經濟問題爲基調，這是近年的特徵。中國在經濟上已經破產，中國政府最切實的要求，是財政援助。對於中國政府除經濟援助之外，完全是無意義的。

在華外交局面之展開，也是以英國對華政策爲機軸。所以上述在華各國之對日政策，是以英國爲原動力，這是不待贅述的。但是近來這種戰線，忽然有了變動，因爲世界經濟恐慌的結果，各國皆遭遇困難問題，不能積極參加對華政策，試觀美國近年來對華政策之消極的態度，即可以知之。另一方面，又有日本之活潑而果敢的大陸政策的遂行。滿洲事變以後，英國仍然以爲可以維持其對華政策之傳統的指導權而抑制日本。以國聯爲中心的各種活動，即其一端。但日本則以『退出國聯』、『對滿政策之果敢的實行』、『與中國政府作單獨直接強硬的交涉』、『向華北進出』、『作爲具體的答覆。去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即表示此種態度的一般原則。其要領，第一日本與各國對於東亞的立場、主張及態度，當然不同，日本在東亞有特殊地位，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的

責任。第二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中國亦應負責，中國之以夷制夷政策，日本當然非加以排斥不可。第三中國應該保全，但應由中國本身努力，各國對華採取共同動作，爲瓜分共管及設定勢力範圍之先聲，故日本反對。這是明確率直的說明日本大陸政策，當時使各國大爲狼狽，鬧動了全世界，尤以英國最爲痛憤，自不待言。但是日本排除各方的非難，而以『華北的行動』及『與中國政府直接交涉』作爲具體的答覆。日本的立場，即在現在，亦未變更天羽聲明所表現的主張，英國想已充分的明瞭了。

四

英國在華的經濟地盤已發生動搖，在上面曾略言及。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的農業經濟陷於破產狀態，而在農業恐慌深刻化之同時，又有旱害水災相繼而起。一九三一年夏，以長江一帶爲中心的大水災，給與中國以難於恢復的大打擊（受災地方十六省，災民八千萬）。去年受旱災的有十一省三百六十九縣，受水災的有十四省二百八十三縣。而

今年揚子江與黃河一帶，又受廣汎的災害。這種災害的本身，決不僅是一種天災，實能破壞中國的社會經濟。我們看中國歷代的政府，對於治水上面，幾乎傾注當時的社會全力，現在的中國政府，不能不說是放棄與自然相抗爭了。這種廣汎的農村破壞，完全奪去了農民的購買力，這是對於以長江一帶為有力地盤的英國，影響很大的。去年美國的白銀政策，使中國各大都會，發生金融恐慌，這也使以匯豐銀行為中心而築成的英國在華金融資本的殖民地利潤的根據地，發生動搖。匯豐銀行在上期的決算，發表了紅息減少。在這失去滿洲市場，在華北亦不得不退却的時候，英國實在是達到重大的危機。還有不可忽視的，就是中國政府之財政窮境。內債政策，已完全不可行了，累積的內債，已超過十萬元。今春國民政府所實行的銀行統制政策，也是以目前的財政問題為目的。今春以來，公債的發行額，已達三萬五六千萬元。所以中國極力求英國之經濟援助。去年末，中國曾向英提議借款二千萬鎊，惹起世界騷然的問題，後因日本強硬反對，以致中止。

總之中國這種情形，可以說是對於英國金融資本在華稱霸，供給了一種機會。即如

在三月，沙遜爵士提倡的『上海金鎊案』，由匯豐銀行援助中央銀行，以救濟中國金融危機的方法，都可以由英國欲在華經濟稱霸加以觀察的。本年正月，中國政府鐵路顧問哈門德少將，曾視察中國內地如四川貴州雲南各省，後又到華北，其目的聞在建設四川鐵道，即成都重慶間之成渝線，重慶漢口間之川漢線，成都宜賓間之成宜線。總之，英國欲以華南為地盤，以投資於鐵道礦山為中心，而進於新活動，這是可以充分窺察得出的。

五

在這種時候，英國政府最高經濟顧問李滋羅斯之赴華，以該氏過去的赫赫經歷觀之，實在值得充分注意。某外人批評該氏此次之行爲『在近十年來到華之人物中，以該氏所負使命最為重大。』以一種觀察來說，這並不是過大的評價。將來英國對華經濟活動的方向，將根據該氏的報告，在某種程度，必有所決定的。但最值得吾人注意而又有興趣的事實，是在他赴華的途中，曾訪問日本，與日本政府當局作充分的懇商。他與日本外交

財政當局商談的內容，雖不明瞭，但是他在想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真意，以作為決定英國對華政策，尤其是以決定其經濟活動的根本方案，這是決不會錯的。但是如謂李滋羅斯抱有一種具體方案，或關於對華政策，將提議一種共同動作，恐怕未必。其真意似完全在偵察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與日本大陸政策遂行的界限，英國此後的對華政策之遂行，終非與此點相關聯而實行不可。不管英國願意與否，這是一種事實。八月十七日倫敦經濟雜誌，曾有一種論評，標題為「李滋羅斯的使命」，其中有下述一節云：「英國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現已出發赴華研究中國財政狀態，英國政府將候該顧問之報告到後，即將與在華有利害關係的各國政府，尤其是日美政府，協議其調查事項。他的使命除此而外，別無理由。李滋羅斯為很有經驗的專家，英國在華較其他各國有更大的經濟財政的利害關係。中國政府曾向英國政府表示歡迎羅斯。但在此種情形中，有一個異常的要因，即一九三一年秋以來，日本對華遂行的外交政策，在中國東北四省被強力的佔領之後，現在這地方，雖不合法，但在事實上，已由日本代替了「滿洲國」。此外日本尚有更

進一步的野心，即去年在東京由「外務省代理人」非正式表明的將中國全土作為「日本門羅主義」的領域。其內容謂日本對於中國有特殊之立場，他們不管是單獨的或利用國聯，如不先與日本相商，而與中國作救濟其經濟財政的直接交涉，日本有視此為非友誼的行爲的權利，且將如是視之。東京代言人的聲明，似爲一種「試探」。故李滋羅斯的使命，也可以解作一種「試探」，即在試探對於依照國際間的既定法則與中國直接自由交涉的世界各國權利，看那一國出來真正挑戰。李滋羅斯爲知道日本對於中國財政情形的見解起見，將往訪東京。但是這種過路的訪問，並不是去向日本請求認可證。日本政府否認日本新聞所造的謠言，說是李滋羅斯之訪日，是討議英日通商競爭與軍縮問題的英日會談，這是正當的。」

據這種論調，英國決不與日本協調，英國在華有最大經濟利害關係，決不許日本容喙，這是正面向日挑戰的態度。

六

再就在華英日兩國的經濟利害關係的對立，略加觀察。這種利害關係的對立，與其說是表示發見此後兩國調和點的可能性，無寧說在表示兩國終不能調和。

金融。英國在華之金融活動中心，爲上面屢所引證的匯豐銀行，此外尚有三銀行二投資的機關。從來匯豐銀行本有操縱中國金融界的實力，自一九二九年關稅的收支歸入中央銀行的手中以後，即失去昔日的勢力。並常受日本系銀行尤其是正金銀行與三井銀行的活動的壓迫。日本各銀行，在地域上面，能集中其活動力，如以上上海爲中心的有正金、三井、華北有朝鮮銀行，華南有台灣銀行，這都是一種強處。英國其他銀行爲麥加利、有利、大英。至投資機關則有上海地產公司、安利洋行、中英公司、福公司（北京銀公司）、中華鐵路公司等。

現在英日折衝的地域爲華北，其次爲華中。上述英國的機關，在北平天津亦有支店。

中英公司對於北寧路、津浦路、浦信路亦有投資。福公司則專以華北爲活動中心，對於道清鐵路、焦作炭礦也有投資。華北如爲日本勢力範圍，不知英國將以何種形式而退却，自然決不至別無代價，全不抵抗而退却的。

航業。十九世紀下半期以至二十世紀初頭，完全在英德獨占支配之下，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爲其代表，皆以上海爲中心，而雄飛於中國全國之沿岸航路。及至日清、日俄戰後，漸受日本之壓迫。

因。礦業。華北有開灤炭坑、焦作炭坑等重要礦區，實爲華北英日兩國關係複雜化之要

紡織。在歐戰前英國在華紡織工場，本有五所，現在只有怡和、三工場了。與日本在華之四十一工場比較，實不成問題。且英國系之紡織業很不振。

其次再列舉英日兩國之事業投資與政府借款數目以供參考（根據李馬教授調查，一九三〇年，單位百萬美金）

	事業投資	各國全數之百分比	政府借款	全借款之百分比
英國	九六三·四	三八·〇	二二五·八	三一·八
日本	九一二·八	三六·〇	二二四·一	三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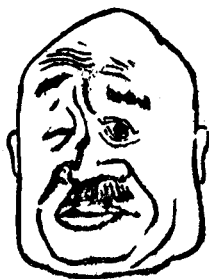
近來兩國在貿易上商業上之競爭關係，在前面已略有述及，茲僅舉兩國在華貿易對全輸入之比率於下：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日本	二一·一六	一四·五六	九·九九	一二·二一
英國	八·二九	一一·二〇	一一·三二	一一·〇〇

中國現在正逢一大轉機。這是無論由處於解體危機的中國本身的情形看來，或由強力遂行其大陸政策的日本動向看來，或由迫於改造其華南華中的政治經濟各種關係的英國立場看來，都可以觀察得出的。依上所述，我相信大家可以明瞭英日關係不容易發見調和點。如要勉強尋找英日兩國之調和點，則只有擴大範圍至於世界或第三國。



日本前陸相寺內壽一大將



日本現陸相杉山元大將

例如與蘇俄締邦及與美國的關係，或可求到暫時的調和點。著者對於在華舞台上英日矛盾，特別加以強調，恐不會錯誤吧！

三 論日俄關係與中國目前的危機

樊仲雲

一 大陸政策的正面敵

日本是一個東亞海上的島國，像歐洲的英國一樣，但與英國不同者，英國的全力集中於海，而日本的目標則在大陸政策的實行。雖然日本也有所謂海洋政策，但為第二義的，其最終目標，還在保障日本稱霸東亞的勢力，而謀大陸政策的實現。

日本之必須以大陸政策為其國是，有許多原因：（一）是因為日本之躍登國際舞台，在十九世紀末葉，為時已嫌不及，南方海上的島嶼早給歐洲各國分有了；日本過去雖曾有過倭寇橫行海上的歷史，但要與歐洲列強決勝負，究為事非易，故甯以大陸的發展為得計。（二）是因朝鮮之於日本，只隔一海峽，頗為便近，易於進攻，當時中國勢正積弱，有

機可乘。(三)朝鮮若爲另一強國所有，則在日本殊無異一柄正對心頭的利劍，危險萬狀，而當時的俄國，在取得沿海省後，頗有進窺朝鮮的企圖，遂使日本覺得奪取朝鮮實爲其國運存亡之所關。(四)爲了要保有朝鮮，於是我國東北成了日本的生命線，而自僞滿建國，日本的生命線現在是移到我華北來了。日本的生命線是移動的，其意義則等於向大陸的繼續發展。(五)日本是個島國，不僅就商品市場言，資源產地言，且爲解決人口問題，只有廣漠的東亞大陸，是其資本帝國主義唯一的出路。

日本爲了要奪取大陸以事發展，於是我國遂成了他大陸政策實行上的第一個障礙，結果因爲奪取朝鮮，有對我國的甲午戰爭。而爲併吞朝鮮，並奪取南滿，藉作保障，於是俄國成了他的第二個障礙，致有光緒三十年的日俄戰爭。然而日本的野心，可不能以此而止，徒以阻於英美列強「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國際協調主義，不能得到發展的機會，無可如何。大戰發生，對德作戰，他取得了山東的利權，而在此時，列強既無暇東顧，於是他更乘機對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滿以爲這是實現大陸政策的最好機會，然而大戰

既停，華會繼開，國際協調主張又復抬頭，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卒受到了列強勢力的阻礙。其後，田中一再出兵濟南，思欲打破國際的協調，而卒無如之何。可是機會到底來了。世界經濟恐慌，既使英美列強無暇東顧，亦使日本感到非求出路於大陸，無以轉換國內革命的心理。這便是九一八事變的由來。

所以在日本看來，目前大陸政策的實行，最大的障礙是以英美爲首的利益均沾主義。爲了打破這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張，於是日本不惜以焦土外交，反對李頓調查報告，甚至退出國聯，並且更進一步，取消華會海軍協定，退出倫敦海會。日本這樣爲了大陸政策的實行，與英美立於對抗的地位。而以此故，對於英美，在日本是利其分而不利其合。因爲英美的聯合，若一旦成功，那末華府會議的往事，就免不了又要複演了。

但是，如英如美都不是亞洲國家，若欲干涉日本的大陸發展，則除非訴諸武力，而今日的日本，似已非會議外交之力所能阻止；且若發動戰爭，則因日本之力，集中於東亞一隅，英美遠渡重洋而來，亦難操勝算。故在此時，如英如美，都整軍經武，取的一種監視的備

戰態度，甚至倘有可能，反不惜與日修好妥協。而在日本，則一方面設法阻止英美的聯合，講求分別妥協之法，他方面竭力擴張軍力，以爲將來戰爭的準備。

不過俄國却與英美不同，他雖是一個歐洲國家，同時也是一個亞洲國家，且是一個大陸國家。因爲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俄國不僅像英美樣受到利益的損害，且還直接感受到日本武力的威脅。自東省事變以來，俄國雖對日處處讓步，表示和平，然實以全力增兵設防，藉備萬一。故於日本，今日的蘇聯不僅在建國的主義上不能兩立，且在大陸政策的實行上尤爲重大阻礙，非加以排除不可，否則，僞滿勢力究難鞏固。而像海上方面之對英美樣，在大陸上，日本所認爲可懼的，是中俄的聯合。故其對華外交，「共同防共」竟爲廣田三原則之一。

質言之，日本爲了大陸政策的完成，而以我國爲對象，以蘇俄爲其當面的敵人，是有自己的一套理由的。

二 過去的日俄關係

當甲午戰後，日本大陸政策開始實現之時，俄國就是他當面的敵人。因為當時的俄國，不僅干涉日本交還遼東，而且接着以中俄密約的訂立（一八九六年）着着向滿洲發展，既強租旅大，且有窺伺朝鮮之勢。俄國之所以能夠橫行無忌，當然是因為有法國的同盟與德國的默許；於是英國因為形勢的孤立，遂不惜屈尊以與後起的日本同盟抗俄。這也正是日本的願望。此時，以拳亂的爆發，俄國頗欲乘機蠶食中國領土，因之，日本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實行門戶開放，這與美國的意思正合，故於日俄的對立，美國的同情無疑是在日本方面。這是以我國為中心的日俄關係的第一期。

但自日俄一戰而形勢大變，由樸資茅斯和約兩國平分滿洲。戰前，日本為了獲得美國的好感，曾力主在滿洲當維持門戶開放主義不變，至此，因恐懼美國勢力的侵入，遂反與俄訂立協定，彼此劃分勢力範圍，除平分滿洲外，俄國認東蒙為日本的勢力，日本則

許外蒙爲俄國的範圍。這是一九〇六與一九一〇年兩次日俄協定的內容。日俄協調的形成無疑的是用以對抗美國之滿洲鐵路中立計畫；而以歐洲局面的緊張使英、法（一九〇四年）英、俄（一九〇七年）之間俱得成立協約，也是促成日俄妥協的原因。此時在我國，國際形勢實有巨大的變動，即昔爲英、美、日對俄、法、德者，至此一變而爲英、法、俄、日共同對德的局面。因之此時支配我國的是國際協調主義。這可說是日俄關係的第二期。

國際協調主義直到歐戰發生（一九一四年）乃告破裂。日本利用對德戰爭，既攘奪我山東利權，復對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同時，更乘俄國革命，出兵西伯利亞；而另一方面則利用我國安福政府，訂立中日軍事同盟，思欲一舉而實現其大陸政策的野心，囊括滿蒙、及東部西伯利亞爲己有。日本這種行動，當然爲各國，尤其美國所不滿。故一九一八年英、美、法、日雖共同出兵西伯利亞，至一九二〇年春，如美、英、法、意俱聲明退出，只餘日本尚不肯撤。最後，卒以華府會議中英美一致的壓迫，日本一方面感於國際形勢的不利，且在同時，白黨勢力反先後爲俄所削平，遠東共和國的勢力又日見鞏固，故至一九二二年

十月日本卒不得不宣布撤兵。同年十一月，遠東共和國政府宣布取消，東部西伯利亞遂復入蘇俄版圖。這是日俄關係的第三期，而華府會議實爲其關鍵。

華府會議的意義，一言以蔽之，是列強在東亞的協調關係的重建。日本因戰後的經濟恐慌與一九二三年的東京大地震，所以雖然野心勃勃，到底亦不得不實行幣原的協調外交。其間，以我國革命勢力的進展，日本曾欲乘機取利，如一九二七年田中的出兵山東及一九二八年的暗殺張作霖，然而扼於大勢，卒不能有何等結果。直至一九三〇年的濱口內閣，訂立倫敦海軍協定，其外交的主旨，還是幣原的國際協調主義。但自次年九一八東省事變，日本既一手撕碎九國公約、國聯盟約、非戰條約，國際協調主義遂以打破，於是東亞局勢的大變，日俄關係亦進於新的階段。這可說是第四期，今方在演進中也。

於是我們可以明白，凡在國際協調主義支配東亞政局的時候，日俄關係比較和緩，否則，便趨緊張。又在過去日俄關係緊張而爆發爲戰爭時，第一次是由於俄國勢力之席卷滿洲而南下，第二次是由於日本之欲乘機擴其勢力於北滿及東部西伯利亞；先後的

形勢實不相同。但是這一次，雖然發動的仍是日本，而今日的俄國已非昔比，以其充實的國力，若日本仍不適可而止，那末戰機的爆發是儘有其可能。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三 今日の日俄關係

現在日俄關係的緊張，除由於日本之破棄國際協調主義外，還有個最大的原因，便是以偽滿的建國，不特俄國利權直接受到損害，並且日俄兩國這樣成爲壤地相接的國家，由直接的接觸乃發生勢力的摩擦。

初，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俄國因爲對於東方向未曾有什麼戰備，卽其有之，也不是與日本相抗，況當此時，五年計劃正在進行中，而國際外交間，又未有何等布置，所以對於日本之進兵黑省，雖然危及自己利權，迄不敢有什麼抗拒，反聲明中立，似與之無關者。迨日本既囊括東省，建立偽國，且進而伸手於中東路，俄國還是外示和平，着着讓步。如當一九三一年底，俄爲保持和平，曾對日提議不侵略條約，然而反爲所拒。次年十一月，那時僞

滿業已建國，俄復重提此議，亦不成功。而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國聯通過李頓調查報告時，俄恐得罪日本，至表示不願與國聯有任何共同行動。至同年六月則更對日提議出售東路，交涉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乃成立協定。我們由此可見俄國對日維持和平的苦心。

蘇俄這種對日的讓步，不消說其用意是在謀國力的充實與戰爭的準備。第一在國防上，從此以後，蘇俄就向東方增兵設防，而為謀交通的便利，則改築西伯利亞鐵路為雙軌，並且獎勵移民，減輕徵稅，使東方不僅自成爲一經濟單位，且爲一獨立的軍事勢力。蓋以東方國境與俄及烏拉爾等主要根據地間，相距之遠，加以交通之不便，供應與增援之困難，遂使其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即謀建立足以防衛東境的軍力。這種計劃，因了日本向大陸的發展，乃更急進擴大。現在，俄國在東方，已自有其電氣、煤油、礦產、造船、製磚、水泥、及罐頭食物等工場了。並且因爲對於當地農民，會給與優先條件，以爲獎勵農產物的供給，正日有增加。尤其如要塞的增築，現在已具有很大的力量。東方的軍力，（常備軍是二十五萬人）在加倫將軍指揮下，已等於日本可用以進攻的軍數，因爲日本有許多

軍力尚須用於華北滿洲，不能以之進攻俄國。而就軍械與對科學戰具的運用言，俄軍較勝於日軍，俄國的空軍亦然，非日本空軍所能及。此外，蒙古共和國的騎兵，也可以為俄國之助。故在今日，若發生日俄戰事，在蘇俄實只是一地方的作戰與動員。這與一九〇五年時已大不相同了！（見『Strategy in Soviet-Nazi-Jap War』The Current of the World月刊六月號。）且不止如此，俄國為了補充西伯利亞鐵路的不足，更於貝加爾湖以北，與西伯利亞鐵路平行，築一鐵路，經勒拿河金礦以達於海岸。這條鐵路名叫BAM，此路若成，不僅軍事上日本更難進攻，而經濟上，東方也更可自成一獨立的單位。

第二，在外交上，俄國的成功也是顯然可觀。當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蘇俄在國際上是很孤立的。不僅美國對之未予承認，英國因為俄捕工程師事件，至廢止通商條約，禁止俄國貨物的輸入；而德國則自國社黨執政，反俄態度尤為明白。因此之故，俄國覺得欲謀對日，就非先有國際上的準備不可。當一九三三年夏，世界經濟會議開會於倫敦時，以李維諾夫的活動，俄與芬蘭、愛沙尼亞、拉多維亞、里陶宛、波蘭、羅馬尼亞及捷克諸國間訂

立規定侵略國定義的條約；其後更得土耳其、阿富汗、伊朗之加入。同年十一月，美國與俄恢復邦交，這給與俄在東方以不少的聲援。次年二月，英國與俄也重修舊好，簽訂商約。但是一九三四年中，蘇俄外交的最大收穫，還是與法國的關係的增進。因了法國的奔走接洽，一九三四年的九月，蘇俄得加入國聯為常任理事國。這更成熟了次年五月法俄間的互助協定。接着俄捷兩國間，亦成立了同樣的協定。至與波羅的海諸國間，在一九三四年四月，蘇俄俱與之將不侵略條約延長至一九四五年。若俄意關係，則自一九三三年九月，以友好條約、不侵略條約、及中立條約的訂立，亦既大為改善。英俄關係，自去年三月艾登遊俄，尤見增進，到了今年新正，李維諾夫至英弔喪，新君愛德華八世特予延見，這是蘇俄革命以來所未有的。同時復有四千萬鎊信用借款的談判。最近則英俄海軍談判，亦有成功之訊。

蘇俄這樣因為軍事上、外交上都有了相當的準備，所以對於日本的態度，便可不如以前之一味退讓了。但是因為歐洲形勢，德國有與日本相結以攻俄的可能，並且，戰爭一

且發生，是否將轉變而為資本主義各國的討赤戰爭，亦殊未能預料，故目前的蘇俄，苟非日本先行動手，當不致輕啓戰端。蘇俄的政策還在維持和平，以完成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不過蘇俄也知道無論東西兩方，戰機是正漸趨成熟，故在最近，一方面宣布與外蒙訂立軍事協定，不惜對日明白表示防衛外蒙的決心，而在另一方面，則仍答應日本關於邊境衝突，組織劃界與解決紛爭之委員會。所以就目前形勢言，日俄關係是否將更趨激化，我們一方面得看歐洲局勢，還有一方面則要看中日關係而定。

四 當前的中日形勢

由日本之意，對俄作戰本是以速為妙，蓋遷延時日，無非與俄以更多的準備，於日實為不利。但是，日本此時亦有不能戰者在，即日本對俄作戰也須有種種的準備。年來在偽滿方面，竭力以軍事的觀點，增築鐵路，即其一端。然而最要者是中國的態度，若戰爭發生，中國而竟乘機提出恢復失地的要求，或與蘇俄一致，此則為日本所大患。故日在對俄作

戰之先，必須中國能與之一致共同反俄；並且，還須以我華北，甚至西北，為其對俄戰爭的根據，由蒙古以進攻俄國。這便是廣田三原則逼中國須與之一致『共同防共』的用意所在。其實，日本這種惡毒的手法，現在是已為第二次，過去慘痛的教訓，我們無論如何應該不會忘記的。

當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因俄國革命，日本認為有機可乘，遂藉口俄德軍獨媾和，為防止敵軍勢力的東侵，誘我訂立『共同防敵』的中日軍事協定。『本日（民國七年二月五日）田中（義一）參謀次長來館面稱：俄國情形於聯合國日形不利，德國利用俄國，東亞和平深恐為之擾亂。德俘在西伯利亞一帶不下十餘萬人，一旦解放，即成勁敵。此時維持東亞和平，其責任全在中日兩國。微聞德國已有陰謀，一面從西伯利亞侵入東方，一面在甘肅新疆一帶鼓動回教徒肇事。萬一見諸事實，中國國防吃緊，即日本國防吃緊。中國現為參戰國之一，未審有無切實防備，渠意兩國利害關係，既如此密切，渠係軍人，從軍事上着想，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我駐日公使章宗祥致外交部電，見王雲〕

（生六十年中國與日本第七卷第六十九章）

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訂立於民七年五月，「在日本政府之用意，以為此約成立，一則可以出兵北滿，建造軍用鐵路電信之一切軍事設備，將來縱不占領中國之土地，所有俄國在北滿之鐵路及其他權利，日本可以設法攘奪之。二則可藉此出兵外蒙，鼓動外蒙之獨立。三則假共同防敵之名，使段系軍閥借日本重資，以練成中國之日本軍隊，為異日雄飛中國之預備。四則實行佔領貝加爾、阿穆爾、沿海三省，以俟俄國之變動，並為將來實際要挾俄國之武器。」（見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第二十三章第三節）而在我們，則參戰軍原來用以內戰參戰借款無非用以收買議員，改選總統；後來參戰軍改作邊防軍，而外蒙却斷送於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總司令徐樹錚之手。這個協定直到民國十年一月，幾經交涉始獲取消。那時歐戰已停止將三年了！

所以這次「共同防共」的協定倘若成立，其結果將很明白，日本軍隊不僅可以在我國各地隨意往來，自由行動，而且他必要藉口軍事關係，建築電信鐵路等等。試問如此

我國尙成其爲國家嗎？到了那時，日本要如何，我們便將真的惟要如何，不能再道一個不字了！故所謂『共同防共』者，日本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在一方面，便是夷我國爲僞滿第二，成爲日本的屬地；而另一方面，則思由此建立東方的反俄戰線，排除蘇俄的東方勢力，而爲其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樹立不拔的基礎。因爲這個協定一旦成立，日本在中國方面便可無後顧之憂，並且由華北以搗外蒙，由西北以出新疆，將使俄國窮於應付也。

對於這樣的協定，我們當然不能答應，況且是已經受過了一次教訓，因此之故，我們見到日本近月來的對華姿勢，只是一步步的緊逼，大量走私，所以打擊我的國民經濟，動搖我的財政基礎；而強佔察北，增兵平津，及煽動內蒙王公的獨立，則是欲併吞我華北五省，且進一步壓迫我承認其所謂『三原則』。

所以目前的日俄關係，誠如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博的演講，謂『日俄兩國目前不致在西伯利亞發生戰事，因兩國在該處俱缺乏進攻之兵力。齋藤又謂現在西伯利亞邊境之日滿軍隊，不敷作戰之用，且邊境雖屢生事端，日本政府亦並不採取可以認爲預備作

戰之步驟。齋藤亦深信蘇俄政府人民皆不擬與日本作戰，實際上蘇俄之軍事準備，不過爲謀求安全而已，並非欲攻擊他人。至於最近西伯利亞邊境的衝突，大率因疆界不明之故，如兩國能簡派委員，劃清界線，即可無事云。」（國民社電，見五月六日上海各報）這便是說兩國都尚有待於準備。日本一方面要竭力擴張駐偽滿的軍力，如寺內陸相在最近議會的說明，同時在他方面，則爲牽制蘇俄的主力，更希望能如一般的傳說，日德同盟成爲事實；但是無疑的，日本目前對俄政策的重心，却在逼迫中國訂立「共同防共」之軍事協定。所以我們此時不當以日俄關係的緊張而自忘地位的危急，也不應希冀日俄戰爭之爆發而藉以自免於禍。我們要正對事實，不惜最後的犧牲，那末纔能求得和平。換言之，一句話，日俄戰爭之將爆發與否，其關鍵實全在我們。我們倘若有辦法，有力量，那末東亞的和平可保；否則，那便難說了。

廿五年五月三十日

四 一年來的中日關係

家 禾

一 取滿洲救日本

日本資本主義爲挽救自己的危機，方發動軍事力量攫取中國的滿洲。從滿洲她究竟得到若干的利益呢？概括地來說：（一）因爲佔領滿洲，是打破數十年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均勢局面；所以日本爲保障佔領和準備由佔領而引起的戰爭計，不能不改裝自己的工業。由明治維新到『昭和聖代』六十餘年間，高飛猛進，日本輕工業的地位，逐漸爲重工業所代替。（二）重工業的發達，彌補受中國排貨運動受各國關稅壁壘阻擋之輕工業的停滯，使城市失業問題的急喘，暫時間得到蘇息的機會。（三）軍需景氣，浸透小資產階級，使他們擺脫若槻內閣緊縮政策的痛苦；並且賴有滿洲的尾閥，縱使不一定禮

『高橋財政』而當時給與的實惠，確足減少他們對政府的不滿，由之造成法西斯運動潮的低落。(四)受滿洲資本主義發展而陷於窮境的大倉財閥，以及與滿洲有資本血統關聯的有產者，隨『皇軍』之後，作稱心如意的掠奪，同時，建設滿洲的『資本飢餓』也調劑了日本國內資本過剩的痛苦。(五)不滿宇垣派穩健行爲的少壯軍人，有一塊用武之地，有一個使他們不流血而可耀武揚威的對象，自然而然地，在當時把一部分對內的精神，移到『王道樂土』粉飾的上面。(六)中國禮讓的哲學經不起對方軍事的壓迫，結果除一轉瞬間任太陽旗飄揚於山海關與承德城樓之上外，還一掃前此被他們所恥笑的『五分鐘』熱忱，連素來的拿手好戲——『抵制劣貨』也不敢排演，這放鬆了大阪的輕工業。於是中日關係史中，放出在日本人看來是光彩，在中國人看來是可恥的一頁，牠就是軍事的侵略，不獨沒有幣原喜重郎的杞憂，會引起輕工業的停滯，而且『不打不相識』似地，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反用對中國出乎情理之外的強硬，得到圓滑的解決。

由之，我們明白，九一八事變，無異是垂死日本資本主義的強心劑。經過這一度的注射，除農村破產無法改善外，城市可聽到『景氣』的呼聲。

滿洲爲日本盡了上述功能之後，自身却成爲日本資本主義鐵輪的犧牲品。雖然數年間，她吸收了十餘萬萬的日圓，而這些金額對她自己並無補益。資本灌入日本所缺天然富源的部門，開出來的是軍火業和道路的花架，牠不特無益於滿洲的經濟，而且蜿蜒於滿洲邊境的軍事工程，和『皇軍』的『宣揚國威』，反驚憤了她的生產者——農民，反激起農民的勇敢抵抗。如是九一八後的滿洲，是用農村的火炬，來映襯城市的電光，是用義勇軍的槍聲，來和諧關東軍要人宴會時的『三味綫』。

到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上述現象，更加顯明。最足威脅關東軍參謀處的，就是農產物價格的低落：佔滿洲輸出貿易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豆，每年平均出產五百萬噸，全世界的產額不過八百萬噸。牠的市場，在九一八前除歐洲外，就是中國本部和日本。中國當日銷路的銳減，是勢所必然。日本由於成爲人造肥料業的競爭品，受化學工業大王的反

對，無法作大量的吞納。在歐洲唯一的顧客——德國，雖然關東軍廉價地以之交換軍火，而由於輸入限制的緣故，也不能符合軍部理論家的算盤。因此在一九三四年滿洲對外貿易表中，大豆品（內包括大豆、豆餅、豆油等）比前年輸出量增加，而金額不過二億二千八百十一萬八千餘元，比前年減少一千九百零六萬三千元。其他如雜糧，如特產野蠶絲，也具着同一的現象。農產品跌落，縱不使農民破產，已足引起農村購買力的疲憊。這反映在滿洲的對外交易表中，就是佔輸入總額（大部分是生產部門的用品）百分之十六的棉織物，與前年度相比，計棉布減少百分之二·七，棉織絲減少百分之三四。食品中如砂糖減少百分之二九，小麥粉減少百分之二·七，再由於輸入小麥粉金額減少而數量增加的事實，給我們暗示了北滿土著製粉工業，已粉碎於日本製粉業傾銷的武器之下。經濟上農民對於必需品購買力的衰落，政治上必然成爲義勇軍活動的良好環境。於是，城市與農村「剪刀」的危機，不獨粉碎着麻醉性的「王道」教育，且變爲民族意識的天然培養劑。再加上大規模「武裝移民」之圈佔土地的行爲，迫轉於鐵蹄之下的

農民，只有用武力去報答爲他們建立破產的『王道樂土』的辛勞。關東軍能夠發揮『帝國最新科學結晶』——武器的威力，『掃蕩』(?)滿洲的遊擊戰爭，不能夠消弭由農村破產而造成之農民對他們的抗鬥行動。

到一九三五年末，聰明的關東軍幹部，已感覺到要醫治滿洲的沈疴，不能專由滿洲本身着想，應向滿洲的母國——中國去找覓對症的藥劑。回憶九一八前後中國軍隊讓的情況，他們對華北冒險的野心，又油然而生。這個野心的代價，便是迫東北軍移駐香河的自治運動(十月)，冀察委員會的設立(十一月)，和漢奸殷汝耕的偽冀東自治政府的組織。這些像連珠炮似的一幕一幕排演出來，唯一的目的是要使華北五省變爲滿洲第二。

過去，他們奪取我們的滿洲去救活日本；現在，他們又舊調重彈，要把我們的華北五省，作爲蘇醒滿洲的犧牲品！

一 三分中國

所謂華北五省，是指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而言。總面積計三九萬三千平方哩（約等於日本一倍半），人口八千萬，僅僅這些數字，已足給我們說明：如果日本佔有了牠，於解除滿洲危機之外，尙大有補於整個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軍部理論家的眼中，究如何處理這地大物博的五省呢？可由他們的理論，得到答覆。我們如非健忘，應記得他們時常所提倡的『日滿華布洛克（或集團）經濟』。他們用『共存共榮』的『伊甸』來引誘我們，用『工日本農中國』的美名，來遮掩他們自己的鬼面孔，事實上，這個布洛克形成之日，就是中華民族萬劫不復之時。因為，按照他們的計劃：（一）於華北地土氣候適合的省分，種植大阪棉花工業所需要纖維長度的棉花，這具有兩個功用：第一，若使棉花種植成功，則種棉的農民，由於依靠日本棉花業的緣故，消失，至少也減低後日反抗的可能性；其次，如河北，如山東，是出產大小麥高粱等作物的區

域，如改種棉花，則在布洛克前提之下，滿洲同樣的農產品，以之爲市場，可挽回今日價格跌落的景象。(二)日本本身是缺乏促進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必需的富源，如煉鋼的石炭和鐵，雖然取得了滿洲，還不能填補這個缺憾，一旦能夠開發華北，就把埋存于三百億噸的山西石炭，暫置不述，而河北的開灤、井陘、門頭溝和柳江，山東的淄川、濰縣和中興所有的產額，至少夠供十年內日本工業的消耗，此外他們尙計劃以上述的石炭煉龍烟的鐵。(三)就戰略上述，爲加強華北的統治計，需要由津浦路滄州至平漢路石家莊的滄石鐵路，由包頭至甘肅蘭州的包蘭鐵路，由張家口經熱河至秦皇島的鐵路，這三條鐵路一成，除緊握平漢津浦交通的動脈外，另把華北五省與滿洲熱河一氣貫通，再加渤海灣的築港使水陸互相呼應，那時候就不說還我河山無日，恐怕我們自己連嘆一口氣力量也沒有了！(四)除上述之外，另有獨佔華北市場的作用。

爲要實現上述的抱負，三宅坂和奉天的參謀機關，便按照中國當日的情況，產生一個「三分中國」的策略。一方面以華北駐屯軍爲主體，企圖使華北五省成立聯省自治，

與中央政府分離；另一方面又企圖扶植兩廣，期以廣東爲中心，產生與南京分家的華南政府。這時候有七肥原賢二、奔走滬港粵桂閩等地多方游說；同時以石原財閥爲背影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倡者，松井石根大將，也巡遊滿洲華北和港粵。他們都公開地說中國沒有『統一』的可能，誰愈想『統一』，誰便愈把中國弄成四分五裂，惟一的辦法，就是他（松井）特地爲大阪每日所撰中日國交正常化之途一文內所指示之『向統一的過渡，是聯省自治』。在這論文公刊之前，另有非常鄙視中國，却受中國文明餵養，寫起日本文章來帶着『之乎者也』，同時又以善做漢詩驕傲同種文士的『文章報國』貴族院議員，六十餘卷國民日本史作者德富蘇峯，他在同報上以中國之自治運動（一九三五，十一，二四）爲題，胡說中國『自治』是出『於歷史的傳統』，『如以中國爲中央集權的一國，其版圖未免過廣。有史以來，中國之統一，在事實上，殆不多見，偶而有之，亦不過有名無實而已。』更荒謬的是，越俎代庖地爲我們開個方劑，說『中國人之治夷狄也，云以不治之治治之。然此非僅治夷狄已也，即治自國，亦本此法。以不治治之者，即放任自治。』於

是勸中國政治家應允許華北以及其他各省自治。

自治的策謀雖好（？）究如何實現？這隨着日本內部的矛盾，反映出策略實踐途向的分歧。依軍部的意見，迅速擴大華北駐屯軍的組織（這是一月七日陸軍省軍事課武藤中佐視察華北回國後的主張，前一日駐屯軍參謀池田純久中佐，已向川島陸相作同一的請求），以之壓迫宋哲元，走向自治化，與殷汝耕的偽組織同流合污，然後再同化山東山西。但是岡田內閣却主張緩進，謀合理的解決。這個主張，自然不是爲中國着想，乃是以元老重臣爲中心的穩重國策。在這些老政治家的經驗中，以不戰佔有市場而取得利益爲上策，只在不得已時候方請戰神出台。由之，在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對中國的方針，毫無遺憾地發揮了三宅坂與霞關兩重外交的面目。鑒於銀國有等等的設施，躁急地欲發動『皇軍』的威力，這可用當日武官領袖磯谷少將的言論爲代表；而元老重臣却雍容靜逸地，假廣田外相之手，主張即開南京會議，解決中日歷來的糾紛。這個事實，與日本國內固有政治的危機，造成明治維新以來所未有的二·二六政變，同時以三大原則爲

開場白，展開此後中日外交的談判。

三 由有吉到有田

廣田宏毅任岡田內閣外相時，曾對議會宣稱：『當某任職之日，決不對外戰爭』以慰有產者的代表。他從『自主的協和外交』出發，一面和海軍一致壓迫陸軍放棄立即對蘇戰爭的立場，一面自負調整中日國交的任務，向中國政府提出三大原則：（一）取締反日，（二）承認偽國，和（三）共同防共。如何地勸誘中國當局，接受這些原則，他準備召集南京會議，並電召駐比大使有田八郎替代受軍部反對和非難的有吉明駐華大使。

這時候中國政府已經改組，新的陣容對於廣田外相的抱負，究相差幾何，不能不加以一番的估計。爲着這個原因，在中日外交舞台中，躍出一位新人，他便是我們常常在報紙上見到的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

須磨是一九三五年底搭長崎丸返國的，他在由長崎赴東京的火車中，以外交官的

資格，放言：『總而言之，對華問題，似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當江戶城移交時，勝海舟與西鄉隆盛（註一）談判所用的坦白胸懷和精神，如果南京政府要人沒有的話，中日關係不會好轉的。』（一月一日中外商業）公開地把中國擬爲德川幕府，把日本作爲乘討伐之威，兵臨江戶（即今東京）城下的明治政府。同時還要叫中日的外交家，學習賣主求榮的勝安房守，而他們自身，則自命爲大西鄉，在接受投降前，僅慷慨地延長對方內部商議的時間和折衝其他寬大的條約而已。如果中國當局沒有這樣的存心，那麼中日關係不能『好轉』，暗示着那時霞關外交家的責任完了，三宅坂繼之登台。

一月一日日本外務首腦部會議，決定三點：（一）徵之中國方面取締抗日後的情況，稍見誠意，爲國民政府圖其徹底化計，希望開南京會議。（二）日本方面基於舊臘重光次官與丁代理大使的會談，要請國民政府將關於南京會議具體的討論內容，先提交日本。（三）帝國政府要求盡可能地迅速使已提出之三大原則具體化。（一月十日中外商業）又依同報的記載，會議人物除兩國外交當局外，日本尚有海陸軍各當局及民間實業家的

參加會期係在有田新大使到任後約爲三月中旬。

然而這是日本內部以霞關爲主體的對華策略。三宅坂雖不反對廣田的努力，自己仍單獨推行那『三分中國』的既定方針，因爲在軍部眼中南京政府是『假裝親善』，決無承認日本要求的存心，外務省醉心於『三大原則』的具體化，徒給與南京政府以敷衍的機會而已。自然處當日本情勢之下，軍部這個急進的主張，很難得到勝利，川島陸相也爲着全盤計議，特地電召磯谷少將返國。

磯谷武官一月末返抵東京，三日向參謀部進言：(一)三大原則過於抽象，(二)徹底清算國民黨之排日抗滿主義，(三)容中國自動承認僞國。(同日讀實新聞)五日他又用同一的內容，報告川島陸相(同日同報)。結果，軍部採取一方面交涉，一面自治的方針，華北駐屯軍的擴大也因而決定。

廣田提出三大原則的用意，除欲和平地解決中日兩國糾紛外，另含有統一外交的存心。由於上述，廣田這個存心，是毫無效果。所以，當二月中旬有吉明大使返抵東京驛時，

似吐洩滿腹牢騷地，提出『一元化』的口號。由後日該大使在東朝上的自述（註二）給我們知道了這種呼喊，是經驗者之談。

有吉大使的『一元化』內容，是什麼呢？依十五日大阪每日的報告（一）此後日本外交，應統一外務與陸軍兩省的主張，不宜有武官與大使的時常對立，使對方有無從接洽之感。（二）當新大使未到任前，先把日本的要求，全部羅列，提交未來的南京會議，使牠一一實行，武官與大使則本此要求，一一促其實現。（三）在折衝過程中，應緩和『歷來之威壓和親善的兩重政策』，務使不惹起『如往年之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問題』的糾紛。（四）調和英美及蘇聯各國在華對日的感情，以『慎重方法』不『刺激』他們。（五）以華北問題為核心，使中國承認日本的本意，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曾舉『六大原則』但未洩露。（六）關於經濟及文化的提攜，本『互惠原則』而實現之。

上列建議，全部為外務省當局所接受，並根據牠製成方案，交新大使有田攜往南京。依後日的事實，似乎軍部所取得主張上的勝利，只有促進華北自治實現的一點。

有田大使三月四日乘安宅艦抵滬，六日呈遞國書後，即着手向國民政府交涉，此時適在二·二六政變之後，岡田內閣覆亡，兩國外交停頓。

四 由有田到川越

廣田內閣的外交政策，在組閣之後，可以說和他任外相時所手訂的，無大分別。那就是，對英重溫日英同盟的好夢，對蘇聯暫維持和平，對中國則希望實現自己手創的『三大原則』，又爲着駕輕就熟的緣故，昇有田駐華大使爲外務大臣。因此四月二十二日報

知新聞的社論說：

「有田氏以駐華大使的資格往南京赴任，即與蔣介石張學良等中國主腦部，毫無忌憚地交換關於今後中日國交的意見，互相披瀝彼此的胸襟，深信多少總有可造成調整中日國交的基礎工作。而且就任之時日雖短，在外交上毫無何種失策之處，獲得美滿結果而返日，在糾正中日外交下，可認爲是很好的條件。然而有田外相今後將以何種外交，來打開目前的國際危局呢？談到此點，結果豈非與內閣的外交，以大同小異的輪廓而宣告

終結嗎？過去有田氏的外交經歷，原來是不單純的協調主義，同時亦不偏於強硬外交之一途，站在所謂穩健主義的立腳點上，有以對外折衝毫無缺點爲外交重心的傾向。

「在有田外相的次官時代，與政府中一部份強硬論者（按即對滿洲問題）意見不合，欲毅然辭職，表示退出外交界，由此可見其一般了。結果有田外相所懷抱對外政策的根本觀念完全，合於廣田首相所懷抱的外交方針，這是不難想像的。因爲是那樣，所以體察前內閣的對華方針，答應駐華大使的任命。當時的廣田外相即是新內閣的首相，既已在新內閣任新首相，新外相的外交方針如何，自然是既定的事實。」

有田外交的本質，如上面的論述，而報知新聞記者所「深信多少總有可造成調整中日國交的基礎工作」究是什麼？在兩國外交文件尚未公佈之前，我們無法作準確的論斷，但讀賣新聞上海特派員（曾隨有田赴南京）田中幸利氏的通訊，頗足供我們的參考。他曾用有田大使中國歷訪之收穫的題目，告訴我們：「有田在南京任內，僅一十六日，但其間雙方之積極折衝的結果，與我方對華政策之變革，以重大的指針，稱爲含有決定日華關係將來動向的重要性，諒非過言。」（三月三十一日）接着他自問在這十六日間

中國方面給與「有田教育」，究竟是什麼呢？而有田自己所「學得」的又是什麼呢？田中氏帶幽默的口吻指出：「由有田張羣的共同宣言「雙方毫無忌憚交換意見，但對於重要之點，見解尚未一致，」這便是「有田全收穫的表現。」」因為所謂重要之點，依田中氏的報告，即廣田的三大原則。中國不是毅然地拒絕有田的要求，而是婉轉的說明。三大原則中由當時有田大使對日本新聞記者的自述，「……特別是華北問題，非常困難。」再依有田歸國（四月二日）時，對日本新聞紙談話中，公開地所指出，軍部與外務二元化的外交的弊病，應先「確立對華外交打開的方針」（三日與朝）看來，不特日本自己最熱心提出的南京會議，葬於無形之中，而且受過中國「教育」的有田，連自己都感到應有再確立打開對華外交方針的必要了。既然「作為帝國不動方策，」還須放在顯微鏡下去探索，那麼人們推測當時有田腦中，認為三原則不適交涉之用，並非無理。也為着這個原因，又勞日本外務省，於四月六月發表否認「放棄三原則」的聲明。

可是在外務省聲明之後四日，大阪每日，却用很大篇幅披露一段與「聲明」相反

的消息，且堪足證實有田的對華方針，不再採用三大原則的空洞名詞，而傾向取得實惠。每大所揭出『有田外相之新對華策』計有五點：（一）對華外交分開華北的特殊政權與南京的國民政府；（二）強化冀察委員會，使日滿華之軍事政治文化及經濟皆與以道義的與現實的援助；（三）與國民政府談判，以通商經濟爲第一，軍事政治次之，『當面緊要的，是撤回高率關稅，按相互主義，締結共同關稅協定』，結『日華經濟同盟』；（四）不強迫中國承認僞國，但僞國可加入上述關稅協定，『企圖事實上形成日滿華布洛克』；（五）防止外蒙新疆赤化的侵入，中國應施有效的工作。

如果上述的新對策，可算是日本帝國政府的『對華不動方針』，那麼，誰去促進這些方針逐一實現呢？在廣田的眼中是重光，然而叫這位好似金銀島的『拐約翰』，辦理對華的外交，在軍部看來，是不行的。自然所謂『不行者』，並不是說重光次官，缺乏外交的才幹，恰適相反，軍部所怕的，是有才幹的駐華大使，希望有田派一個可受他們驅使的人。結果曾以駐滿參事官資格，受過關東軍冷眼的『教育』，而貶赴廣州，後來似有所悔。

悟，轉任天津爲梅津將軍們奔走不遺餘力的川越，『異常拔擢』不經過公使而榮任駐華大使！

五 五月間的華北

川越駐華內定後，東朝天津的特派員，曾叩問他此後的『抱負』有一段相當重要的談話發表在四月十八日該報的上面：『誰就了大使任職後，欲早急地一掃日華間諸懸案，與兩國國民所期待的完全一致，此事至難。外交非僅由人物支配，乃決定於大勢的動向。』所謂『大勢動向』是什麼？他沒有指出，只主張經濟外交是先急之務。咀嚼這位新大使的『抱負』，我們知道川越登台，對於日本外交的方針，並沒有重大的更易。雖然軍部以爲川越易於駕馭，但川越的『抱負』與有田外交的本質，頗難分別。這樣軍部的立場，是否被震關抹殺？自然不會的，因爲繼磯谷之後的喜多武官，他已在準備召集華的武官會議。

如果上面的推測，大致不誤，則在四月末五月初間，日本的兩重外交，並未統一——事實上，基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一元化』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中國的態度，十分軟弱，能夠予取予求，——這似乎與有田外相的本衷相背，那又不是。因為，在霞關與三宅坂分頭進行中，日本中央部是用三相（外務與海陸）會議，來調和彼此的意見。從事實的表現看來，大概華北方面以軍部為主體，華北以外由外交官負責。因此，自十一師團長田代皖一郎與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互調後，日本在華北的行爲，可以說只有軍部人員的活動，不見外交官的面影了。

何以有如此的現象呢？似乎是當日中國的情況，尤其是華北的情況已經更易，使日本暫時可以忍耐上述的對策。所謂當日華北局勢的變化，依川越自述（五月七日氏返國至門司時，答大每記者的詢問）是如此：『由去年五月至今日，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期，華北事件發生時，排除藍衣社之政治恐怖的橫行（？）第二期，由去年十一月起，在華北有日華經濟提攜，冀東冀察兩政權的產生，使華北政治勢力統一。第三期，由今春起入

於兩政權與經濟開發的時代。」（五月八日大專）五月十七日有田外相在貴族院的演詞，也自稱「昨年春以來南京政府的態度誠佳，日華間懸案以及其他，可逐漸解決。」所缺憾的，只在於「中國對國交根本調整的決心不足」也就是說：「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呼吸尚不能吻合。」「現政府所考慮的，係使該呼吸相合而已。」也就是：「一方面促進中國政府的決心，他方面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如有應該研究的地方，也從事研究，期使呼吸相調和。」

細細地咀嚼有田外相第一次在議會的上述演詞，有一點給我們思索的，就是：日本政府尚要「研究」的，應是什麼？大概不外三點：第一是走私問題；第二是華北增兵後，可擴大情勢的對策；第三是由上舉兩問題而引起全中國民衆憤怒的應付問題。自然，在日本軍部的字典中，「中國民衆憤怒」幾個字，是沒有的，但日本的聰明外交家，却有妥爲應付的警戒心。霞關既承認軍部在華北的動作是對的，又要避免對中國人民的刺激，這事本不容易，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却有給日本外交家施恫嚇威迫的機會。結果，本來的日

的是不激起中國民衆的反作用，而所得的效果，却日本所意料不到之中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的各種統制。增兵華北後，可擴大的局勢，表面上，好像是屬於華北駐屯軍的任務，但依有吉明前大使所述的經驗，（註二）牠與霞關人員在南京的交涉，却有密切的關聯。結果採取「現地不擴大主義」，慢慢地迫冀察政府與冀東偽組織合污同流；這一點當日的軍部，似乎也與以同意（因此兩廣異動時，不見華北駐屯軍的「發揮實力」）而較難解決的是走私，因為牠所牽涉的範圍頗大。

華北走私，自偽國成立後，由於失去大連海關的功用，早已活躍，幸有海關緝私的嚴密，不能有所發展。及冀東偽組織成立，撤去陸地藩籬，以武力為後盾，走私的猖獗，在於意料之中。開始時候，日本政府的希望，是以為取得天津海關管理權及減低關稅的代價，後來由於冀察委員會的柔弱無力，使浪人的行為，以得寸進尺的姿態，愈演愈奇。於是，引起了兩個結果：第一，走私不特破壞了中國關稅制度，而且無形中毒殺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這一點決非國民政府所能允許。中國政府雖不能直接取締浪人，而對於本國作奸犯

科者的行爲，用法規和人民自動的糾察，在內地却不能說毫無效果。就在日本方面，走私的發展，可影響正當的貿易，使未取得走私利益的日本資本家起而非難。取締浪人，不說非日本外交當局所肯爲，就在駐屯軍關東軍「注意」的情勢下，也無由取締。不能解決這宗事，國民政府固無積極的對付手段，而如何撫慰內地資本家的不滿，這是有田要「研究」的一點。其次，走私的結果，不獨破壞了中國工業，而且使各國在華的利益，受着損害，尤其是與中國關係最爲密切的英國，不能袖手旁觀。也就是說：會影響到整個廣田內關的對英問題。

六 日英與中國

從史的發展看來，英國是日本資本主義的恩人。但自日俄戰後，受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歐戰之賜的大阪，牠的輕工業却凌駕於蘭開夏之上。於是隨着日英同盟的解消，太陽旗與三十字架，引起了不可避免而且尖銳的衝突。最明顯的，就是在印度，在埃及，在澳

洲，在加拿大，都有排斥日貨的舉動。英國之排日，不是帶着進攻的性質，而是防禦戰。

日英利益的矛盾，在中國表現得更為明白。就投資說來，當日俄戰時，日本在中國的資本，可說等於零，歐戰時各國對華投資總額三十二億圓中，英佔百分之三八·七，日本不過百分之十三。到現在，中國約七十億圓的外資，日本佔其半，英國不過百分之三十而已，這可說明日本的勢力逐年膨脹，而大英帝國的逐漸衰落。如果英國不振作，只有一條路可走，牠就是退出中國。

我們試閉着眼睛想一想，英國如退出中國，香港不守，新加坡的屏藩既撤，印度和澳洲勢必相繼脫離，沒有印度的大英帝國，能保持『日不落』的榮譽嗎？英國資產階級，決不會默到這個地步。而且事實教訓他們，今日的日本，非日俄戰前可比，取了滿洲，獨自開發，不必依靠英國的資本，而且還有餘力，再企圖獨佔華北和華南。所以，自李頓調查團的任務失敗後，英國在華的態度，逐漸積極，交通網的建設，（註三）幣制的改革，都可以看做積極的成績。

可是當英國驚醒時候，日本的勢力已伸入華北。就華北投資而言，英國不過六千一百十一萬元，比日本之八千九百五十二萬元少，而毅然放棄，勢所難能。那怎樣辦呢？我們知道英國僅為在華的利益，無需對日一戰，因為她尚顧及其他的殖民地。歐戰後的英國，是殖民地最多的國家；為爭奪殖民地而戰，在英國不是必需。從大英帝國整個的利益說來，富裕（就殖民地而言）英國的外交，是維持現狀，也因其維持現狀，所以，她方口裏念念不忘『和平』。

到和平政策不適用於應付日本的進攻時，英國於準備還未充分之前，不能再採退讓的方針。牠就是犧牲自己在華北的利益，企圖取得日本不南下的代價。羅斯來華時的訪日，四月初旬駐華大使賈德幹返國的繞道東京，都負着這宗買賣的任務。這種誠意的，慷他人之慨的禮讓，無動日本之心。因為四十年代的日本資本主義，就本身的發展說來，不能不以整個中國為吞噬的對象。僅僅華北一隅，非今日日本工業用武之地，大阪與關夏門爭的舞台，既是整個的世界，叫大和資本家以華北自滿，這等於癡人說夢。

另一方面，日本內部的矛盾，與對英的外交，也有關係。換個時髦話說來，那就是我們所常聽到的『北進』或『南進』。九一八後，依陸軍的主張應『北進南守』，先獵『北方之熊』——蘇聯，可是爲着軍艦燃料大部份取於樺太的關係，適與海軍的抱負——『南進北守』，相背道而馳。這兩個路線，各有各的背影，而廣田內閣的對英方針，則徘徊於海陸之間。他雖然堅持對蘇聯的和平，並不是贊成海軍的主張，因爲他已派遣吉田茂使英，與保守黨的霍爾海相，張伯倫財相，以及艾登外相等，却在溫着日英同盟破鏡重圓的好夢。這些糾紛，影響到對華問題的舉棋不定。英國也利用這個弱點，方有戀戀不捨的接洽。因此嚴重的走私問題，驅使羅斯於六月初再度赴日。

這次赴日的目的，依羅斯在加拿大皇后號入神戶港時輪上的談話，是如此：『站在第三者的立場，日本與中國，日本與英國利害之調整，就中國之經濟的、財政的再建而言，不能不得日本的協力。』（東朝六月四日）日本用走私的手段破壞了中國經濟，固非中英之福，亦非日本之利。其次，『日英共同對中國的要求是增進購買力，要培養中國國民經

濟力，日英兩國的協力，是必需的。」（同日中外商業）廣田內閣對於羅斯的要求，究竟內部經過多少的磨擦，我們固不得而知，但由讀賣（六日）對於特別議會後三相會議（五日）的標題『緊張的三相會議』，可知有激烈的爭論。結果，依大毎的報告，英國要獲得日本的『協力』，只有『承認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承認日本對於華北的特殊關係』（六日）如果英國沒有認識這個大前提，而欲局部地解決華北的走私問題，那是免開尊口。我要聲明的，這時候的羅斯先生，尚逗留於三島的名勝——箱根。

此後，羅斯氏會過日本軍政要人，又會與馬場藏相會談對華投資問題，但都無結果。事實上，羅斯氏這次渡日，是多此一舉的，因為在軍部的眼中，英國的態度，恰如一月末磯谷少將會見羅斯氏後所說：『對華共同援助之志雖同，而日英兩國間，在程度上及關係上則各異。譬如中國是經濟的病人，躺在日本人住宅的樓上，由英國看來，不過是好似援助在醫院中靜養的病人而已。』（大每二月一日）

兩廣暴動時，英國人的行爲教訓了磯谷將軍，這位『經濟病人』在英國看來，不是

睡在日本人住宅的蓆上，而是躺在大不列顛帝國的家！

七 中國換一副面孔

羅斯第二次赴日的失敗，客觀上對於中國，是有莫大的援助，因為英國放棄了委曲求全的念頭，而重排一九〇五年的戲劇。

一九〇五年，英國爲着防止俄羅斯勢力的南下，不惜傾全力扶植日本以爲東亞的『看門狗』。這句話，我們常常在日本人的論文中看到。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英國爲着排擊日本的獨佔中國，要開始援助中國去對抗日本。

要中國和侵入領內的敵人抗戰，第一步自然是促進中國分裂政權的統一細細觀察歷史的發展，給我們一個十分有趣的結論，那就是英國開始否定一八四二年起的對華方針。鴉片戰爭的結果，英國把統一的中國分裂，此後爲着維持自己的勢力，一貫地採取扶植割據政權的手段。到四十年代，中國如再是軍閥割據，則獲利最大的，不再是英國，

而是日本。既然南京政府與一九二六年的廣東時代大不相同，那麼，爲英國計，只有把他培養起來。

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已達到垂死的階段，縱使英國是華陀再世，扁鵲復生，亦無能爲力。換句話說，中國要能夠取得英國（和美國）的援助，須具有一個前提，她應該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具有內在更生的力量，這力量就是生產力的向上發展。

自一九二七年起，戴上勝利之冠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走過多少的迂迴道路，還能夠發展下去，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需要國內的廣大市場，需要爲他們安定市場的中央集權政府。由之，從中國本身客觀的情況說來，在四十年代，也須掃除封建割據的局面。

另一方面，九一八的事變，給與中國的刺激，是民族主義的蓬勃。爲着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勝利，所以，民族主義的發展，不特無礙於她，而且在有利情勢之下，她還可以之迅速武裝了自己。

基於上述原因，國民政府，方能夠血不染及地，解決了兩廣的異動。中央軍開進廣州之日，中國開始更換自己的面目，因為她已具有走向「統一」之途的資格。

當這個時期，我在一個週刊中，概括地提出必需「統一」的問題，曾受小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非難，笑我爲「政府」說話。歷史到今日，無論那個階級，都受民族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痛苦，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爲解除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而爭取中國的統一；不是在那裏做着「分權」的勾當。就從中日關係說來，封建割據的局面，是利於日本，而毒害於中國民族的生存。前面早已說過，日本「三分中國」的方案，就是根據中國已有的情勢而生。誰再爲「分權」而努力，誰便有資格獲取日本政府「中日親善」的獎章。

這種「統一運動」的主張，無疑地有利於中央政府，因爲現實是由國民政府來負擔這個統一的使命。不了解歷史法則的人，說我們理論是「法西斯化」，在我們看來不值一笑。因爲站在歷史後面者，永久不會笑了人，而且還受歷史的審判。果然至兩廣異動

解決，他們方張開嘴巴說：『我們不反對統一，但新的形式有新的內容。』不管他們怎樣賣弄『哲學』的天才，而『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却是掩蔽他們『尾巴主義』的裝飾品！他們不從歷史的發展去了解中國的統一，而臨時抱佛脚地，用『三大政策』等舊招牌，去作有意義的轉向。一頭牛在屠夫面前，能回想已被宰殺同伴的悲慘，數年來血的記錄，却不能教乖了這些蠢才！

不只中國有一部份人，看不出這種統一的前途，就是日本政府，也不能了解這個前途的實現。所以，當兩廣異動時，他們忙的是準備坐收漁利。因為在三宅坂參謀部的情報中，和當日國內希望分裂人們的估計一樣：南京政權，會在這次戰爭中解體。

到事實證明這個估量錯誤時，日本的當局，方開始着急。這時候他們的內部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在中國統一之後，以南京政府為交涉的對象，易於實現日本政府的利益，而且統一後，各種的建設，對於日本資本主義有利而無害，這種主張，自然是屬於穩健的。另一派人，以為中國統一的結果，是對日強硬和強化華北，然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犧

牲農，因而導中國經濟於崩潰之途，結果中國統一，是威脅東亞和平。（七月二十二日大報）
由之，主張立即發動實力，在華北造成新的局面。

我們不必批判上述主張的理由是否正確，只由那兩種意見的分歧，知道日本對華的外交又開始一個摩擦作用。

日本內部不僅對中國的態度，起了分歧，就是已被抹殺的日英問題，在這時，又呈活躍。因為受英國在華行動的威脅刺激了一部份日本政治家，感到日英協力，對於日本的利益，大過日英的對立。於是，廣田內閣，對英的素來懷抱，又經吉田茂之手，顯露出來，這便是七月三十一日東京朝日所披佈之『以對華援助為中心，走向日英協定之完成』的新聞。

至今日，由『日德同盟』消息的洩露，大概可以反證明日英同盟復活的努力，難於實現。同時，牠又可給我們暗示了日本在『南進北守』國策下，對英或更加矛盾。

八 由「成都」經「北海」「漢口」至「上海」

受中國走向統一之途的刺激，引起日本內部意見的分歧，這是必然的，因為岡田和廣田內閣的矛盾，都賴着對華外交勝利而緩和。中國中央政府威力增大後，給與日本的反響，相當之大，這可由八月七日三相會議時，素來靜逸態度的海相，居然發言：「既然蔣介石之實力，及於中國全土，則日本無論在何時，均不能採傍觀的態度，應取指導的立場，進而樹立打破現在的窮境的適當方針。」（讀實八日）得到證明。究竟這次三相會議，對中國局面如何估計和爭執呢？我們可由大每九日對華政策轉換說，窺見一二。依該社論所述，計有數點：（一）中央政府對西南工作完成之後，必買其餘威，轉銳鋒以臨華北。日本政府為應付計，先傾全力於設置「日滿華三國經濟合作的理想地帶」。這個工作的前提，是強化冀察政權，以積極指導態度，芟除經濟合作的各種障礙。（二）所謂國民政府無視日本在華北的利益，這是一種風說，應用冷靜的態度去檢討其事實，不應自作風聲鶴

嘆之驚。且應乘這個良機，準備未來的交涉。

根據這個方案，有田外相，一面令川越大使在南京進行交涉，另一面爲圖華北經濟提攜之具體化計，外陸海三省，各派調查員（註四）赴華北視察；同時又遣桑島東亞局長赴大阪探詢關西實業家的意旨。

三省調查員到達天津後，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海光寺兵營召集重要會議，討論華北對策，結果議定：應付時局歸武官負責，使館的任務則爲經濟提攜。屬於前者的範圍頗大，但就華北而言，說來說去，還是『冀察政權明朗化』的問題；屬於後者的，則爲關稅之減低，及經濟提攜具體的辦法。中國政府對於中日經濟合作，本不反對，於是八月中旬間，中日外交一轉再轉，轉到經濟合作的頭上來。由於這個事實，方有王克敏北上的一幕。

天津武官領事會議結束後，南下的川越大使，方抵達青島，便發生成都（二十四日）事件。這種事件，在各國外交史中本是常有的，如果日本人願意翻開自己幕末史一讀，也可找出比成都事件更加嚴重的事件。可是日本的外交方針，却利用之而企圖取得別的代

價，那就是：除所提（一）責任者之處罰，（二）國民政府之正式道歉，（三）賠償損害，（四）將來之保障（八月二十九日中外）外，另要求成都設館。對於這一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羣氏，在答大每村上南京特派員的話中，十分堅決地說：『因為成都不是商埠，所以不可能，日本說那是既得權益，這全屬片面的解釋，中國絕對沒有正式承認過。』（八月二十九日）

儘管日本報紙鼓吹『不能姑息』、『毅然懲罰』而事實證明，在這個階段，威脅的手段，毫無效果；軍部阻於廣田的外交，無法一逞，而氣却洩在王克敏氏的身上。於是連經濟合作的計劃，也因而頓然一挫。

成都事件還未解決，九月三日廣東又發生了『北海事件』。對於這個事件，最為憤慨的，是海軍。日本處置的方針，不是作為『地方事件』，而是擴大起來，於『道歉，處罰，賠償，將來保障』（與成都事件要求相同）之外，另附加（一）排日教科書之改編，排日教育之禁止，（二）排日集會結社之禁止，（三）排日團體之解散，國民黨部之解散，（四）各種懸案之解決（九月二日東朝）依上列的條件，日本當局，又注意到排日的問題。

時至今日，中國人民不能否認，（也不必否認）有日本所謂之『排日』的事實，但日本政治家，應本室伏高信所說『爲排日絕除計，不能不先慎重地冷靜地公正地去研究排日的原因。』（讀實九月八日）一個民族對於另一個民族的反抗，是一種物理的法則：受動之力和反動之力本是正比例的。徵之日本幕末史，堪足爲中國人民辯護，這種反作用是用是自然的非人爲。幕末的日本，僅爲着憤『夷人』踐踏『神國』而有生麥打殺和焚燬公使館等的行動，主動的人或是武士，或是後日維新的元勳。今日中國的局面，比之當時的日本相差天壤，既失東北四省，又有形勢危殆的華北，這促使中國民族自救，誰敢說不行？日本的皇道教育，一再以忠君愛國勗其臣民，何不許中國人民（教育暫不說他）自動地起而忠民族愛國家？再之，自新生案件發生起，中國政府對於日本的要求，一再頒發『邦交令』其容忍的態度，已超越世界史的紀錄，日本尚以爲未滿，則日本眼中的『排日』其內容之大，其涵義之廣，確非中國人民所能了解。中國人民雖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抗日』本意，而對於日本的面目，却能夠作絲毫無訛的認識，告訴日本政治家，中國民

族的生存，就靠着這一點。

由成都事件到北海事件，給與日本軍部的衝動。除關東軍與台灣軍相呼應的聲明外，依九月十六朝報的報告，當時的海軍另編『南遣部隊』，集結在海南島一帶。由該島在南方的地位，我們不難了解日本的存心。

多事的中日外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九月十九日，漢口租界裏，又發生日本巡查被人槍殺的事件。既然肇事地點，在於中國政府力所不及的租界，而行兇者究屬何人，尚未水落石出，則這種案件的責任，不能加在中國政府的肩上。但日本政府，却對中國提出新的要求：（一）華北五省自治，（二）關稅減低，（三）開設上海至福岡航空線，（四）招聘日本顧問。（讀實九月二十二日）

這個要求經讀實發表的翌日，上海又發生吳淞路日本陸戰隊員被射殺的事件。如是和火上加油地，燃起中日糾紛的火。經驗告訴我們：增加一次不幸的記錄，日本便擴大要求的範圍，於是『成都』、『北海』與『上海』三個事件和觸媒似的，把中日外交

引入一個新的嚴重的階段！

九 緊張與鬆弛的循環

九月末日本國內對於中日外交的態度，是相當緊張的。海軍的強硬，陸軍的躍躍欲試，政友會的鞭策，似乎日本有立即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但日本人民和民間輿論，却要求和平，他們對於政府態度的不滿，更甚於中國報紙的非難。由之，使四伏的危機，忽然鬆弛下來。二十八日有田外相，對在京各國新聞記者，也發表『採取外交解決方式』的談話。

中日外交的鬆緊，關鍵本握在日本的手上。日本既然決定先取外交的方針，則向外交之途走去的第一步，便是二十八日中國亞洲司司長與川越大使的會見。這個會見，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東京各報也自認牠是川越與中國行政院院長會面的前驅。

經過初步談判後，有田外相於二日急派桑島主計攜訓令赴華。這個訓令，依當時日

本各報的記載，與三日廣田首相急赴北海道，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他在上野站對記者會宣稱：他要將中日問題上奏天皇。從這些蛛絲馬跡去探討，日本內部對華所取的手段，還現着許多的糾紛。

另一方面，緊張的局面，並且又影響到國際來。同日同盟社披露英美重要協議，和英國發表『日本如確立中國全土保護的支配權，在中國有重大關係的英國，對之不能無關心』的聲明，與以後公佈中英信用借款的新聞，可以證明日本當日急於第三國干涉的反對，不為無因。

五日桑島至華，中國行政院院長亦由南昌返京。八日川越與蔣氏會見，依十月十日讀賣的披露，在會見中他共提出六個條件：（一）對第三國赤化侵略中日共同防衛，（二）鑒於北支的特殊性，准許五省自治，（三）取締抗日及排斥日貨，（四）改正排日關稅率，（五）上海福岡間中日交通網的設立，（六）國民政府聘請日本顧問。中國對於這些提案的回答，是一個『主權尊重，互讓平等』的原則。又依大每九日的記載，蔣氏會告川越

「具體交涉，一切與張外交部長商之。」這些經過的情形，如屬事實，則日本在會見中並未達到合於理想的目的。可是中日間的空氣確緩和了許多。

就日本的情形看來，在決定「外交解決」的方針時，自然會估計到時間的延宕。處這種千金一刻的時候，日本不會任其錯過的。所以已僵的華北經濟合作，又復蘇醒，遂有十二日李思浩氏代王克敏任冀察經濟委員會主席之舉。

李氏對於經濟合作的大綱，依同盟社十八日北平電，與田代司令官，堀內總領事，議決進行的計有下列四點：（一）滄石鐵道建設的資金，（二）目下探掘龍烟鐵礦之中日合辦公司設立的問題，（三）關於棉花栽培培植及其購買方法之具體的決定，（四）為調整華北的金融起見，中日合辦銀行之設立問題等。

由前此的敘述，當成都案件未發生前，日方早注目於華北。後日劍拔弩張，危言威脅，目標也無非是華北。對於華北五省的整個野心，為着各種客觀事實的限制，不能一口吞下，只能逐步實施。首先是冀察政權的強化。強化這個政權的目的，分為經濟與政治兩方

面，同時這兩方面彼此又互有關聯。現在乘南京忙於談判之際，取得經濟開發的先決條件，接着即向冀察委員會求設立教育委員會。設立這個機關的目的，在於取締北平四大學以及其他學校之學生運動。因爲自一九三六年起，學生運動已成爲推進民族洪潮的主力之一。可是這四大學的指揮權是操在中央政府，誰雖敢坐教委會主席之椅，也無法報效華北駐屯軍，其結果必變爲王克敏第二。（註五）所以，十月二十日中外商業告訴我，章士釗氏辭退上述的顯職。

根據日本人的報告，至九月末，累次談判，對於「防共」和「五省自治」兩個問題毫無結果。過去，中國對日的外交，可以是說「賠不是」，自西南問題急轉直下後，居然可爭則爭，而且「杭州會議」，「魯主席南下」等等的行動，確比前此稍爲進步了。進步的原因，依我看來，是國力的增長，和內部矛盾的減低。我們不能否認，今日中國內部尚有許多摩擦的因素，但這些東西，當對外戰鼓鑿鑿地响時，該會煙消雲散。

處這樣局面下，稍見鬆弛的中日外交，又稍趨向緊張。日本各報均以「荏苒曠日」

的『中國奸計』警告自己政府，同時又以交涉停頓的責任歸咎中國。然而，這些宣傳，毫無補於事實的發展，所以，有些日本政論家，告訴我們廣田內閣由於對華外交的不展，可招來『十月政變』。政變的『風說』，數月來無月無之，而廣田內閣的壽命，並不和『風說』一樣地倒塌，這固有許多原因，但如果對華外交不能順利，雖不會產生『政變』，給與廣田政權的相當打擊，那却是可能。所以，過去經常的一幕——調整內部爭點，又復躍現出來，牠就是須磨總領事（廿三日）的返國。

須磨返國的任務，係磋商『防共』與『五省自治』是否可以暫緩解決的問題。同時，中國的駐日大使，也會見有田外相。

依日本各報的佈露，軍部主張是條件『絕對不許分割』的。到二十九日，中外商業告訴我們，須磨總領事帶回的新訓令，是：『以華北自治及防共兩問題，爲日華國交調整的根幹，至少須決定大綱，作爲交涉必需的條件。』基於這個訓令，十一月十日同報告訴我們，在川越張羣第七次會議中，兩國『交涉或者急轉直下』，『成立諒解』之勢。然而

綏遠的戰事，却成爲諒解成立的障礙。

一〇 此後中日還有外交嗎

綏遠戰事的爆發，是在預料之中。忽然爆發的原因，那可以說是日本內部政潮的產物。在軍部少壯派的眼中，須磨返國是多此一舉，按照他們的觀察，自西南事件結束後，中國的行爲，一幕一幕地證實他們素來的主張：（一）南京政府表面假裝親日，內心必仍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拉攏英美作抗日的準備。（二）拖延的結果，南京政權愈趨鞏固，日本對華的發言權，也愈減弱。所以，他們的結論，是立即發動武力，給中國以一頓好好的教訓。

和軍部意見相反的人，却主張：先取得不用武力中國方面可允許的利益，而後腳踏實地的一步步幹去。譬如，提出七個條件，如中國能答應五條，就先促對方實行。其餘『防共』和『五省自治』，留諸後日交涉，在他們看來，交涉的機會正多呢！且華北雖不『自治』，如經濟的開發，能按日本的計劃做去，則目前的五省，和以前的東北，半斤八兩，只要

再來一個九一八的行動，就夠了。

三宅坂對於這個計劃，由須磨新訓令及第七次川越與張羣的會議的情況看來，似不堅持反對。可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橫在反對軍部主張者的面前，那就是如何地促速華北的開發。李思浩的就任，開發原則的獲得，這在軍部看來，却不算外交的勝利，因為中國在成都事件之前，早不反對了。成爲問題的，是着手投資。涉到這一點，少壯的軍人至少是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便憤憤不平。滿鐵十五萬億圓的五年計劃，格於日本資本家的反對，尙無法推進，就是政府對於滿鐵所欠的股本，也須松岡出馬，方吞吞吐吐地允許，這是一個事實。負擔華北開發任務的興中公司，從事業的範圍看來，決非現有一千萬元的資本所能進行。欲擴大爲一億元，各財閥鑒於滿鐵的前車——『國策第一』——不肯投資，要事先約法三章：（一）興中脫離滿鐵，由投資者管理；（二）興中的投資，不能『國策第一』，應『經濟利益』居先；（三）華北政情安定。如果不能合於這三個條件，則財閥的投資絕望，所謂開發華北不是等於一紙空文嗎？

爲着這個原因，關東軍、華北駐屯軍及中央軍部的少壯軍人憤怒了。憤怒的代價，是名義上的『一元化外交』，又復二元起來。二元的表現，就是南京的會議，與綏遠一帶偽匪的進攻，具有和諧的演奏。

這個進犯的意義，依我看來如下：（一）日本少壯軍人，習於九一八、熱河、塘沽協定，役，以爲中國一貫地採取退讓的方針，他可施故技，驅匪軍入綏，先取得綏遠等地，而後站在『既成事實』，對南京作辦理善後的外交；（二）三宅坂的軍事計劃，和德意志參謀部『霍夫曼式』的打算相同，以爲用軍事力量，戰勝中國，猶如探囊取物。本着這個眼光，他們以爲能一鼓作氣地改易華北的局面，滿足日本財閥的慾望：『安定華北政情；』（三）也許這種鬧禍的冒險，可消弭正在醞釀中軍部政黨與財閥間的混戰政潮。

可是，他們忘却估計一宗事：過去少壯軍人，不是口裏說，西南沒落後南京政權強化，由而對日會強硬嗎？不是說過，強硬之後，在英美援助下，會對日抗戰嗎？如果這些的預言，不幸實現那末，在廣田內閣期間中，日本軍部的冒險，會有與九一八相同的結果嗎？若使

沒有，則由之引起大戰，國際局面，對於日本是否有利呢？

自然，這些問題是我們爲他而提出的。在三宅坂的腦中，很難有這樣的打算。因此，綏遠的炮煙，一天一天地濃厚了。

中國處這個局面裏，好似決心脫下過去「不抵抗」的恥辱牌，給與僞匪軍以迎頭痛擊。同時，大每有一個可使人興奮的消息說中國態度忽變，已承認（？）五條件的『覺書』，表示不顧，不顧原因之一，同報也自說是綏遠問題。（十一月十四日）這個依讀賣所描寫『中國態度豹變』的結果，在十三日三省會議中，產生『硬論』（記着這兩個字是日本報紙所喜歡用的），主張停止交涉，本獨自見解，進行華北與內蒙的工作。

那麼，中日此後似乎沒有外交可言了！

有這樣的日子，我敢說，那是每個中國人民所禱望的。（註六）

註一 見拙作西鄉隆盛傳第五節。

註二 見九月三日起連載東朝有吉明前大使日華關係再檢討。

註三 英國在華的鐵道事業，既成線有京滬、滬杭甬、廣九、平漢、津浦、粵漢，另計劃建築運鹽、長沙和成都，敘州、昆明、大理、騰越和八莫等線。如本年底萍株線延長完成，則有事之秋，英國的力量由上海、杭州、渡錢塘、越玉山、入南昌，通長沙、接粵漢，與長江的艦隊商船隊呵成一氣，如長沙至成都的鐵道完成，則交通網貫穿長江流域，使華中與華南，造成朝發夕至的局面。

註四 依八月十五日東朝的報告，外務省派東亞事務官太田一郎，陸軍省派影佐中佐，海軍派中村中佐。

註五 王氏至津受漢奸示威的侮辱，結果知難而退。

註六 本文係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說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止，整整一年。內中關於美國的立場，日本內部的政潮，和『上海事件』發生後，中國所提出的反求，均未涉及，乞閱者諸君諒之。



因主張穩健財政爲
少壯軍人所反對致
在二二六事變中被
戕之日本藏相高橋
是清



廣田內閣時代藏相
馬場鎮一主張膨脹
政策



日本新藏相結城豐
太郎主修改馬場財
政

下
日本外交批判

一 日本外交的反省

中野正剛

題目是『日本外交的反省』。爲非常時的倦怠及恐怖所侵蝕的我國所謂知識階級的心理，於此或可感到一種暗示罷。但筆者之意，却在與此適相反對方面的反省。並且，也不是由反省而退縮停止，乃是欲立定主意，正式着手。現今日本的外交，已不是由外務省與軍部作指導競爭的時候，應當由全體國民整其呼吸，以全力克服決不後退的進路。

誠然，日本的外交情勢是充滿了使有感覺的人們應加反省的資料。例如十二月七日東京各報同時刊登着十二月五日英外相霍爾在下院的演說，與美國務卿赫爾的聲明。英外相的演說，辭義含蓄，一面整其傳統的威容，一面又用鄭重的反語，解剖日本的腹

心。他以為華北的自治運動，實使英政府不能不發生危懼之念。他以喚起日本政府的注意為前提，引用日本政府的辯白，即「華北自治運動乃純然是中國要人自發的運動。」當其說到這裏時，忽然滿座笑罵之聲並起，於是他的反語諷刺，乃得到了巧妙的表現。接着他更用外和緩而內堅強的語氣說曖昧的華北形勢，可由中日兩國政府聰明的交涉而得到緩和。最後，他的結論說：「日本的勢力，使人感到一種深刻印象，似正繼續伸其干涉中國內政之手，這是非常遺憾的，這樣的事態，實不止有損日本的威信，且將阻礙中日兩國及友邦諸國的友誼關係。」英國政府當局，這樣，竟在公開的議會中，對日本的行動表示非常遺憾之意，這是自英日同盟以來，數十年間所未有的。霍爾所謂日本在華北的行動，「不僅有損日本威信，且將阻礙中日兩國及友邦諸國的友誼關係，」其意若曰：日本不要目空一切的行動了，中國是不答應的，並且即是我們友邦之間，也是不能坐視的。在這當中，可知是含着非常的警告與決心。此種外交演說的調子，正如歐洲大戰勃發以前，英德應答之英國外交文書。

同日，美國務卿赫爾，亦發出與英外相相應的聲明，可知這其間是含有深厚的默契的。他觀察華北的現狀，說「要想實質的變更華北諸省之政治的地位及形勢的努力，雖然受到了抵抗，仍繼續進行不已，這是確然的事實。」他這樣認定日本之對華北武力干涉。他又說，中國的變動不止限於中國，且有關於各國之利害者亦甚大。他重覆的說中國的現狀不僅美國，凡有關係之列強都不能坐視云。在這種主張下，他所欲採取的手段，便是尊重現有國際間的一切條約及協定，使各國政府都嚴守國際上的諸原則。當時美國雖沒有指出九國公約，但其用意，欲利用國聯盟約，非戰條約及其他所有國際法規，合有關係各國之力，以壓抑日本在華北的立場，是可以認知的。美國政府當上海戰爭爆發時，曾欲表示其強硬的意思，其後因考查自己的實力，詢之海軍提督謂不能有何等保障，於是不得已只好守着沈默。現在，行使實力的決意既尚未定，又鑒於濫發抗議之無謂，於是考慮的結果，遂想出了實行國際和平原則的主張。這樣，美國便可不負單獨責任，而與各國一致對日本加以壓迫了。美國的所以如此，則只須想像英國外交在華府的活動

便可得之。質言之，這是國際排日工作之進步。

日本之職業外交官與知識階級層，其內心所最畏敬恐怖的，就是英美兩國。故英美之心存不快的，同日發表壓制日本的聲明，當然要使他們感到一種衝擊。加之在華北風雲的背後，更可明白看到與英美相呼應的蘇聯的活動。這樣，英美俄中之共同排日，在現今，實已不是一種想像，使人感到是一種現實的壓力了。於是大家都不期然的感到長此下去，日本將非常危險，並且感到日本今日的國際地位是大似戰前的德國的呼聲。當此之時，我們應加反省與警戒，遂成爲外交界的常識，而爲人所注意。

二

倘說今日的日本有如戰前的德國，那末這當中所含的意義，其第一點是與英國爲敵；第二是經濟、產業、貿易之巨大發展，致爲世界所嫉視，結果必然的威脅列國，而最險惡者便是與英國相對立；第三是由內外的環境，雖勢必促進不可避免的危機，但所謂知識階

級者，竟因循姑息，直至今日，尚欲藉緩和外國之憤怒，求得其好感，而自免於危機。還有，在我國之有力者間，不惜大言如愷撒，以刺激各國的觀念的愛國主義者，却沒有腳踏實地作澈底的可恃的準備的。

試就昭和六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國之對外政策，作一番檢討，便可知其一斑。我國之劃期的大陸飛躍，完全是由於內外情勢的必然，在這裏，並無如拿破崙、大彼得那樣的雄圖霸略。昭和六年九一八事變當時之日本政權，是以和平主義與消極主義為其外交及財政之信條的。內閣、外對國聯、九國公約、非戰條約等之束縛表示恭順，內則墨守財政、緊縮、消費節約那種傳統的自由主義的規範，只知由良善勤勉以享受日本的安易生活。原來國內之自由主義經濟與國際上之通商自由主義，其關係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從世界各地求得廉價的物質與製品，以使其大衆生活趨於安易，同時，生產低廉優良的物質與製品，廣售於國際市場以確保產業貿易的利益。這是自亞丹斯密以來的信條。而此種主張維持和平關係，以謀通商貿易之海外發展，減低工銀，節約消費，輕減生產費用，

使低廉的製品得以銷售世界的行動，正是昭和六年以前的外交及財政經濟。換言之，夙興夜寐，勤勉節儉，在世界之前，必恭必敬，以求得市儈主義的利益者，便是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不料歐戰以後的國際情勢與以此為背景的國民生活，已不容平和主義與市儈主義有取得利益的餘裕了。

國際協調主義勢力之轉向遠東，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早已感到。南京之離去蘇聯與英國接近，而立足於英國投資區域的長江一帶，即表示以英國為指導者的國聯各國要向東方發展了。於是南京政府在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下，煽起全國的排日運動，其勢延及滿蒙，致危害及日本之既得權益，日鮮人民有不能安居滿蒙之狀。結果遂因多次險惡的事變，有九一八夜的大爆發。此時，主張協調外交與自由主義經濟的日本政府，其態度甚是溫厚。但是日本政府因自囿於戰前平和的舊觀念，雖是態度攸開，而在當地負着責任的，却因了實感，不能坐視不動。於是有居留民的團結，有關東軍的緊張，遂致日本上層階級，不得不與其向所恐懼之英美及其他列強，發生衝突。即東三省由自衛手段發展而

來的建國方針，並不是出於日本政府的打算，乃是因了當地責任者的呼號痛感，於是惱着窮途的日本國民的潛在意識遂表現出來了。故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以滿洲事變為始的大陸非常時，是並非以中日的衝突為根據的原因所在，是由於使中國政府所以如此的國聯的國際支配力與不肯對之表示屈服的日本二者之衝突，蓋在國際上自由通商主義既已自現實社會消滅，高率關稅，輸入統制，其甚者如輸入禁止，竟成為一般的原則，日本的輸出貿易在全中國受到抵制，逃到印度又為英國所阻害，而在南洋則為英荷協力所排斥，失了大市場，想尋小市場，却又被拒，於是確保滿蒙及遠東大陸之自由解放，遂成為日本生死的必要條件。但是國聯綜合的壓力之進向遠東，也有其內面的必要。所以這種衝突，並不是由於觀念論者之愛國心，也不是由於野心家的功名心，而為一種不能回避的鬥爭。並且，要想回避這種鬥爭，也不是取媚與追從的辦法所能為力。日本實除了直率大膽的表示其所欲為與不欲為的明白的界限，而以實力使各國加以承認外，別無他道。若無故退避，必反招致對方的進迫。這是本質的問題，非隱瞞政策所能緩和的。

把『滿洲國』建立以來的事，當作既成事實，以爲世界已既承認，這只是日本的自己陶醉罷了。例如斯汀生主義之在美國，是斷不會取消的。又如退出國聯當時的決裂，誰也不來設法挽回。各國繼續否定滿洲建國，日本反之，則對之加以肯定，這種對立便是今日的現狀。固然，歐洲的暗雲目前尙未一掃而盡，美國的國內政事也尙未安定，他們或不致立即與日本啓釁。但我們須知他們是把這當作未決的懸案，加以保留，以待大勢的變化。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外面對日本竭力裝作好意，而內面則煽動中國，以中日衝突爲導火線，窘迫日本。因此之故，日本政府之中日親善外交，雖是誠心誠意，而中國方面則始終表示拒絕。

在這險惡的空氣中，忽然又有羅斯借款的陰謀。羅斯的借款，雖以日本政府的抗議，中英兩國當局俱聲明取消，但這是形式，至於內裏則已實行，英國金融資本與中國的買

辦政治家，已既由此得到巨大的利益了。英國有四億五千萬鎊的匯兌平衡資金。把這換爲日本錢，那就在六十億圓以上。英國政府與金融團，擁着這樣巨大的資金，憑着其經濟通信網而從事於有利英國匯兌的國際匯兌投機買賣。以此而獲得數億圓的利益，原來並非難事。故若借款的形式有所不便，英國儘可以其有餘的資金，利用金融相互的信用作用，而採取他種形式。並且英國還不止此，自昭和十年夏季以來，派遣使節，實地考察，對於中國既建未建之鐵路，已有八億圓的投資計畫，此等廣大深遠的計畫，並不是今春華北動搖以後，突然着手的。反之，計畫的由來是非常深遠，由這大計畫所造成的霧圍氣，於是乃刺激起華北的動搖狀態來的。

在滿洲，在華北，凡與此實狀相直接者，是不能漠然坐視的。華北五省的獨立計畫失敗而縮小爲冀察二省之自治計畫，由計畫之動搖，日本成了列強猜疑之的。現在，當地的負責者是在煩悶苦惱之中，死守其立場。但是日本政府對此却完全是局外中立的狀態，任當地當局以與中英俄三國相周旋。故當中國全體動搖的今日，華北的安定雖可一時

彌縫，到底只是加深禍害，貽患將來而已。

只有當地具着這種實感，對於由此實感而生的反射的衝動，指示以應趨的方向，這是本國政府的事。

總之，華北的局面，雖可一時彌縫，但其內中的列強的工作，決不以此中止，是可斷言的。日本倘若格外放鬆一點，歐美却會當作日本是已到了窮途了。最近歐美的軍事外交評論家們，都以同樣的目光看着日本，其言曰：

『日本之防禦的海軍，內容大爲充實，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前，美國的渡洋作戰計畫，實無成功之望。英國要想把艦隊進至新加坡以東，恐難免爲波羅的海艦隊第二。此時，足以威脅日本的，只有中國日本的空軍計畫。美國陰謀從北方阿拉斯加以空襲日本外，更在南方，自夏威夷經菲島，以謀在台灣對岸之福州，建設一大飛機場。且在上海附近之杭州，已有美國軍官所指導的一大航空學校，而長江一帶，中美合辦的航空公司已聯絡貫穿起來了。不僅如此，美國更援助蘇聯，充實其空軍，使優越的蘇聯空軍得以從海參崴而窺伺日本。英國則爲完成香港與印度的陸上連絡，在漢口建立一大飛機場。藉以確保香港，廣東，漢口，西藏，印度間之航空線。這

種延長及於遠東的列強的航空網，一旦有事，當然要作空襲日本的前衛陣地。因之，日本的進窺華北，決不是爲的如前世紀帝國主義之求得原料，日本沒有這樣的餘裕。蓋自沿海州以至全中國的海岸線，若俱建設起列強的前衛陣地，那末日本的海陸軍雖是怎樣的優越，亦將無所用。這是日本生死所關的問題。天羽聲明的用意即在於此。¹

可是英美蘇聯雖具有這樣的威力，要對付日本怕也不是易事罷。英國的用意，想利用其外交上獨有的手腕，煽動俄國，使其立於前鋒，然後援助美國，徐徐的以謀不勞而操勝算。但今日的蘇聯已不如昔日俄皇時代，容易爲觀念的愛國心所動而出此無謀舉動了。蘇聯是實際主義中之最爲實際者。蘇聯的用意，甯假裝樣子，誘導英國出來，因爲這樣，蘇聯便可固守着邊境，靜觀英日戰爭的展開，像往昔英國坐觀日蘇戰爭的立場一樣了。

四

要之，英美蘇聯三國無不欲設法在遠東打擊日本。但是對於這打擊日本的犧牲，却

彼此互讓，誰也不願居先。英國希望蘇聯先動手，蘇聯則希望英國，英蘇二國又希望美國，結果大家都覺得還是請中國來，於是煽動中國，使與日本發生全面的衝突。可是中國怎樣呢？目前，中國當局正在經營四川，以謀造成政治軍事上的最後根據地。中國能不受其煽動嗎？且我們須知中國若一旦與日本開戰，那末如天津、青島、上海等沿岸諸港，雖俱須放棄，像從前俄國之對拿破崙，今日阿比西尼亞之對意大利一樣，退入內地，以為持久戰，可是那時的結果將是怎樣呢？而中國沿海諸港為列強利益錯綜之地，日本決不能加以破壞，也不能就此獨佔。若溯長江而進兵內地，則雖從前不乏其例，然長江防備，以科學的進步已非常容易。只要在那裏，放下若干水雷，建築若干砲台，那末要想以袖珍戰艦而控制長江，實甚為困難。且軍事愈隨長江深入內地，在各地就得配置若干大軍以為連絡，結果勢非有非常的大軍膠着於中國各地不可。此時，列強的空軍若一旦出動，以威脅日本，且從太平洋及南洋方面包圍日本，實行經濟封鎖，蘇聯軍隊復乘機從北方南下：這不就是英美中俄的遠東未來戰爭的光景嗎？但是日本的空軍正在增加，軍隊的機械化也大

有進步，中國若真爲列強的煽動所惑，而與日本開戰，則其所受損失，自亦不能想像。

在這情勢之下，日本由反省所到達的結論，卽爲克服不可避的危機，不可不樹立萬全之策。自然，最重要的是強固國防，而財政則爲其基礎所在，經濟生產力更是財政的基礎。至於怎樣來強固國防，充實財政，擴大生產力，則要依照日本今日的環境，及新的觀念。滿蒙地方廣大，達日本之三倍，華北民衆又多至一億。現在，至少在華北的新形勢下，『滿洲國』與中國之經濟的國境是已完全開放了，卽以日本『滿洲國』中國爲範圍的經濟生活的新分野已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日本具有優秀的民衆，且有可以無限伸展的技術、能力及組織力，現在，當其前面，又是具有巨大發展的可能性之大陸的土地資源，故我們優秀的民衆如欲與這種土地資源相結合，而建立豐富的經濟生活體系，就須有今日必要的金融、財政、經濟政策。總之，凡不認識豐富的土地與優秀的民衆的實在之經濟財政論，都是舊式的。日本今日要認識其要點，肅清一切小兒病的觀念，動員全部智能與勞力，而展開開拓遠東的

Steam roller

——谷虛摘譯自『改造』新年號

二 當前重要外交批判

本多熊太郎

現內閣的外交失敗，現在是慘酷地受了國民的宣告。但此宣告，我們可不應只視為國民直感的表現，我們必須以事實與條理為基礎，就其結果細密考究，加以批判。下面就是以此意義，想對國民的裁判法庭提出一點意見。且先就對華外交來批判一番罷。

就日本的立場言，最近的中國是盛滿澈底抗日的毒氣之一大橡皮管。倘若沒有重大的把握實施一定的國策的計畫，換句話，就是由當局的魯莽輕率而致橡皮管中的毒氣，因以外洩那樣的事，是應當竭力避免的。

我們知道雖是千里的長堤，可由細小的蟻穴而趨崩潰。而若一旦潰決，那末滔滔的

毒流，便將不可收拾。如成都總領事館問題，自開設以來，正式領事原來一次也未去過，常由書記生斌書記以上的副領事代理其職。但是現今，却不問事由之如何，對停閉業已五年的四川內地的一個領事館——爲了這樣一個小領事館的再設問題，輕舉妄動，以致引起今日那樣的事端。說起來這正是輕率地破壞滿盛毒氣的橡皮管的行爲。成都領事館之無理的強欲再設，勢將遭遇南京政府澈底的妨害，這種實際情形，在與外務省有特別關係的國際評論，東日吉岡文六君的論文中，已可明白見到。

總之，成都領事館之再設，至少在中國方面，理論上儘有可以抗爭之點，且南京政府由其一種報復心理（即對於清津中國領事館事件），正是一個得行其妨害工作的絕好機會。當地的大使館及總領事館，對此情勢，應該有所報告。若然，則政府應取的辦法，就應與南京政府間，關於再設領事館問題謀適當的解決。在未解決以前，應當使領事的赴任（其實赴任的是一個代理事務的書記生）延期緩行。這才是事務上的正當處置。但是政府却不取正當的辦法，而只知以再設成都領事館爲我方的單獨行爲，揚言於國

內外，以求合於國外年少氣盛的官吏的調子，結果只使中國方面的反抗，更以普遍深刻。照理，凡是外交官及領事官，必須得到就任國政府對其資格的承認，然後始能執行職務。然而今則不問事情之如何，不顧理由之當否，對於就任國政府的妨害，也不講求排除的措施，而一味作強制實現的放送，真是不解事理到了極點，爲我文明大國帝國之恥辱。爲了帝國的令名及我外交機關的威嚴，我竊爲之悲痛不止。果然，岩井書記生（並非領事）在重慶一離去其所乘的船（日本輪船）的瞬間，就完全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結果，不僅我國外務省的面目爲之蕩然，甚至毫無關係的日本旅客，也受到了意外的慘禍。這樣因了輕率者流的醉舞狂歌，便把毒氣管踏破了，於是自成都事件以後，繼着北海、漢口、上海、長沙，到處發生對日恐怖行爲，大似中國全土在展開着對日的遊擊戰爭。

爲中日交涉契機的排日的殺傷事件，這樣遂以成都事件而開始。而成都事件，則實由我政府當局對於再設領事館問題的處理，粗暴無責任的放送所激成。這是我敢斷言的。所以，對於成都事件的發生及以此爲契機而展開的許多不祥事件，現政府的外交首

腦（不是指外相一人）實負有重大的責任。

所以這次騷亂的根本是在霞關。就爲此事，現政府的立場很是困難。於是爲了挽救此困難，乃圖謀事件之善後交涉。但是今日的結果，則更增加了重大的失敗。這失敗是什麼呢？（一）把對華交涉之要點，不限於殺害事件的善後處分，而乘機提出並無關聯的政治的懸案，尤其如華北與防共二問題，給中國用爲侵犯其國家主權的宣傳資料；（二）雖然沒有十分的決心與準備，却虛聲恫嚇，示威壓於對方，結果反招人輕侮；（三）政治的要求在折衝之初，本已爲對方明白拒絕，但是我們爲了保全面子，仍把交涉的主力集中於此，以冀獲得對方的妥協，結果上述二大政治問題不必說，即如取締排日、連絡航空、減低關稅、聘用顧問、取締不逞鮮人等，亦無一成功，只剩了成都北海兩事件，因爲殺傷人命無論爭的餘地，中國方面尤由國際慣例以爲解決；至於漢口事件、上海事件等，則藉口發生地點在中國警察管轄地域以外，完全拒絕。凡此，我們由南京外交部對於日本外務省十二月十日聲明的反駁，可以明白看出。

並且，還有一個最後的失態。蓋以如此複雜而影響重大的交涉，當其進行之際，由事務的當然準備，並國際談判的慣例，理應逐日有其會議記錄（由兩國全權簽名），但是我們却未嘗有此。倘若不然，帝國大使是認為有記載會議經過並結果的記錄，而提交於對方的外交部長，乃竟被不認為正確，而自行交還，像這樣的事件，實中日國交七十年的歷史上所未有的恥辱。說起來到底因為談判的方針內容，不僅鹵莽滅裂之甚，且對於如此重要的國際會議，其應該有的事務的準備，竟亦全無理解。於是時互三月的長談，只是一篇謔言，徒受盡了對方種種的愚弄與侮辱而已。我們知道在大使臣，言其活動不過是一個 messenger boy，由今日的情狀，關於事務的要點，竟不能對駐外的代表有適當指導與注意，故其責任的大部，實不能不由政府自身負之。

且如華北與防共二問題，是政府所謂調整國交的重要問題，實為這次交涉的眼目，是交涉努力所集中之點。但是中國的態度，甚為頑強。在川越與蔣介石相會見時，蔣即明言國交之調整原為中國所切望，但必須以平等互惠的立場，且須以尊重國家領土主權

並行政權之完整爲原則，若與此原則有背的提案，則俱不能承認。是可知日本二個重要的要求，中國的態度是根本沒有把這當作問題。又由最近政府的聲明，『關於防共問題雖未全部成立，但關於一部分已有一致的意見』，但蔣對於日德防共協定的公布，其所表示謂『防共乃國內問題，不容有外國的干涉與援助』，由此可知日本政府所謂一部分的意見已趨一致者，是沒有的事。至言『關於華北問題，已達到中日協力以經濟開發爲原則』，但是所謂華北問題，我們的要求不能以同意經濟提攜的原則，便算滿足，是很明白的。倘其如此，對於內外的神經，實刺激太大了。

日本國策的標的，是在中日滿三國之提攜，由此觀點，這意義是謀在華北設立一種可譬爲模範農場似的特殊政治機構，即與蔣介石的所謂領土主權爲行政完整之二大原則，根本不能兩立。所以對方最初就斷然表示拒絕，其後，對於冀察政權，南京政府更明令謂關於經濟上的地方約定，若無中央的許可，不得訂立。又如防共問題，就日本的立場以言，最感切要的是在華北方面。但是就華北問題言，事實上現已一部分如日本的希望

在實行了，在這時候，實無乘了成都事件與南京交涉以求其承認的必要。

要之，中日交涉現在是完全吵了開來了。在交涉開始的時候，日本外務大臣曾明告世界說：『這次中日交涉的結果，或者是中日關係非常良好或者是非常惡化，二者必居其一。所以中國現在是立於重大的歧路，必須決定究竟與日本握手，還是不然。』（九月二十八日外相在其公署招待外國記者時之聲明。）但是今日，中國竟拒絕與日本握手，中日關係非常惡化了，政府或者也感到自己的責任罷。

二

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外交失態，便是日蘇漁業條約的簽字問題。政府倘若能對日德防共交涉嚴守當然的祕密，日蘇漁業條約本是可在預定的日期，即十一月二十日簽訂成立的。然而這個祕密的洩漏，却完全在於東京，且是由於最居樞要地位的國務大臣之口，現在這是公開的祕密。其實，自十月以來，在消息靈通的人們間，日德防共的交涉，已

是尋常的談資了。況至十一月半，一二大報都登載着外相將有劃期的報告，及關於調整日德國交的談判，德國大使會訪問首相等消息，於是蘇聯大使遂對外相提出質詢，外相是個正直的紳士，遂如實的告訴了他，說這是以共產國際爲目標的協定，並非以蘇聯爲對象。

正當蘇聯大使對外相提出詢問的時候，東京泰晤士報的特派員亦訪問外務省，把日德協定已達相當程度的真相，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泰晤士報上，根據東京的消息，發表了上海方面的電報。而在另一方面，英國外相則於十六日招日本吉田大使詢問此事。這樣，因了十六日泰晤士報的特電，全個歐洲遂不禁大起驚動，倫敦、巴黎、羅馬各地都引起很大的注意。但是德國則在二十日以前，關於兩國政府的交涉，初無何等消息發表在報紙上，簡直「日」字都沒有提起。

在這其間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載，蘇聯政府即訓令優來乃夫大使，關於有田外相的聲明，提出嚴厲的反駁，略謂日德防共協定的由來，在協力以謀國際共產運動之取締，但

是日本國內共產運動之取締，當然不必借助於德國的警吏，德國也是同樣，不必求助於日本，是可知所謂取締共產運動者，實是以某國即蘇聯爲目標，這不過是一種隱秘兩國間軍事秘密條約的外衣而已。對於這質問，據稱田外相是不加回答。而紐約 Herald Tribune 則謂有田外相乃顧而言他。

由上所述，是此次機密的洩漏，不是德國，也不是其他國家，而是在於東京。換句話，很明白的責任是應該歸於日本政府的首腦。政府對於如此重大的機密，不止不能保守，且由身居政府重要地位的一二國務大臣而洩漏於外。這不能不說是日本政治史上所未有的重大失態。政府大概早預定以十一月二十日爲漁業條約簽字之期，於是把日德防共協定之簽字，定於二十五日。這便是爲的恐怕在漁業條約簽字之前，成立日德防共協定，蘇聯或將藉故拒絕訂立漁業條約。但雖然如此，政府自己却把這樣重大的機密，洩露於外，在二個月前，幾於東京的報界政界，都知道這事了。倘若以爲如此，蘇聯的外交機關尚茫然無知，那實足見政府當局之無常識。果然，因了政府疏忽而洩漏消息的結果，漁業

條約之簽字是發生問題了。日本由朴資茅斯條約所得的利權，這樣遂遇到了很大的阻害。

關於中日交涉之失態，尚是外交技術之巧拙，即能力問題，但是漁業條約之不得簽字，則由於責任大臣以中日交涉的失敗謀轉換輿論的對象，由於內政上的失策欲轉移人民注意於其他問題，這完全是一種不正當的政略，這樣，因了輔弼大臣自己的洩漏國家祕密，遂致帝國自身窮於進退，實為帝國外交史上之重大失態。

三

總觀近數年來日本外交，有一特色，便是不顧客觀情勢，為毫無實現性的口號外交。譬如對蘇外交的重點，在要求蘇聯減小遠東的軍備，便是很好的例子。帝國政府，或者提議在滿蘇國境設立非武裝地帶，或者要求蘇聯減少在遠東的軍隊，像這樣的放送，蓋自廣田任外相時代起，實為每次在帝國議會的外交演說。到了今年五月第六十九屆議會

中，有田外相的演說，則更爲強調。他指摘蘇聯在遠東軍力之過巨，謂帝國政府對之，不能無所關心。既然每次在議會都提到這點，政府大概當相信是有實現的可能的。果其如此，未免太缺乏常識了。

我們知道受了凡爾賽條約束縛的德國，以自由意志而訂立洛加諾條約的德國，並且希德拉也曾表示尊重，但是一旦不顧一切，破棄萊茵的非武裝條例，再行占領對手國的英法二大國，因已成事實，尙且毫無辦法，只好容忍，而謂並無條約制限，也無條約根據，由軍力的均衡，要對日本確立優勢地位的蘇聯，他能因日本外交當局非正式的演說，就同意於撤減軍備嗎？這是三尺小兒也不會有這樣的夢想罷。

然由廣田在外相時代的放送，於滿蘇國境兩方，數十公里的地方，設立非武裝地帶，蘇聯方面把伯力、海蘭泡及赤塔等重要都市的所有軍事設施，都行撤廢，反之，日本則把滿洲國方面改爲爲無人之境，只留着極微的國境守備隊，不作什麼軍事的設施。像這樣夢想的提案，不過供對方的一笑而已。可是由政府與國民之怠慢疏忽的結果，現在遠東

的兵力，日蘇之間，已顯然不利於日本。在這時候，日本的政策應當是迅速完成陸軍裝備的現代化與空軍之充實強化。但是却置此不問，而欲以外交工作希望對方裁減兵力。這真叫作痴人說夢。結果不僅招致對方的輕視，像中國與英國的態度，自去年以來，也對我大變。

原來在一二年前，對於日本的武力是世界都心存畏敬的。但是因了日本政府的恐懼遠東蘇聯軍力之過巨，常對內外放送其縮減論——不，放送其悲鳴，於是中國不必說，甚至英國也感到在遠東『武力的日本』是已不復存在了。這樣的評論，英國半官的泰晤士報曾一再有之。質言之，今日的英國，與往昔訂立英日同盟，日俄發生戰爭的時候，正採着相反的政策。從前極力利用遠東第一武力國日本以牽制俄之遠東政策的英國，現在覺到遠東第一武力國已非日本而為蘇聯，故欲利用蘇聯以牽制日本的大陸發展了。

當七月二十一日英國上院討論遠東政策時，實業大臣斯太那普伯爵代表政府的演說，其中有云：日本對華所取者為勢力範圍主義，故與旨在維持現狀，主張門戶開放的

英國政策，根本不能相容，如英日協商等，在今日不僅已不成問題，且由滿洲的非法拘捕印人事件，華北之走私等，要想與日本親善，也是很爲困難。這可說是日本主張英日同盟復活論者的當頭一盆冷水。原來英國的對日態度，較之去年是有非常的變化。推原其故，實由英國以爲日本已不足畏。而英國之所以致此，則因爲關於蘇聯在遠東的兵力，日本常表示對蘇聯的重壓的悲鳴之故。

四

至如廣田所謂調整中日國交的三大原則，也與前一樣，是口號外交之最顯著的表現。此三大原則，如大家所知道，乃一月二十一日帝國議會休會再開時，廣田外相外交演說的最大重點。其一便是中國當放棄以夷制夷的政策而改變爲中日提攜。其二是中國當承認『滿洲國』與之成立外交關係，而第一步則爲先在華北採取使中日滿三國關係不致惡化的方法。其三就是爲的防止赤化，中日兩國共同協力。以上三點，誠爲日本之

所希望且日本外交的努力應當以此爲其目標，是誰也不會有什麼異議的。但是日本外交努力的目標雖在此三點，若與把這三點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看作同樣的事，那可錯了。因爲一旦提出要求，若是失敗，那不僅是我們的恥辱，且將使中日關係更趨惡化。要之，問題須視對方有否承認的可能，及其客觀情勢與對方的意旨、國內情形等而定。而由專家的眼光以言，則如廣田外交演說所揭的三原則，實在毫無實際價值，只供中國作反宣傳的資料而已。且以帝國外務大臣在議會的聲明，謂此三原則已得中國的贊同，然而接着，中國却立即向世界表示否認。而對於此否認，我們的外交當局却守着沈默，不作一聲，直至今日。這已是非常的失態了。

迨廣田任首相，有田繼任外相，由其在五月特別議會的演說，當然亦不外是三大原則論的複述。以本年一月出世而即流產的對華三原則，這樣在國內，釀成了重大的形勢，使現政府在對內的立場上，不得不膠着於三原則。於是因了這次成都事件等等，遂不顧客觀情勢之不相干，即認爲良機而提出並無關係的華北與防共問題來。且欲以此爲交

涉的主點，不惜放言發動實力，以恫嚇中國與世界。其實就是要發動實力，也因交涉開始過於拙劣，到底不能有什麼效果，結果反招中國的輕侮，列強尤其英國則援助中國，加以煽動，遂造成今日那樣日本所未曾有過的失態。現在，以中國為中心的英美蘇等國的態度，是頗為不良，這是世界所周知的事實。其中，茫然不知的只是日本國民，政府只知極力加以掩飾，蔽塞國民之耳目。

三年以來，我純真的國民受着此輕疏空洞的口號外交的翻弄，現在到底悲慘地露着現實了。由西安事件的變化，內閣以萬一的期望，或可保若干日子的殘生，挽回幾分的失敗。但在剛健的國民，可不應有此態度。我們不管西安事件以後是如何，將來中國的政權是有怎樣的變化，無疑的，中國的抗日政策，只有一天天趨於尖銳露骨，同時，英蘇美法及其他各國的策動，在這其間，亦必有所活動，對岸擴大的西班牙，難保不從此出現，在這重大的時局面前，這個慘敗的內閣，若能依舊存在，究竟是忠良的國民所不許的。

——原文載十二月廿二至廿八日大阪每日新聞，平子節譯。

三 危機在歐洲抑遠東乎

蘆田均

世界無疑的，現在當着大雪崩之前，日本能否不致捲入於此雪崩之中呢？可是照樣子看，其脚下已在開始動搖了。一旦發生動搖的雪崩，要想加以阻止，那是到底非人力所能及的。歐洲大風雪的預料，雖是衆所一致的意見，但是歐洲的戰禍爲潛在的，距勢必發生的境地，似還須相當的日子。反之，遠東的情勢則已脫去潛伏期了。和平的否決已不出很近的時間了。而否決和平的力量則一視日本大陸政策的動向。在這裏，雖也有多少疑問之點，但其傾向却已可以稍稍看清。這信號，不消說是紅色。

歐洲的情勢日益混沌，雖不易見其前途，但低氣壓的中心，則誰都明白是在德國，其

不連續線則擴展至於東歐。歐洲政局最近期的時期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這一日，也許是世界歷史上值記載的一日。在這一日，德國退出一般裁軍會議，表示着重整軍備的態度。以後發生了許多事件，但俱不外是促進凡爾賽和平體系的崩壞的要素。

希德拉之進占萊茵，法俄的提攜，西班牙的革命，以及日德協定等，都像走馬燈般在過去一年，連續聳動人們的視聽。但是比此更爲熱鬧喧囂的，是軍械廠的鋼鐵聲，是飛機的機輪聲。思想的對立，是由於對相手國的憎惡與反感，不必要的高漲的結果。於是把這對立，視爲決定列強合縱連衡的重要因素。

真的，因了思想意識所造成的國家的對立，要像今日那樣形成合縱連衡的狀態，是史上所稀見的。但是爲了思想意識而致國家從事戰爭，那是中世宗教全盛時代之夢，早以『十字軍』與『宗教裁判』而告其終結了。就是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由法國革命以來的自由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鬥爭，已早消聲匿跡，成爲拿破崙的大陸霸權及與之相對立的勢力之爭鬥了。且世界大戰當時協約國所標榜的爲『求德模克拉西之安全』云

者，到底不過是發動世界輿論的旗幟，這是徵之近二十年來的歷史，可以明白的。

觀察當前列強的對立，或謂是人民戰線與國民戰線的爭霸，或謂是維持現狀國家與推翻現狀國家之鬥爭。但這二者都不免自限於觀念的遊戲，反把爲其活動的根本的民族自己保存的本能置之不顧了。故若強欲把歐洲分成二個對立的形態，那末還是說『足於衣食之國』與『衣食不足之國』，或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二者的鬥爭，來得恰當一些。

把重點放在人民戰線與國民戰線而加觀察，倘其如此，試問英法俄三國的關係，怎樣來加說明呢？我們知道蘇聯的人民戰線與法國的人民戰線目標不同，而法國之左派內閣與英國之保守黨內閣亦不相同。且就現今的形勢以言，此三國對德的包圍網，現正漸趨一致的步調，但這決不是思想意識的問題，而爲由民族自己防衛的衝動所發生的利害共通問題。

誠然，德國與意大利的結合，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但若說這是由於希德拉與慕沙里

尼二人共抱着法西斯的思想意識，那實是反相之見，因爲二者都對足於衣食之國表示不滿，故彼此相結耳。其實，兩國的利害，却任何方面都未能一致。誠然，德意兩國彼此提攜以分割英法的殖民地，倘若有這樣超拿破崙的計畫，那是又當作別論……因此，德意兩國的結合性，實決不能久長，這不過是一時的大陸式的姿勢而已。

在這樣的形勢前面，而把世界視爲是國民戰線與人民戰線的鬥爭，是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相尅，殊未免離國際政治的實相太遠了。我們知道當前的世界，依然是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國家英法俄與二十世紀之帝國主義國家德意彼此利害的衝突。這是赤裸裸的事實。

德國的國社黨，自入一九三六年，其國內工作已大體完成。今後國社黨的努力，或將專向於外交方面。國社黨的外交，若由希德拉所著我的戰鬥以爲解釋，則與德意志帝國的世界政策實完全一致。因此，今之希德拉正可說是威廉二世的繼承者。國社黨現在已把凡爾賽和約廢除了，其次的事情，便將是德國失地的恢復，德國民族的統一。但此二者，

其意義還是歐洲戰爭，這是很明白的。由我的戰鬥的指示，『德國的將來在東方，』我們可以說德俄關係將是鬥爭的第一步。

不過德國的將來雖在東方，其世界政策之必然的針路，當在萊茵西岸，其最後的目標將在英法海峽的彼岸。蓋大德意志若一旦出現，法國的勢力自將深感不安，而若法比地方一旦屬於大陸軍國之勢力，那末大英帝國的鼎的輕重，就要發生問題。所以俄法的接近，以德國的興盛為比例而促進，而英法之協商，則與大德意志主義為宿命的反對勢力。

誠然，英國的政治家不像大陸的外交家般把愛憎之情，直截了當地表示了出來。就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外相烏雷仍深藏着英法協約的正文，直到最後的瞬間，始決定其援助法國的態度。鮑爾特溫當然要忠實地遵守其前例不變。現今的英國，對於歐洲的動向仍具着異常的關心，這是與一九一四年當時相同的。勢力均衡與海洋自由的原則是英國存亡所繫的鐵則，而足以威脅此二原則者，惟明日的德國。這是英國向所深悉的，倘其

不然，英國之以全力從事國防的強化，便將爲不可理解的事。所以在二年前，鮑爾特溫曾說英國國防的第一線在萊茵河。

意大利年來表示着不平者的典型的態度。但是雖然抱着非獲得什麼不肯甘休的心理，其目的與行動却並無確定的標的。在歐洲化爲戰亂之巷的時候，是左或右，還須待當時的情勢以決定，與一九一五年時一樣。

俄國之共產主義，無論在英國和法國，是並不視爲應加歡迎的盟友。只是今日的莫斯科政府係非侵略的一點，實使英法兩國人民安心無懼。蓋俄爲足於衣食之國家。惟若俄德邦交，逕如今之險惡下去，那末歐洲大陸之勢力均衡，復回到大戰前的形勢，亦很可能。這個彼此對抗的實質，還得歸根於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國家與二十世紀之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

因此，歐洲禍亂之鍵是掌握在德國的手中。希德拉如威廉二世一樣要在其所圖謀的時機，在其所企圖的一方面求得相手。只是今日，我們還不能十分明白，究竟要在何等

情勢之下才發生出來。而以此故，歐洲的危機雖甚急迫，其在另一面，却可說完全是潛在的。

二

至於遠東的事態，則正向大陸發展的日本勢力與欲加以防止的中俄兩國勢力，其彼此的摩擦面是一天天的在擴大開來。日本的發展，由滿洲而延及華北，這自然要使對抗的勢力更加趨於深刻。日本誠然在國聯喫過十三對一的慘敗，但此敗績說起來只是『道德的失敗』(moral defeat) 因為當時誰都沒有可以抑制日本的實力。可是今日怎樣呢？試觀當前的事實：蘇聯之遠東軍備已有近代的兵力十數師，飛機、坦克數在一千以上，而在海參崴方面者則潛水艦多至四十餘隻。又如南京的中央軍已超過九十萬，飛機之數也已多至九百架以上了。隨着日本的進展，此抵抗的實力是亦在著著的增加。

且由中國的內情，正由多年的排日轉而為抗日，因了必要，頗想把日本軍隊誘引至

中國內地，利用歐美的援助而對日本加以包圍攻擊。於是我們見到莫斯科與南京合作以陷日本於孤立的政策，現在著著在進行中。而最近成立之日德協定，則使此運動更以促進。

第一是蘇聯聲明要專力於遠東兵力的充實，使南京之聯俄容共派趨於有力。法國因了德國威力的增進，自不免心懷恐懼。英國的輿論所以對日德協定都表示敵視的態度，這也是意中之事。倫敦某報所謂要當心法西斯國家的提攜，『這樣，德國將威脅英本國，意大利要威脅地中海的交通，日本要威脅印度及澳洲』正是英國多數人對日德協定的印象。

至於德國，由日德協定，究竟得點什麼呢？如協定本文之所規定『爲了防備共產國際』而需要日本的助力的實際情勢，在國內是一點也沒有。其實，目的所在是在歐洲增強德國自己的威信。具體的說其目的所在，是希望日本能在遠東牽制蘇聯使蘇聯集中更多的兵力於遠東。故防共協定在技術上雖說是日德協力以防備共產國際，而政治上

則在使蘇聯竭其全力以事遠東。倘是不然，那末柏林所希望的防共協定，可說是毫無效果。

這裏，尙待說明的是美國的態度。美國對世界大戰的結果頗感幻滅。且由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經濟恐慌，飽嘗了人間的憂患。要把今日的美國，重新回復到經濟恐慌以前的狀態，是誰都有所不能。這樣說時，是否大戰發生，美國將守中立呢？那末我們須知美人對於戰爭是不能以利害的打算來決定的。由外交評論家西蒙士（Frank Simonds）之言，下次世界戰爭，若法國一旦受害，美國必將捲入。固然，以彼時的情勢，美之輿論刺戟如何，與其態度的決定大有關係。但若由法西斯主義的攻勢而致發生戰爭，舊協約國必要再標榜『挽救德模克拉西』的口號以發動世界輿論，而以此爲德模克拉西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此種呼聲，雖其效果或不能百分之百的激動美人，但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使美國不得不參加戰爭。

對於這種情勢，蔣介石將如何加以利用，這是很可注目的。惟複雜的中國政客的心

理，我們似難預斷，這裏只能略加推測。蔣氏的對日政策，在以不即不離的立場，遷延交涉，因為由其測定，以為時間是利於他們的。他們一面遷延交涉，一面則圖謀長期抵抗，充實國力，拉攏英、美，以急速完成抗日的準備。

此時，日本若驟然興起，那末現在就不免要起而應戰，可是因為自信其武力不足以制日本，勢必如一九三二年的先例，再提訴於國際聯盟。國聯若對日本下其缺席判決，那末中國的立場，顯然是很有利。因為像莫斯科政府那樣，就要如國聯的天使樣出而干涉英法的動向，也必要隨着國聯的情勢而行動。因了這種觀察，所以近來南京政府像很有把握似的，頗為安心。要之，對方的用意，在以長距離的競走為政策，而避免速戰速決主義。思由長期的軍備競爭與包圍網的強化，看取日本的動向。這樣，日本的外交，就勢必要漸漸喪失其行動的自由。

廣田內閣當着這樣的難關，其對策是怎樣呢？將來是否仍想不訴諸日本國民的輿論，只相信秘密的外交技術，而謀中日關係的調整與孤立外交的轉換呢？不消說，今日的

事態是非常重大，日本國民應當就問題的根本，從靜思考。無論政府、軍部、國民，其憂慮邦家危難之情，是彼此一致的。有志之士，莫不痛感舉國一致的必要。但是政府若不能打破暗中掣肘之力而明示根本國策於國民大眾，那末要想實行強力的國民外交，那樣的時期怕不容易到來罷。

——平子譯自中央公論一月號